

書叢學科會社

編主麟秉劉 松炳何

理病的會社業工代近

著 尼 塔  
譯 椿之吳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學科會社

編主麟秉劉松炳何

R. H. Tawney 著  
吳之椿 譯

近代工業社會的病理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目次

第一章	導言	一
第二章	權利與職務	七
第三章	貪得的社會	一八
第四章	工業主義的報應	三〇
第五章	財產與創造的事業	四七
第六章	職務的社會	七七
第七章	以工業爲專門職業	八三
第八章	萬惡的循環	一三三
第九章	實效的條件	一二七

第十章 勞心者的地位……………一四八

第十一章 結論……………一六六

# 近代工業社會的病理

## 第一章 導言

大家都知道，英國人的特長是他們的持久的實行活動力，他們的特短是不願用原理來試驗這活動的好壞。他們覺得理論無趣味，以基本原理為自然；他們的興趣是在道路的現狀，而不甚關心於道路在地圖上的位置。我們很可以說，那種知識上的安分守己心與實行的精力聯合起來，在平常的時候頗足以解釋——若不足以辯護——他們優容思想上較為冒險的國家的批評的大度。這樣的態度，是人已經與命運定成交易，安心於命運的報酬，不願重新討論。這樣的辦法可以使心自由集中於有利的活動而不分，因為沒有無益玄想的嗜好來擾亂他。我們可以說，大半的時代所經行的道路，不是由他們自己造成的或尋得的，乃是他們所承受的；但重要的

事情就是他們必須繼續前進。英國人好像帶上了眼罩一樣，使他們在現成的路上走得更为安穩，不必分心去管他們的目的地。

人體用的藥品既不能當作日用的食料，日用的食料也不能當作藥品。有些時候不是平常的，在這些時候僅僅的遵行舊路是不夠的。必須知道這條路達到甚麼地方，設若不能達到，必須另走一條路。要另尋新路須費思索，照那些自命爲實行家的忙碌人看，思索是不合性情的事，因爲他們看事情爲自然，就不去更動他。假若一個人迷了方向，最合於實際的事不是向錯的方向最快的走去；乃是要思想如何尋出正路。一個國家在歷史上一大轉變的關頭跌倒了，最合於實際的事，不是行若無事，好像向左轉或向右轉，往上行或往下行，都無關係，只要他更加一點勁繼續做已往做過的事；乃是要思想已往的事是否對的，假如不對，便要去變更他。大難之後，一國實業政治與社會制度的破片敗絮，必須湊攏的時候，這個國家必須下一個決斷；因爲即使他拒絕下決斷時，也是一種的決斷，假若他要下一個可以持久的決斷，必須超過暫時迎合新聞紙業主心理的哲學的範圍。他必須對於現在的短處與將來應有的特性兩者都有明晰的了解，纔不致

像松鼠在迴籠中，轉得雖然用力，卻是徒勞的。要得著這樣的了解，所採用的標準，必須較商業工業或社會生活暫時的需要為永久，用他來判斷他們。簡單的說，就是必須求助於原理。

這些思想在這個時節或者不是完全無關係的，因為事實已逼著英國人去重新考慮他們的社會制度，這是僅用原理來引他們所做不到的事。引用原理是社會無論甚麼大改造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因為社會的制度是人心道德價值的標準在外面的表現，不改變道德的價值不能改革制度。議會，工業的組織，以及社會藉以表現自己的複雜機關的全體，好像磨石一樣，只能磨放進去的东西；假若沒有東西放進去，便磨些空氣。自然有許多人不願意改革，別人來改革時，他們還要去反對。他們覺得現存的社會制度在以往是有利的。他們所願意的改革只限於那些能保障將來亦有同樣利益的。『皇帝喝了酒，全國全醉了。』他們實在不能懂得同胞為甚麼不能與他們一同快樂的沐浴於陽春的光裏，好像法國一位稅務總管一樣的問道，『現在諸事進行如此順利，何勞改革呢？』這些人應當受憐憫，因為他們缺少人類應有的社會心。他們亦用不

著論辯，因為他們生來就缺少要明瞭他所不可少的一種能力。

還有些別的人，覺得有一個新社會秩序的欲望，但是不能領會他們自己的欲望的含義。人對於基本改革的要求，也許真實的表同情。他們也許覺著了社會的惡處，誠心的要除去他們。他們也許設一新職，添一新官，創造一新名辭來表現要做些比改良有力而不及革命那樣擾亂的事情的決心。除非他們除用力實行之外，還去用思索的苦功，是無結果的。因為別人以他們為實行家，他們就自己覺得不能超脫這樣限制；因為他們過於以他們的哲學為自然的事，以致不覺得他的涵義，只要他們一動手做事，那個哲學，就重新振起好象一種無敵的力量，壓迫他們的行為使進入舊日的軌道中。『我是一個不幸的人；誰能救我脫離這個死的軀殼？』他們想將經濟生活放在較好的基礎上的時候，便像鸚鵡一樣重複呼叫『生產』這個字，因為這是他們心中的第一個字；至於生產是已經用過的基礎，生產的加增是大戰前的時代的特別成績，正如宗教在中世紀，美術在古代的雅典一樣；而經濟之不平最利害的時代，恰在自羅馬帝國衰亡後這個生產最大的一個世紀，都是他們所不注意的事。他們動了社會憐憫心時，以為最新發明一個方



法就是減輕貧窮，因為貧窮是與他們最寶貴的財富相反，他們就以貧窮爲人類最可怕的痛苦。他們不懂得貧窮是社會不良的一種徵象與結果，而這個社會疾病是比較的屬於根本而較難於治療，也不懂得社會生活中使少數人以過富而損壞的特性，就是使多數人以過貧而受損壞的特性。

『但生產的加增是重要的。』那個自然。豐餘是好，缺歉是不好——這是不須過去五年間戰<sup>指歐</sup>墳中之鬼來告訴我們的。但豐餘依賴合作的努力，而合作依賴道德上的原理。而道德上的原理正是這一教派的先知者所輕視的。所以世界『繼續於貧乏之中。』因爲他太貪而眼光太短，不求尋『使衆人一德一心的東西。』商業教員所提出來的好意的社會改組計畫，歸於流產，因爲他們要將不相容的東西合在一起，他們所擾亂的徧處皆是，所解決的沒有一件。他們好像一個人覺著舊鞋不適用於用，不去做一雙好皮子的，卻去買一雙加大兩碼的，又好像一個人星期日在禮拜堂捐了六便士的假錢，下星期去捐一先令的假錢來補救。當他們狂熱的力量用完之後，除了夢醒之外，沒有別的可看的結果，他們便叫起來說改良是不可能的，歸罪於人性，但應

當受責備的卻是他們自己。

然而工業所應有的基本原理向來是簡單的，無論應用是怎樣困難；人忽視這些原理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困難，乃是因為他們簡單。一種工業，將所有的事都除外，照他的精神看起來，並無別的奧妙，不過一羣人集合起來，在競爭與互助的各種程度之下，以供給社會所需要的某種服務來謀生活。無論你如何組織他，或是一羣用斧鑿的工人，或是自耕其田的農人，或是一百種造船的機匠，所造的船，是複雜的奇蹟，所用的機器，是幾百年發明的結晶，但他的職務是服務，他的方法是結社。因為工業的職務是服務，所以照全體看起來對於社會有些權利與義務，取消這些權利與義務便造成特殊利益。因為他的方法是結社，所以其中的各種份子，彼此相對有些權利與義務；忽視或違背這些權利與義務，便造成壓迫。

所以工業合理的組織的一些條件是永久的，不變的，是具有極平常知識的人所能懂的，只要他們觀察同國人的性情，從歷史上的大綱著眼，不用專門家的無生氣的抽象觀察。第一個條件是工業當附屬於社會，使在技術之可能以內與社會以最好的服務，使那些不服務的人完全

得不著報酬，因為一個功能的精神，就是要使他的意義不在滿足他的本身而在滿足他所為的目的。第二個條件是指揮與管理，應當放在對於被指揮被管理者負責的人的手中，因為經濟自由的條件，是人不當受他們不能管束的權力的轄治。工業的問題，實在不僅為物質上的困苦，乃是關於權利的問題；因為他是關於權利的，所以這個問題，在工人階級中物質上痛苦最少的部份，最為危急。這個問題，第一是關於職務的，第二是關於自由的。

## 第一章 權利與職務

一種職務的定義，可以說是一種包含或表現社會目的的思想的活動。他的精神在於做事的人行使職務不僅為個人的利益或滿足個人，而承認在盡職上對於較高的權力負有責任。工業的目的是明瞭的。他是為要供給人以必需的，有用的，美麗的東西，使他們的身體或精神有生命。在這個目的管轄範圍以內，他是人類最重要的一種活動。一離開這個目的，他的社會意義，就

等於蜂蟻的秩序工作，孔雀的步行，或野獸爲死屍的競爭一樣，雖說照辦工業的人看起來，也許是無害的，有趣的，甚至於令人欣悅的事。

這個事實通常是爲人所感覺的，無論他們是怎樣的不能或不願意照這個事實實行；所以有的時候，在他們能夠管轄暴力與貪婪的勢力的範圍以內，他們會能採用各種方法，注重經濟活動的社會性質。但是要使這樣的注重有效，是不容易的，因爲需要一種永久的意志的努力，而人的虛榮天性是與這種意志反叛的，又因爲要使這種意志有效，必須將他托體於社會與政治的組織，這種組織的本身也許變成這樣武斷，壓迫，或腐敗，不但不能助長這種意志，反去阻撓他。當這樣退化的程序已經深了的時候，正如十八世紀中葉歐洲大半的國家一樣，少不得將這種死的組織打碎，將他掃除乾淨。在這種進行之中，個人得著解放，他的權利也擴大了；但是社會目的的思想，因爲陳舊秩序，當有的缺乏信用，也就失了信用。

所以在建築在舊朝廢址上面的工業社會裏，佔優勢的聲調，是力持個人的權利，不問這些權利之行使所助成的社會目的，這件事是不足爲希奇的。經濟的發展將人口聚集於煤礦區域，

他的精神是一種很大的殖民的移動，從東方與南方，遷徙到西方與北方；自然在英國的這些地方，就如在美國的殖民地一樣，特有的人生觀是個開荒的人與礦營的哲學。這種社會性質的變動是深沉的。這種變動，至少在英國是漸進的；『工業革命』的結果，難然是大不幸，但他本身不過是許多世紀的細微的道德變遷的外面的極點。近世經濟關係之興起，在英國可以說是從十七世紀之下半開始，是與用機械的概念來代替目的的概念的一種政治學說同時并起。在歷史上，一大部份的時間，人覺得社會秩序的意義，是在他與宗教的普遍目的有關係。好像一個梯子從地獄升到天堂，社會不過是其中的一級，社會的各階級好像一個有組織的身體的五官四肢，社會自己是個縮影不完全的反射那個較大的天地。宗教革命的時候，教會變成了國家的一部份，已經衰弱的宗教勢力，在從前雖會建設那莊嚴而太複雜的綜合，現在卻受了摧殘。但是他的影響，在給養他的根已經斷絕後，依然存在幾達一百年之久。人生下來就是在這種空氣之中，無論他們是如何實行的或詭詐的，不能容易使他們的精神脫離這樣的空氣。這個新國家政策，要想為自己的利益，利用傳統的宗教的制裁的勢力，來制服所有的階級與利益，使他們奉一個公

同的目的，也沒甚麼不方便的；國家自己以為是這共同目的的保護者，十六世紀一大半的時期，人普通都是這樣想法。社會結構的方針，已不認為應當抄摹普遍秩序的縮影。共同的習慣，共同的遺俗與信仰，上面來的公同壓力，使他們有一致的方向；這個方向，防制個人變化的力量與側面的發展；他們集中的中心點，從前是兼有幾種國家性質的宗教，現在是附帶許多宗教性質的國家。

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去中世紀未遠；一七〇〇年的英國，方從前兩世紀劇烈的爭論中出現；這兩個時代的區別，不僅在憲法的與政治的組織，而在社會的與政治的理想。不但事實變了，即觀察事實的心理也大變。這個變動的精神，是在一個思想的消滅：就是說社會制度與經濟活動是與公同目的有關係的，這個目的使他們有意義，也是他們的標準。十八世紀的時候，國家與教會，都放棄了維持一部公同社會倫理的事務；剩下來的，不是訓導全國，乃是壓迫一個階級。輿論從此不以社會的制度與經濟的活動為應當受道德標準的制裁如私人行為一樣，因為從前的制度，無論如何武斷，反覆，並且在實行上時常是腐敗，但在外面總是標記著，表現著生活是

附屬於超過私人利益的目的，這樣的現象，從此不能影響輿論了。政府裏以前關於管理社會的部份，即使未停止，至少已成廢物了。因為中世紀存在的民主政治，已經消亡，革命的民主政治，尚未產生，所以政權落於一些昏聩的階級手中，他們為不負責任的貴族的利益，行使政權。宗教離開人類的日常生活比國家更遠。慈善事業很多；但宗教在從前為最大的社會的勢力，現在卻成了私人的東西，如紳士的地產，或工人工作的衣服一樣。特別的赦免指教會法庭與偶然的干涉是有的，好像君王赦一個罪犯，或署一道斬決罪犯的命令一樣。但親密的人情的，可愛的東西——基督教的精義，大部份是消滅了。上帝已被丟到窮蒼極冷的高度去了。在天上有個有限制的帝制，亦如在地上一樣。上帝觀望自己所造成所轉動的奇怪機器，但是他的動作，上帝已不能也不願管轄。上帝的智慧干涉越少越顯得出來，正如英國皇帝對於議會的行事偶然干涉一樣。

那些代表社會組織上公同目的的勢力，無論代表得如何不完備，但他們放棄地位的自然結果，使目的思想的自身，漸漸的從社會思想中消滅了。他的十八世紀的地位，就被機械的思想佔去。人與人彼此間，人類全體與上帝間，因他們與公同目的有關係而起的相對義務發生聯

絡，這個概念，在從前雖隱約的想著，不滿意的行著，究竟是連合社會組織的首石，但自從教會與國家由社會中心的地位退向外幅以後，這個概念就不爲人所重視。這拱橋的首石除去以後，所剩下的是私人的權利與私人的利益，這些權利與利益是社會的材料，不是社會的自身。這些權利與這些利益，是屬於天然的，以前被帝王與教士的野心所擾亂，現在上面這不自然的東西既已除掉，他們就出現，因爲他們是天然本身的產物，不是人造的。在以前的時候，人認他們是與一種公共目的有關係的，不管那個目的是宗教的或是國家的幸福。自此以後人遂以他們爲絕對的，立於不敗的，立於自己的資格之上。他們是政治與社會最後的事實，因爲他們是最後的事實，所以他們不附屬於社會的別的方面，而社會的別的方面，卻是附屬於他們的。

國家不能侵犯這些權利，因爲國家的存在是爲保護他們。各階級間的關係是由他們定的，因爲權利中之最明顯而最基本的就是財產——財產是絕對的，是無條件的——那些有財產的人，被看爲那些無財產的人的天然統治者。個人與個人之間以契約來行使這些權利，就發生社會。社會維持契約的自由，令他們盡量的有無拘束的行使，在這種範圍之內，社會可以說是盡



了職務。假若社會像法國的皇室，用武斷的勢力來蹂躪他們，在這個範圍內，社會便是失職。這樣的觀念，使社會好像一個大合資公司，在這個公司裏面，政權與紅利之收受，應當屬於最大的股東。社會活動的潮流，不是會集於共同的目的，而是分散於許多的槽渠，這些槽渠就是組成社會的個人的私利益所造成的。社會活動成功最好的保障，在於這些利益的綜錯與自然的情形，在於除個人的目的以外，簡直不求將他們屬於較大的目的。天然本能的慈惠在感情上與理性上，都有一種的奧妙，十八世紀將上帝逐出社會接觸之外，就以他爲一個代替上帝的東西，不猶豫的將上帝與天然看作同樣的東西。

『所以上帝與天然計畫了大綱

使自利心與社會心變成一物』

在注重實行的世界內，這種思想的結果，造成法治的社會，而不爲政府反覆的意思所管轄，但這種社會不承認個人尋求他們的經濟私利的時候，當受道德的限制。在思想界的，政治的哲學，以權利爲社會秩序的基礎，即使想到盡義務的事，也以爲是由權利自由行使的不可避免的程

序中出來。這種哲學第一個著名的代表就是洛克（Locke），洛克哲學之中堅的觀念，是私人權利之不敗，而不是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經天命所預定的和諧。法國革命前驅的大著作家，雖信自己是開明專制的僕人，但幾於同樣的注重權利的神聖，與藉求私利變成謀公益的點金術的十分可靠。社會是自己糾正的機械，這種概念後來成爲英國個人主義最特具的聲調，法國的作者的著作雖顯出這個概念的勢力，但法國革命所燒進歐洲人心中的乃是前者而不是後者。英國的權利觀念以前是消極的，是自衛的，是對於政府的侵犯的一種保障。法國人卻從戰壕裏跳出來去施行攻擊，英國人守住戰壕便滿意了，在法國這個觀念是積極的，是猛攻的，不是自衛的器具，乃是一個社會組織的原理。用權利來重建社會，這些權利不是從陳舊的憲章得來，乃是從人性自身得來，這便是法國革命的勝利，也同時是他的限制。這種思想使他有狂熱與蔓延力如宗教一樣。

在英國所發生的事，初看似似乎恰恰與法國相反。英國實行人的思想，所取的聲調比較的低，看見這浩大的信條的威嚴燦爛，頗受點震驚。他們對於法國的絕對的主張，絕少同情。他們所心

慕的，不是不能掀動他們商業天性的自由的權利，而是能掀動他們的自由的便利；法國的革命既顯出天然權利思想的爆裂力，他們就尋求一個比較平和的公式。最先就有斯密亞當 (Adam Smith) 與他的前驅學者替他們擬了這個公式，他們證明經濟生活的機械，如何的『像有冥冥中的指導』將個人權利的行使，變成公共利益的器具。邊沁 (Bentham) 不喜歡玄學的微妙，他看法國的人權宣言，是與別的武斷的宗教一樣的荒謬，用功用主義，給政治制度一個最後的標準，就完全決定了這個新方向。自此以後思想的趨重為之一變，由個人任意行使自由的權利思想，變為對於社會無拘束的行使自由的便利思想。

這個變動是很有關係的。這便是英法兩國的區別，在法國是平等與普遍的公民資格與五百萬的農民地主，在英國是有組織的不平等，穩固的建於階級習慣，階級制度之上；由法國到英國，就是從希望降到安命，從一個前途無限的時代的熱火與感情到工場機器單調的聲音。從土爾加 (Turgot) 康多賽 (Condorcet) 到邊沁 (Bentham) 利加多 (Ricardo) 穆勒 (Mill) 的淒涼的算術式的信條。大運動是從人心裏出來，包含著有一個信仰，不是由樂利主義的毫釐

計算而來，人類至少有這一點勝過他們的哲學家。所以法國於三年之間，以財產權的名義，廢除了許多的財產權，這些財產權就是在舊朝的時候，藉以剝奪農民工作的出產一部份的器具，這個社會的改變，在一世界的政治變動中，巍然獨存。這個民政好音在英國傳得太謹慎，不能達到田裏的農夫，或山上的牧人的耳中；就只有政治的改革，沒有社會的變動。功用主義在政治範圍內鋒利不可當，但對於社會組織的基本原理不含有甚大的干涉。功用主義的代表，主要關心的事是除去政治上的弊病與法律上的畸例。他們所攻擊的是乾薪津貼，刑法，與法庭的手續。他們僅及於社會制度的皮毛。人民對於懶惰的政府，納進款十一的稅，他們以為奇怪，但人民以五分之一當作田租歸給懶惰的地主，他們反以為頗近情理。

兩下的區別，不在原則上，而在注重上與表現上。無論將私人財產與無限制的經濟自由當作天然的權利如在法國一樣，或是僅假定他們為永久的一種便利如在英國一樣，在事實上是很不關重要的。在兩方面，人都以他們為社會組織應有的基本原理而不懷疑，並且關於他們是不容另有討論的。邊沁（Bentham）雖說過權利是從功用來的，不是從天然來的，但他並未將

分析推到一種境界說某種權利是屬於某種職務的，所以他對於未附帶服務的權利與附帶服務的權利，是不分的贊成了。總之，英國講功用主義的人，雖避免天然權利的名詞，卻保留一些不異於他的實質。因為他們以為土地私有，資本私有，是天然的制度，因為他們自己滿意的證明社會的幸福一定可以從私人財產權繼續的行使得來，實在就與這些權利以新生命的護符。他們反面的教訓，是與正面的教訓一樣的重要。那是個被電的針。在他們的政治思想背後，所表現的學說，在他們總是表現久已在思想界內失了信用的學說的行為背後，他們卻承認絕對的財產權與經濟自由為社會組織的確定的中心。

這個態度的結果是極有重要關係的。十八世紀自由黨運動的動機與靈感，是在攻擊特殊利益。但是這個信條，可以將法國村莊與宮院的農業封建制度的鬼逐出來，而不能驅逐伸張其肢體於英國北部的工業制度的新鬼。一八三二年英國自由主義得勝，昔日的燈赫與幻想已經剪除，自由主義無批評的交付資本工業的新世界的東西，是幾種財產權與契約的自由，這些都是在工業時代以前比較簡單的經濟環境中所鑄成的。在英國這幾種財產權正在受一種曲折

的程序，直至認不出來了，有一日必致盡去其害人的力量。在美國因為有必須的原因強迫這些原理結晶成爲一個憲法，這些原理就有了似鐵衣一般的固定性。這些燦爛的公式，原是農夫與小工主的社會用來藏貯他們的自由哲學的東西，現在有變成一種桎梏的危險，被盎格魯沙遜（Anglo-Saxon）人種的商業貴族利用，來束縛移民與半奴隸式的無產階級的反叛運動。

### 第三章 貪得的社會

這個學說在事實上曾受特種的限制，以求避免特種的弊害，或應付特種的緩急。他在特別事件上受限制，正是因爲他的普遍的真理，是被認爲不容討論的；直到大戰的前夕，他是近代經濟文化的實行的信仰。他的含義是說：社會的基礎不在職務而在權利；權利不能由盡職務推釋出來，使財富之獲得與財產之享用依賴職務之行使，但個人生來就備有自由使用他的財產與尋求他的經濟私益的權利，這些權利對於他所盡的任何職務是在前的，是獨立的。我們承認事

實上可以假定社會的服務可以從行使權利出來。但這不是工業的首先動機與標準，而是一種次要的結果；這個結果是由行使權利附帶出來的，這個結果事實上是得著了，但是不求而獲的。他不是經濟活動所趨向的目的，也不是批評經濟活動的標準，但是一種附產物，正如煤精是製造煤氣的附產物一樣；無論附產物出來與否，他們不願意放棄權利的自身。因為這些權利，不是被認為有條件的信託，乃是一種財產，在非常緩急的特別需要的時候，這個財產誠然可以讓步，但緩急過去之後，他的權柄就回復了，在平常的時候，他是不能討論的。

這個概念，在十九世紀，英美兩國的歷史上，同是大書特書的遺傳下來的學說，是以財產為絕對的權利，立於個人的基礎之上；這個學說之外，還有一個學說在理論上可以追溯到歷史上很遠的時代，但是完全成人，乃是在資本工業興起之後；這個學說就是社會限制經濟事業的機會，是一件不公平而且愚拙的事。所以凡求以義務為享有財產或行使經濟活動的條件時，就遇着堅強的反對。人類同情心與十八世紀傳下來的財產學說衝突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沒有人忘記財產權的名義被借用來反對工場法律，居室改良，貨物攙假，甚至於居室的強迫衛生場

主房主對於安全與衛生的最低標準的提議，回答說：『我不能自由用自己的東西麼？』即到今日，英國城市的地主可以拒絕賣地，以阻礙全城的發展，或使發展不得平均，除非是地價特別的高，而英國的市政府，也沒有適當的權限，可以強迫購買，不出極重的價錢，便要望著許多的市民受擁擠。要收買土地，或要獲得任何新的權限的全部法律手續，都經律師縝密的計畫出來，保護業主，免得私人權利有被公益犧牲的可能，因為他們的權利是被認為首先的，絕對的，公眾利益是次要的，附帶的。

這個同一的學說在課稅方面的勢力也是不用提的。所以所得稅以暫時的辦法為藉口，因為人看平常的社會內，個人可以為自己使用其進款之全部，並不因此對於社會發生甚麼義務。死稅被斥為盜劫，因為死稅含有一種意思，就是說遺產利益的權利，是依賴社會的允許。一九〇九年的預算案，激起一大風潮，不是因為土地稅太重——其數目很小——乃是因為人覺得他牽連一個原理，這個原理就是財產不是個絕對的權利，而可以正當的附帶些特別的義務，假如將這個原理擴充到論理的結論，可以使財產的享有不為絕對的而為相對的，以破壞財產的神



聖。

這樣的意義，照輿論中有力的人看起來，是不能容忍的，因為輿論慣以財產自由的使用與無限制的利用經濟機會爲絕對的無條件的權利。總而言之，這個意見直到近來，尙未遇著足以輕重的反對的人。其結果是財產權的維持，即使在他們的行使明明是無直接間接的服務的場合中，也未受十分的動搖。沒有人設想城市的地主，以地主的資格盡了甚麼職務。他有私人徵稅權，此外沒有甚麼。但城市土地的私人享有權，在今日是與一百年以前一樣的穩固；西西爾子爵 (Lord Hugh Cecil) 在他論保守主義的有趣味的小書上，宣言無論私產是有害或無害，社會不能干涉他，因爲干涉他就是盜劫，盜劫是個惡事。沒有人設想以大宗土地作花園養禽獸，是合乎公益的。但是我們的鄉間貴族，仍然許多住在鄉村從事遊獵。沒有人能說一個營獨佔事業的人，是受『無形中指導』的驅使，爲公益服務的。但照近來獨佔營業的報告看起來，實業界有很大的大部份，競爭已爲聯合所代替，而聯合事業在利用經濟機會上，也准其與私人一樣有同樣無限制的自由。沒有人實在相信，煤之出產，是依賴對於地主納礦稅，或是船公司不得百分之五

十的利息，船就不能行動。但煤礦（實在是開礦的工人）仍然納礦稅，而船公司的主人仍然獲大利，升為貴族。

當大家正在討論財富出產增加的重要的時候，政治家似乎沒有一個願意考察為甚麼浪費財富於無益的事業上，或用在利益與服務不稱或完全無益的事業上。代價之付給，由於財產權，不是由於所盡的絲毫服務，這個習慣根深蒂固至於如此，所以在國家危險期間，政府想從地內取油，就實行提議每加倫的油，當付油稅若干與地主，但這些地主連油的存在，的影兒也不知道；若有人疑問國家在道德的義務上，是否應當另外多給酬金，這些坦白的地主，就面呈痛苦的驚異之色。這樣的權利，嚴格的說起來，是特殊利益。因為特殊利益的界說，就是一種不附帶相合的職務的權利。

財產的享受，工業的指揮，總之，是被認為不需社會的理由，因為他們被認為站在自己的資格上面的權利，不是用對於社會目的的供獻的成績來批評的職務。這個學說在今日雖在思想上失了信用，但事實上仍為社會組織的基礎。如何經人極力的證明他的不足而慢慢的讓步，可

以從大戰中商界領袖對於限制經濟活動所取的態度看出來。鐵路礦產，船舶之管理，生貨之分配由公家不由競爭的商人，物價的限制，『浮利』之禁止——這些計畫的施行細情，也許有效或無效，也許聰明或有損。實在有些明明是愚笨的，如當世界有五年之損傷須加以修補時，對於入口貨加以限制，還有些別的，在理想上是對的，但在實行上是可懷疑的。這些計畫假若是由於他們妨礙職務的有效行使而受攻擊——假若實業的領袖出來大致聲明，如少數的商人，有榮譽的一樣的說，『我們承受你們的政策，但在實行上我們要改良；我們希望以服務得報酬，并得報酬限於職務；並留心職務以外政府不付別的報酬』——對於事實也許有爭論，但對於原則是決無問題的。

但是實在說起來，對於這些限制所加的攻擊，其中最利害的，普通恰恰是與這相反。大半的批評家攻擊他們，不是因為他們限制服務的機會，乃是因為他們減少獲利的機會，不是因為他們防止商人使社會發財，乃是因為使他自己更難於發財；總之，不是因為他們不能將經濟的活動，變成社會的職務，乃是因為他們幾乎變成了。假如我們可以相信煤炭管理員的財政顧問的

話，煤礦的股東在大戰期間，似乎成績頗好。但格因夫子爵（Lord Gainford）對於限制他們利息於每噸一先令二便士的提議，認為是『純粹的盜劫與收沒』。將幾個好的例外除開，他們所要求的是，在將來亦如在既往，工業的董事自由的為他們自己的便利或進步處理生意，不必勉強將工業附屬於一個社會目的之下，如大戰中他們所受一部份的強迫一樣。假如承認商業工業以能盡社會職務為標準，財產與經濟活動，就即刻從絕對的權利變成相對的與第二重的權利，因為那樣便承認他們是與職務相關的，不盡職務的時候，他們是可以正當收回的。總之，是說，財產與經濟活動之存在，是為增進社會的目的，然而迄今照商界看起來，社會是為增進財產與經濟的活動的東西。那些人得著地位，不是以服務者的資格，乃是由於他們能使工業造他們自己的財富與在社會上的勢力，照他們看這樣將方法與目的顛倒過來，似乎不亞於革命。因為那個意思是說，他們必須在社會的法庭前面，說出他們權利的理由來；這些權利他們以前認為自然屬於一個不受批評的秩序的一部份。

私人權利與社會職務這兩個原理的衝突的意義，在十九世紀的大部份，是藏在一個學說

背後，就是私人利益與公衆利益逃不脫和諧之一途。他們說競爭是誠實的有效的代替品。今日這個附屬的學說已被攻破；經濟的樂觀與道德的破產混合起來，使十九世紀的一個經濟學家說『貪婪可以防制貪婪，獲利的欲望，自己限制自己』。這樣混合的意思，現在已少有人信從了。但是以個人權利爲社會的中心點與樞軸的傾向，仍然是政治思想中最有勢力的元素，與實業組織實在的基礎。這種學說，將私人利益與公衆利益當作相符的，將人的自私心當作上帝的意思，這是上一世紀崇拜經濟自私心的藉口，對於這種學說雖有人用力駁斥，但事實上結果之小實可驚異。經濟的自私仍然爲人所崇拜；他爲人崇拜，因爲他實在不是地位的中心點。他不過是外面的防禦物，而不是礮壘；現在外面的防禦物既已攻下，還須進攻礮壘。

前一個半世紀所造成的工業制度的特質，性情，強韌性與固結力，不是由已經炸裂的經濟和諧的學說得來。所從出的學說是說經濟權利對於經濟職務，是在先的，是獨立的，是立於自己的資格上的，是不必援引較高的證據的。事實上的結果，就是不論經濟職務是否行使，經濟權利是存在的。他們今日存在的形式，比在初期工業主義的時代，尤爲可怕。因爲在工業上掌權的人，

現在不競爭而聯合，資本與田產間的衝突，早已泯滅了。新保守主義的基礎，似乎在於決心用政治與經濟的行動，組織社會，保障他，使不因服務而因業主有不以服務抽取報酬的權利而獲得報酬不受任何消滅的危險。所以纔發生兩個歷史上的政黨的混合，『鞏固』上議院的提議，保護政策的回復，互相衝突的實業家對於獨佔事業的疾速覺悟，與以利益收買工人階級中較有力的部份的嘗試。依長久與痛苦的經驗看起來，革命頗容易沾染所推翻的舊朝的顏色。承認財產有絕對權利的信條，有時有一個承認勞工有絕對權利的學說來反抗他，還有甚麼可怪的呢？勞工有絕對權利的學說，雖反社會與不人道的性質較輕，但幾乎是一樣的武斷，不容忍，與無意思。

\* \* \* \* \*

若是一個社會的目的，在使財富之獲得依賴社會義務之行使，在使報酬與服務成一種比例，不服務者不能得報酬，使首先注意的，不是人所有的是甚麼，乃是人所能做的，能創造的，能成就的，是甚麼，這樣的社會，可稱為職務的社會，因為在這種社會內社會所注重的大題目，就是職

務的行使。但這種社會在現代的世界，即使當作一個遠的理想，亦是不存在的，雖說在以往的人的心中，會有一個像這樣的東西，一個未實現的理論，懸在那裏。近世社會的目的，在於保護經濟的權利，除了當特別緩急的時候外，是聽隨職務自己成就自己的。他們的動機不是在求爲公益的事業的完成，乃是在求加增個人的機會使他們可以達到認爲於他們自己有益的目的；他們的公共制度，政策，與政治思想的彩色與特性，就是從這個動機得來的。假若問他們社會組織的目的與標準，他們的回答使人回憶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的公式。假若說社會制度的目的就是快樂；這是等於說他們完全沒有公共的目的。因爲快樂是屬於個人的，以快樂爲社會的目的，是將社會自身化分成無數個人的野心，各趨向於達到個人的目的。

這種社會可名爲貪得的社會。因爲他的完全趨勢興趣與注意在於助長財富的獲得。這種概念的掀動力一定是強烈的，因爲他將近世的全體籠罩於他的魔力之下。自從英國發現了工業主義的能力以後，怎個概念的力量日益增加，自從工業文化侵掠以前離他遠的國家以後，自從俄國，日本，印度，中國被吸入他的範圍以後，他的勢力之新擴張每十年而不同。他成功的祕訣

所在是顯而易見的。他引人用著力量，不問這力量的行使當受甚麼原理的限制，這力量的賦與是由天然或由社會，是由技巧，或由精力，或由殘酷的自私心，或由純粹的好運氣。他擅定一個社會組織，來決定各階級事實上當得的機會，傾其完全的注意於那些力量或能得力量的人的權利，使他們為自己的增進完全的利用他。盡社會的義務，使人的精力受限制，因為要決定所當趨向的目標，但貪得的社會不將人心繫於盡社會的義務上，而繫於為尋求自己私利來行使權利上，就為財富的獲得開一無限的區域，所以使人類最有力的一個天性，有自由的活動。對於有力的他應許無限的自由運用他們的力量，對於弱者他應許他們將來也有一日可以成為強者。在兩方面的面前他懸著一個黃金獎品，這個獎品不是每人都能得的，但每人不妨一試，就是那無限發展的魔景。他對於人保證說，除了他們的目的外無目的，除了他們的欲望外無法律，除了他們所認為合宜的外無限制。這樣一來，就使個人成為他自己天地的中心，將道德原理化為便利的選擇。他將複雜社會的社會生活大大的弄簡單了。因為他替人除去了分辨的必需，不必分辨經濟活動與財富來源的種類，不必分辨事業與貪婪，精力與無良心的貪慾，不必分辨正當的財



產與盜劫的財產，不必分辨勞力結果正當的享受與門第的或財富的懶惰的寄生生活，因為他將所有的經濟活動當作立於同一的地位之上，並且暗示著太多或缺陷，浪費或過剩的情形，不需社會意志有意的努力來避免，而可由經濟勢力的機械的活動自然的來糾正。

在這種思想衝動之下，人不會有宗教，智慧，與美術的觀念；因為宗教，智慧，美術含有承認受限制的意思。但人發了財，有了力量。他們以地球為他們承繼的產業，使自然界改頭換面，雖說他們喪失了自己的靈魂；他們有一種自由的狀態，就是自己增進的機會與藉著門第，財富，才能，或好運氣而能攬得這種機會的人的中間，沒有阻礙的自由的状态。個人或社會要達到目的不是難的，只要那個目的是很有限制的與直接的，只要沒有別的緣因來分神。一個專意於培養機會不管義務的性情，放在一個又簡單又實在的目的上。十八世紀決定了他。二十世紀已達到了不少。假若尚未達到，至少已握有達到的可能了。一九一〇年全國財富之出產約計每人二百元（美金）。除非人類願意繼續為國家主義的野心與恐怖犧牲財富，恐怕在二〇〇〇年時每人平均財富的出產可以加倍。

## 第四章 工業主義的報應

這樣的快樂不難達到。但當正在進行達到的時候，世界卻遭逢許多未曾預料的結果。這些結果就是他的病源，正如經濟機會之阻塞是十八世紀社會的病原一樣。這些結果並不是如時常所說的偶然失其調和，而是從那佔優越勢的原理中自然流露出來。所以也可以說紊亂的原因不是他的失敗，而是他的成功的性質，他的光明的自身就是一種黑暗。想得經濟權的意志，假如專一得夠，可以獲得財富。假如意志專一得夠，便毀滅了當為求富的條件的道德的限制，所以也就使求富的事成為無意識。因為我們已經說過，使經濟活動有意識的東西，正如任何別的活動一樣，是他所趨向的目的。但我們經濟文化的基礎信仰，以財富為目的而非方法的信仰，他的含義，將所有經濟活動看著一般重，不管他是否附屬於一個社會目的之下。所以將財富與服務分開了，以不勞而獲的或與服務不相稱的報酬為合理。近世社會中財富之分配是依照機會的；

機會雖多靠著才幹與精力，但尤其是靠著門第，社會的他位，教育的機會，與祖傳的財富；總而言之，是靠著財產。因為才能與精力可以創造機會，但財產只需等著機會。財產是一個酣睡的股東，吸收公司所生的紅利，是一個享受餘產的人，在產業中總要求他的一部份。

因為報酬與服務分離，所以最寶貴的不是因勞而獲的財富，乃是經濟來源隱藏的財富，因為這種來源是不名譽的，所以必須隱藏，從這個情形便生出兩種的結果來。第一就是產生一個在工業上不勞而食的階級，他們對於工業的產物抽一種的稅，但不盡任何的力謀產物的加增，他們不但為人容忍，並且受人稱讚，欽慕，與週到的保護，好像他們具有興隆的祕訣一樣。他們受人欽慕，因為沒有原理來區別甚麼進款是職務的酬報，甚麼不是的，所以一切的進款，僅僅因為是代表財富，都有同等的價值，純然以多寡為輕重，所以在一切承受工業制度的社會裏面，就有一個上層階級，要求享受社會的生活，卻否認他的責任。享租金的人與他的狀態，在戰前的英國是何等常見的事！一個公學的生活後，就到牛津或劍橋大學享受社會生活，再加上一個城市的社會生活，倫敦好的時候，六月裏就在倫敦，八月裏到曠野去，十月裏獵野雞，十二月到加因

(Carnes) 二月三月去打獵；還有新起的全世界的富人孜孜於效法他們，專心將他們奢侈的鐘表對準這個荒謬程序表的時間。

第二個結果，就是使那些工作而不能以工作得大報酬的人墮落；這便是人類的大多數。因為人不肯將工業的目的，放在他們工業思想上的首位，這樣的墮落是不能免的。假若他們肯，假若他們的心思注重工業的意義是為人服務的事實，那個時候，凡做工的人在他們眼光中，都成為可尊貴的，因為凡作工的都是服務，而做工的人與僅僅用錢的人的分別，是如此的確切的與基本的，可以凡以進款之不同而起的小分別，都歸於烏有了。假如將服務的標準忘記了，剩下的惟一標準，便是財富；一個貪得的社會，尊敬財產之享有，正如一個職務的社會，尊敬創造的藝術一樣，即使他是個最低的與最勞苦的工人。

所以財富成為公共尊敬的基礎，那些大多數做工而不得財富的人，比起少數以好運氣或善用經濟機會而得財富的人來，反被看為鄙俗，無意識，與不足輕重。他們不被看為值得產生任何財富的獨一的目的，卻被世界看為機械，這個世界以勞工的事為無趣與污穢，不願意與他接

觸致被污染。他們不快樂，因為除了最窮的人以外，他們的酬報，不僅是錢，而是同類的尊敬，他們也知道他們不是如兵士之受尊敬，雖說他們捨了性命造成文化，纔有一個值得受兵士保護的文化。他們不受尊敬，因為社會的欽慕，不是趨於那些施與的人，乃是趨於那些獲得的人；工人所施與的雖多，所獲得的卻少。那些受工人供養的享租金的人也不快樂，因為他們拋棄限制財富獲得的職務思想，他們也就拋棄了能與財富以意思的惟一原理。所以除非他們能自信財富自身是可嘉的，他們雖能沐浴於社會的欽慕之中，卻不能尊敬自己。因為他們取消了，使活動有意思，可以就可貴的原理。他們實在比許多妒嫉他們的人，還要可憐。因為他們好像地獄的鬼一樣，欲望的獲得便是他們的懲罰。

一個受這種思想支配的社會，一定是無理性的不平等的犧牲品。要逃脫這種不平等，必須承認一種原理，來限制各階級或各個人的進款，因為從幾種來源所得的進款，或超過某種限度的進款，是不正當的。這種限制含有一個區別的標準，是與假定每個人都應享他所能得到手的東西，不管交換所盡的服務是甚麼，是不相容納的。所以一七八九年的福音所驅逐出去的特殊

利益，帶著新假面具回來了，他不是如以前是不平等的法律權利的產物，阻礙心與力的同等能力的自然活動，乃是在財產、遺產，與全套的社會制度使機會不均的世界之內平等權利之行使所生出來的不平等的權力的產物。還有一件，不平等的事，使生產趨於錯的方向。因為一個五萬鎊的進款的需要的吸引力，是等於五百個一百鎊的進款的需要，就使精力從生產財富方面移向增加奢侈品方面，致使這種現象發生，例如英國人民有十分之一是擁擠過度，但是一大部份人民，不從事於供給這個居室的不足，卻從事於製造富人的旅館，奢侈的遊艇，與汽車，如陸軍總長所用的汽車『內面是紅木鑲上銀子，並有黃皮的墊褥，』這個汽車最近為城外的一資本家，出一萬四千元美金的小價買去，正為鼓勵有益的工業，並以私人節儉的模範，阻止公家的揮霍。

所以每年出產的貨物，所稱為財富的，嚴格的講起來，都是浪費，因為這些物件，雖算為國家進款的一部份，是屬於應當候他種物件已經出產夠用之後纔產出來，或是屬於完全不應當產出的。有一部份人從事於製造一種任何人都不能快樂製造，或製造而不免失去自尊心的東西，因為他知道最好是不製造這些東西，製造他們便是浪費生命。大家都承認，軍用品包工的人，在

戰時用數百工人，在他的地上挖一人造大池，不是加增乃是減少一國的財富。但在和平的時候，有千萬的人，雖非從事於挖池，卻從事於同樣愚昧與浪費的工作；雖說在平時亦如戰時，有些重要的工作等著要做，但被人遺漏了。這樣工作之被遺漏，是因為大多數人有效的需要太少，同時有少數的階級，穿幾個人的衣服，吃幾個人的飯，住幾家的房子，生活幾個人的生活。只要少數人繼續有很大的進款，而這進款的一部份用起來又一定的是用在不關重要的東西上，人類一部份的精力與一國的機器設備，必繼續從使他富有的重要事業上移到使他貧乏的不關重要的東西上，因為要製造這些東西，就不能不犧牲別的東西的製造。假若這些向礦工與碼頭腳夫宣講生產本分的貴族與富翁，要加增財富，不要加增浪費，達到他們目的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將他人全年收入超過（例如）五千美金的部份，移歸公家，使之不用於養花匠，汽車夫，僕役，與倫敦西城的店家，而使建築工匠，機匠，與教員得以工作。

所以對於現在許多人的呼叫『生產，生產，』只有一個簡單的問題來作回答，就是『生產甚麼？』是生產衣服，房屋，美術，學問嗎？這是完全同意的！若是一國這些東西的供給不夠，豈不應

當將攝政街倫敦最時之街道店鋪窗內所裝滿的別的東西，停止製造嗎？假若他希望爲工業添設機器，爲鐵路添設車輛，豈不應當停止開展覽會來鼓勵富人添購汽車嗎？當現存的生產力的一部份誤用了的時候，去要求必須加增生產力，有甚麼事比這還兒戲呢？少造無用的東西，是否與多造重要的東西，一樣的重要，或爲其一種的條件？『多生產』豈非與呼叫『減少私人奢侈』一樣的好嗎？但是一個在社會組織上與工業活動上不認有目的的意思的社會，對於這個不平等的結果的現象，是不能阻止，抑制，或認識的。因爲認識他，就是承認在經濟勢力的機械的活動之上，有一個原理，應當決定各種職業比較的重要，這樣就可以廢棄以財富爲目的不問其成分如何的眼光，與以一切經濟活動同屬正當的眼光。

目的觀念之否認，還生出一個別的結果，是大家所惋惜而不能阻止的，除非放棄一個思想；這個思想，就是說權利的自由行使，是社會的主要利益，盡義務是個次要的與偶然的結果，可以隨他自己看顧自己的。這個結果就是社會生活變成一個激烈衝突的場合，而一大部份實業，是在這隱藏著的社會爭戰的休戰期間進行的。有人想到工業的平和，可以僅用機敏與忍耐獲得，



這樣思想是由於以爲從事工業的幾個階級根本上有相同的利益，偶爾爲不幸的誤解所破裂。這兩種觀察，都是幻想。有關重要的爭執，不是由於誤解了利益的一致，乃是由於對於利益的分歧明瞭得更清楚。雖說正式宣戰是偶然的事，但使宣戰發生的情形是永久的，使這些情形長在的原因，就是對於工業的觀念，這個觀念，也使不平等與無職務的進款永久存在。這便是否認工業除了經營者自己的滿足外有任何的目的與意思。

這種的動機產生的工業戰爭，不是不幸的偶然事件，乃是不可避免的結果。他發生工業戰爭，因爲他的教訓是，每人或每階級，都有權享受他們力所能得的東西，不承認除了市場的機械動作外，有甚麼決定他們應得的東西的原理。因爲可以分配的進款，既然是有限的，因此當超過某種限度的時候，這個階級所得著的，既然一定是那個階級所失去的，各階級彼此間的進款，若不由他們的職務決定，除了彼此以自動的方法來決定外，別無他法，這是顯而易見的事。他們或因爲私益，不以全力來強行他們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之下，工業就有和平，正如人以均勢求國際和平一樣。但維持這樣的和平，是因爲其中的團體計算公然交戰所得不償所失，而不是因爲他

們承認甚麼報酬的標準，作爲他們要求的公正的決定。所以這樣的和平是不穩固的，不誠心的，不長久的。這樣的戰爭是無止境的，因爲僅僅的加增進款，是與對於物質上任何別種欲望的滿足，一樣的無止境。要求承認之後，舊戰爭就在新的水平線上重新開始，只要人繼續的僅求以加增報酬來停止這戰爭，不尋覓一個原理，來作一切大小報酬的基礎，這個戰爭總是要重開的。

這樣的原理可以由職務觀念中得來，因爲實行這個原理可以除去爲衝突原因的剩餘，可以使人明瞭報酬是根據服務的，不是根據運氣，特殊利益，或利用機會去做一件很心的生意的能力。但近代工業實行的信仰，使個人或團體有無限的權利去盡量的任意利用經濟機會；職務觀念，是與這個信仰不並立的；人既不承認這個觀念，只能甘於用武力來解決這問題，或者提議國家用武力來代替私人團體的武力，好像原理之不存在，可以用一個新機關來補救一樣。但是工業戰爭的真正原因，永遠是簡單的，正如國際戰爭的真正原因一樣。這個原因就是：假如人不承認在自己欲望之上，有較高的法律，當他們欲望起衝突時，就發生戰爭。因爲交戰的團體或民族，雖願意屈服於較他們兩方面爲高的原理之下，卻無理由希望他們屈伏於彼此之下。

所以富人常有的思想，以為只要財富的出產加倍，大家都比從前富一倍，工業的爭論就可消滅，這種思想不但受事實上的經驗的反駁，並且從自身性情上看來，是個幻想。因為這不是多寡的問題，乃是比例的問題；一個人不願意每星期賺八十元美金，卻爭一星期一百二十元美金的工價，正如爭二十元與十六元的比例一樣，假如沒有一個原因告訴他為甚麼只能得八十元不能得一百二十元，假如還有別的不做工的人，也得了報酬。假若當取煤的一切無用的消費都除去的時候，曠工要求增加工資，就有一條原理來對付他們的要求，就是說一階級的工人，不當侵佔別人的生活。但是當礦主繼續抽收礦稅，而出產特別豐富的礦對於不在場的股東，付給百分之三十的利息的時候，沒有正當的回答來應付增加工資的要求。因為假若社會對於不做工的人，可與以甚麼報酬，對於做工的人，就能多付報酬。所以那個率直的怨言說工人是永不知足的，嚴格說起來是對的。不但工人如此，即社會的各階級亦是如此，假如那個社會行事的原理，承認財富是屬於能得著他的人，而不是依照職務的比例。他們不滿意，他們永不能滿意。只要他們繼續以那個原理為他們個人生活與社會秩序的指導的東西，除了無量數以外，沒有東西能

令他們滿足。

\* \* \* \* \*

所以一方面對於權利的普遍的堅持，一方面對於職務的普遍的放棄，使人進入萬惡的輪迴道中，逃不出來，除非逃出宰制他們的假哲學。但是他的結果還不只此。他能使假哲學的自身，更現得可取與有趣，使他不但在爲他發生的地方的工業界中，並且在政治、文化、宗教、與社會生活範圍全體之內，成爲一種標準。人類生活的一方面，假若過於擴張，便有遮蔽其他一切方面之可能，甚至使他們失其功用，這個情形是英國人於『德國軍備主義』的榜樣上所熟知的。軍備主義不是陸軍的特性，乃是社會的特性。他的精神不是軍事預備的某種情形或程度，乃是一種心理的情形，這種心理，因爲他集注於社會生活中之一種元素，結果將他抬得很高，令他成爲其餘一切的標準。武力存在的目的忘記了。人就以武力是藉著自己的權利存在，不需甚麼理由。人不將武力當著一個不完全的世界所必需的器具，而將他升爲一種迷信的崇拜物，好像世界沒有他們便是個暗淡可憐的地方，使政治制度、社會組織、思想、道德、與宗教都被壓入一個模型之

中，使合於一種活動；這種活動在健全的社會裏面，是個附屬的活動如警察，監獄之維持，溝道之清除一樣，但在一個黷武的國裏，便成了社會本身神秘的總括。

英國人看得很明白，軍備主義是一種符物的崇拜。崇拜他好像人將靈魂跪在偶像面前毀其身體以取悅於偶像一樣。他們所未看見的，就是他們敬拜經濟活動，工業，與所謂商業，也是一種符物的敬拜，他們虔奉這個偶像，正如普魯士人崇拜軍備主義一樣，徒然的自己受些痛苦，行許多無意識的談諧事而已。軍備主義的遺風與精神對於普魯士所做的事，就是商業遺風與精神對於英國所做的事，前者的結果是造成黷武主義，後者的結果是造成工業主義。工業主義不必為經濟發展的國家的特性，正如黷武主義不必為有軍備的國家的特性一般。工業主義不是在工業上應用科學的結果，正如黷武主義不是在戰術上應用科學的結果一樣，若說工業主義是一個用煤鐵與機器的社會所不能避免的事，這個意思不但不對，並且本身就是工業主義所產生的心理顛倒的結果。人可以隨使用甚麼機器，而不因用他們得著害處。毀滅他們靈魂的東西，就是他們讓機器來用他們。總之工業主義的精神，不是工業的某種特別方法，乃是一種對於

工業的重要的估計，使人以工業爲獨一的重要事件，所以他從人類利益與活動中應當佔有的附屬地位提高成爲一種標準，用他來批評一切別的利益與活動。

一個內閣官吏，都宣言一國的大地位，繫於出口貨的多寡；照這樣說出口比較少的法國，與幾於無出口貨的以利莎伯皇后時代的英國，大概是可憐的完全低等的文化了，這便是工業主義。這是將生活的一小部份與生活的全體相淆混。製造家因爲有人提議十四歲的男女每星期當上學八小時，就大呼並用刀殺傷自己的時候，教育局局長對於他們的恐慌大爲動心，就立刻允許將時間減爲七小時，這便是工業主義。這便是崇拜符物。假如一個政府要錢打戰，將博物院關閉了，戰事每日需用二千八百萬元美金，而博物院每年只需八萬元，這便是工業主義。這個主義就是對於一切不能明白的爲經濟活動有供獻的利益，都加以藐視。假如新聞界喧叫，能使英國成爲理想國所必需的東西，便是生產，加增生產，再加增生產，這便是工業主義。工業主義，對方法與目的，淆混起來。

假若人不能明白的看出來，重要的東西不是方法，乃是目的，假若他們忘記了使經營工業

有意思有任何價值的東西，乃是他的社會目的，他們就永遠會將方法與目的混淆起來。這樣辦法是將全世界顛倒了，因為看不見世界應當藉以轉動的兩極。所以他們完全工業化如英國的時候，他們的行為便如完全武力化的德國一樣。他們說話的神氣，好像人是為工業存在，不是工業為人存在，正如普魯士人說人為戰爭存在一樣。他們對於一切不附帶這個優越利益彩色的活動，加以嫉視，因為似與之為敵。所以他們毀滅宗教，藝術，與道德，除非他們是心無所蔽的，這些東西不能存在；他們既然為做方法的工業，毀滅了這些做目的的東西，他們就使實業的自身，與他們的城市一樣，是個不自然的淒慘沙漠，只有善忘纔能忍受，只有紛擾纔能使他們忘記。

這樣的社會為猜忌攻訐所分裂，貪權而忘義務，希望和平而不能『尋求與得著和平』因為不願意放棄為戰爭原因的信條；除國際的世界外，還有甚麼別的可以作比譬呢？國際的世界也是一個社會，但他的社會性質，也不過是個空名。這樣的比譬不僅是在字面上玩弄。這個比譬是根據歷史上的事實的。前兩世紀看見了一個新工業制度的新發展，亦看見了一個國際政策的發展，於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達於極點。這兩種東西是同一精神的表現，他們的動

作，是遵守相似的公律的。前者的精神是不承認除了個人思想以外有較高的權力。因此人可以自由的尋求他們自己的利益，野心與欲望，不以受任何共同信仰的中心而受拘束。後者的精神是否認在有主權的國家以上有較高的權力，這個國家也是被看為一個緊密的，自足的單位，這個單位若對於別國失去獨立，便失去自己的精神的本身。所以這一個使國家從武斷的附屬於外國民族或政府之下，得著解放，使他們變成民族，有權解決自己的命運；正如那一個使經濟的活動從陳腐的習慣的網羅之下，得著解放一樣。

國家主義之在國際，就事實上說起來，是個人主義在國內的對照。他有相似的起源與趨勢，成功與毛病。因為國家主義，如個人主義一樣，是側重各個分開的單位的權利，而不是側重順從公共義務的，不過他的單位是種族或國家而不是個人。他掀動主張自己權利的天性，許以無限發展的機會，亦如個人主義一樣。他有偉大的爆炸力，亦如個人主義一樣，必先允許他正當的要求，然後纔能用別的代表原理來約束他的行動。因為人不能在國家以上的權力，加諸發怒的，不平的，或被壓制的民族，正如人不能用社會來約束經濟原動機一樣，除非社會承認一個這些



動機可以正當佔有的區域。國家主義假若是擴充到論理的極點，亦如個人主義一樣的自取滅亡。個人主義起初是主張個人盡力自造生活的權利，結果對於大多數人被那些藉著好運氣，或特別機會，或特殊權利利用他們的權利成績最好的少數人所制服，加以姑息，正如國家主義在燦爛的少年時代所要求的是國家自決權，後來多半進而要求制服別的國家。這兩種主義同時起來。假如他們衰落，恐怕亦是同時衰落。因為生活不能分成不相聯屬的部份。結果，世界在戰時所得的，就是在平時所種的。只要在國內的工業秩序，使那些以奮爭自大為生活的人得成功，要想驅除國際的競爭，不過是個夢想，並且不是個美的夢想。

所以國家主義的歧誤是帝國主義，正如個人主義的歧誤是工業主義。這樣的歧誤不是由於人性的弊病或惡事，乃是由於思想之所必至，因為原理有毛病，所以顯出他的力量的時候也顯出他的毛病。因為這個原理以國家與個人的權利為絕對的，那是錯了，而不以為他們只能在自己的範圍是絕對的，並且自己範圍的自身，是依靠在國際的或個人的社會所盡的地位，那纔是對的。所以他們被迫去求無限發展的事業，在這個事業中，因為他們求以有限的東西，都歸自

已，以達無限的境界，就毀滅大陸，海洋，法律，道德與宗教，最後就毀滅他們自己的靈魂。同時他們的仇敵，人民，與他們自己都覺著勢力對抗的危險，求以組織均勢得著和平，免去衝突。這樣的均勢，無論在國際政治或工業上，都是不穩固的，因為他不是基於共同承認的一個原理，來限制國家或個人的要求，乃是求尋出一個可以避免衝突而不放逐無限制的要求的平衡。這種平衡是尋不著的，因為在一個軍權與工業權的增長機會不能受限制的世界中，這種平衡是不存在的。

所以只要人繼續在這個平面上行動，是尋不著一個解決的。要得著和平，除非是放棄無限制行使權利的要求；這個要求便是戰爭的緣因。總之以往五年間我們所見的事，在國際界與工業界內，是社會組織的傾覆，由於將權利與義務分開了。全部的瓦解有一日是免不了的，因為這個基礎太窄。因為權利不過是一種法律允許的權力，律師稱之為『一人以國家的幫助來約束別人行爲的能力』，權利之不當爲絕對的，其理由正如權力之不當爲絕對的一樣。個人有絕對權利，是比國家或政府有絕對權利好些，這是無容懷疑的；十八世紀人權絕對之宣言，是對於國家誤用絕對權力之反動。對於一種絕端的主張最明顯的反抗，是對方的絕端的主張。因為政府，

與封建制度的餘物，侵犯了個人的財產，所以有財產絕對的主張；因為他們妨礙事業，所以纔主張各人有天然權利，自由的做他的事務。但實在講起來，這兩種主張，都是錯的，假若實行起來，結果一定是，不幸的。國家無絕對權利，因為是受職務的限制。個人無絕對權利，因為他是社會的一份子，他的權利是與在社會中所做的職務有關係的，因為權利除非是這樣的受限制，其結果必致如私人戰爭一樣。總之，一切的權利是有條件的，是第二重的，因為一切的權力是有條件的，是第二重的。他們是從所寄託的社會的目的與意思得來。他們的條件是用以助長那個目的的達到，不是妨礙這目的。實在說起來，這個意思就是，假若社會是健全的，人必不將他們自己當作權利的主人，而是一種盡職務的受委託的人，並且是社會目的的器具。

## 第五章 財產與創造的事業

社會組織應當以職務為基礎，這個原理的應用，不是隱祕的，而是簡單的與直接的。第一可

以使人有一個標準，區別甚麼種類的私人財產是正當的，甚麼種類不是的。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之間，政治學說對於財產遊移於兩種觀念之間，這兩種觀念，徑途各殊，而皆是過分的。一方面，爲社會組織實際基礎的學說，是以任何時代存在的私產種類爲神聖不可侵犯，任何物件都可正當的成爲財產權利的目的物，一經成立，所有權是絕對的與無條件的。近世工業的成形，正是這種財產學說盛行的時候。美國的憲法與法國的人權宣言，都以財產爲基本權利之一，政府的存在，是爲保護他們。英國一六八八年的革命，雖說無狹義的信條並且很緘默的，但在事實上有同等的結果。主張個人主義的大學者從洛克 (Locke) 到土爾加 (Turgot)，斯密亞當 (Adam Smith) 與邊沁 (Bentham) 用的言語不同，所說的卻是相類的意思。雖說照英國上級社會的眼光看起來，法國革命的兇悍性質是由於對於財產的待遇，但法國雅各賓黨 (Jacobins) 對於財產的神聖的信條，是如英國保守黨一樣的堅持；許多現在保守黨所持的財產絕對的學說，不但與一七八九年的人，並且與憲法會議的人所持的相同，不過他們不知道而已。

從另一方面看來，攻擊是與保護幾於一樣的無區別的眼光。『私人財產』是過去一百年

間社會運動所攻擊的中堅目標。批評的範圍，由在最簡單最親身的必需品上行幻想共產，到庸凡的與半實現的計畫，將幾種的財產，由私有改爲公有，或由國家加以限制，以限制他們的利用。他的側重與方法雖不同，但可以便利的稱爲社會主義。對於財產的批評的大意，都含在社會主義這個名詞裏面。他的精神，是說明社會的經濟的痛苦，根本的由於在近代工業組織情形之下，私人財產的無規則的活動。

意見之分歧是自然的，因爲多半討論財產的時候，對方的學者討論的東西，普通各不相同。財產是極不明瞭的一個種類。包含許多的權利，中間除了都是由個人行使由國家強制執行以外，別無共同之點。除這些形式的特點外，他們的經濟的性質，社會的影響，與道德上的理由，是極不同的。或是有條件的如專利之給與，或是絕對的如地租之享有，或是有期限的如版權，或是無期限的如世產，或是概括的如主權，或是有範圍的如道路權，或是密切的親身的如衣服書籍之享有，或是遐遠的，不可捉摸的如金礦或橡皮園之股份。所以要攻擊或擁護財產，而不說明所指的是何種，是無益的事。新聞界說『私人財產是文化的基礎，』與普魯當（Proudhon）說財產

是盜竊，至少有一點相同，就是兩方面的話，因為沒有另加界說，都是無意思的。對於某種財產加以擁護，或毀滅的論證，在別種上或不能適用，在一個經濟組織的時代所認為最後的理由，在下一時代，或幾於無關係。好的辦法是不概括的來攻擊財產，也不概括的擁護他；因為不能因為僅名詞相同就說東西的性質相同。必須將本身最後不過是一種抽象的名詞所附麗的不同的實體區別出來。

各種財產權的起源與發展，是於這個討論不關重要的。不管他們成立或受承認的程序是怎樣的，但英國私人財產歷來相傳的理由，是因為他含有一種保障，使每人可以享受他所種的東西。邊心（Bentham）說：『假若我不能希望享受我自己勞力的結果，我的生活是無長久計畫的；我不願做事使我的仇敵獲益；』這些話在精神上都是重說洛克（Locke）的話。他們論辯說，財產是個道德的權利，不僅是法律的權利，因為保障生產人的勞力的結果，使不致為暴力奪去。這個學說所從傳下來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相較，有三點明顯而重要的不同。地產與多半工業所用的簡單資產，以前是分散很廣的。在資本制的農業與資本制的工業未興起以前，土地或

器具之由用他們的人的享有，或至少是由他們穩固的或實際的佔有，是在田中或工場中有效的工作的預先的條件。危害財產的勢力，是政府的財政政策，與幾國中如法國的封建制度朽壞的遺跡。這兩種的干涉，都是將那些做有工夫的人，犧牲於不做工的人。反抗他們便是保護財產及與財產不能分開的工業。許多的時候反抗是無效的。福爾太（Voltaire）看慣了法國農民的困苦，驚訝的說英國的農民還能發財并且『敢於加增牲畜的數目，或用瓦蓋房頂。』英國的議院黨人與以財產權之不可侵犯爲他們政治哲學之中心點的法國哲學家，他們保護有產的人時，也附帶的，或有時無心的，保護那些作工的人。他們保護的是農夫，或工主，或商人，不教他們勤勞的結果，浪費於聖雅各（St. James）的寄食人或凡賽爾（Versailles）的諂媚的寄生蟲身上。

私人財產的理由，是在使勤勞的人，得以享受他所種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之下，這個學說不但是個似是而非的東西，並且依大多數人的關係看，幾乎是個自明的真理。財產被擁護爲權利中之最神聖者。他之受擁護，不但因爲他是行使很廣的權利，乃是爲行使供給衣食的積極的

職務所不可少的東西。財產多半包含兩件東西的一件，或爲業主用以生產的土地與器具，或爲文明生活必需的或適意的屬於個人的東西。前者的理由，是因爲農夫的土地與工人的器具，是盡社會所需要的經濟服務所不可少的條件；後者的理由，是因爲家具與衣服是適當生活與安樂生活所不可少的東西。那些不以工作，而以盜劫勢力得來的財產權——自然他們是很多——不受批評的攻擊，是由於幾種的財產，廣遍的散佈於民間，而至少在英國那些比較粗笨的盜劫權利，已逐漸減少。因爲地產與所存在的簡單資本是普通的散佈於社會各階級，因爲在英國大部份，代表工人的不是小工而是農夫與小工主，他們可以指出所耕的一段地與所織的布，又因爲死時遺留的財富，多半是土地，家具，與幾與財富無分的商業所需的一切東西，在這些情形之下，財產享有權的道德根據，是自然明瞭的。這明明的是用於生產，獲得，與管理財富的勞力，學者是如此說，平常人亦是如此看法。

這種財富不是社會的擔負，乃是他的康健與實效與繼續生存的條件。保護他就是維持藉以供給公共必需品的機關。假若農夫從田莊上被逐出，移出地方來飼羊，如土得朝 (Tudor) 的



英國一樣，或者受武斷賦稅與貴族田租的摧殘，如十八世紀的法國一樣，田地就荒蕪起來，全國就缺乏糧食。假若木工或鐵工的器具被搶奪了，犁就不能修補，馬脚也不能上鐵。所以在商業文化未興起以前，政治家的本領的標記，是在保護小業主，甚至以此得罪大業主，這是在土得朝 (Tudor) 的英國與在亨利第四 (Henry IV) 的法國一樣的。農夫是民衆心理中理想的人物——『是國家的約瑟夫 (Joseph) 拯窮民於饑饉之中』——並非因為農夫有財產，乃因為他自耕其田，民衆心理所痛斥的，是『集多數人的生活，於一人之手中』，但這卻是資本社會所淡然看為不可避免的，並且似乎是可貴的經濟發展的結果；所痛罵的是取利的人，乘鄰人之危，安坐而食；所驚惡的是一些人對於公益的漠視，『心中既無上帝亦無一國的利益與好處，將全城或全村用籬或堤收圍起來』，並且民衆心理很強，足以勉強政府來干涉，以禁止荒廢田園或收攬織機——總之對於財產的發展範圍，設個限制。

培根 (Bacon) 在亨利第七 (Henry VII) 的面前，建議保護小農的租地權，在下議院請求較嚴的土地法律，他說『財富如糞，要散開纔有用處』，這個金句，是代表從十五世紀末年的

福得斯鳩 (Fortescue) 至十七世紀中年的赫令吞 (Harrington) 的一切政治學者的陳言。西西耳子爵 (Lord Hugh Cecil) 有力的論證對於財產權之享受當依賴他的用處的學說加以攻擊，近世保守黨人每喜在字面上引用這個論證，但他們要記得西西耳子爵自己的學說，使他的祖宗在墓中不安。十九世紀以前西西耳家中有兩個有名望的人，父親勸皇帝阻止地主逐出佃戶，並實行建議各階級所享有的金錢最大限度的限制，他的兒子在議院裏攻擊圈收田地，並使議院通過法律，強迫地主建造農舍，與小田一同出租，并闢牧場爲農田。

威廉西西耳 (William) 與羅伯西西耳 (Robert Cecil) 是聰明與負責任的人，他們的意見，以爲財產的保護是與對於業主執行義務相連的，這是他們同時的許多人所公有的意見。若說私產制度可以使業主有權以自己喜歡的方法，用他或不用他，若說他的主要意思是在供給他的進款，不問他盡甚麼職務，這種意思，恐怕不是那時候多半的政治家所能懂的，即使懂得，他們中間較愛名譽的，亦必憤然的否認。他們覺得財產的意思，是在所盡的公共目的，無論是農人生產食物，或紳士處理公事，他們對於那些盡了義務的權利，決然維持而不疑，對於那些似乎

與義務衝突的使用，是決然的抑制。財產是幫助創造事業的東西，而不是代替他的。享專利權的人因為新發明得著保護，是為使他能享受他思想的結果，但食他人的勞力而肥的營獨佔事業的人，是應當除滅的。依一村的法律，農夫之種田，不是看如何於自己最有利，乃是生產這一村所需的穀類。直接的干涉因政治的變遷久久不行，在英國上級的地主，無論如何的無常與武斷，繼續蓋一種職務，這彷彿是覺得他們因田產的原故，對於公共服務的供獻。法國的貴族，完全放棄業主的義務，幾與今日的業主一樣。他們的報應就是使保守權利放棄職務的貴族的地位受了攻擊。總而言之，財產的根基，不僅是便利或貪得的欲望，而是道德的原理。財產之受保護，不僅是為業主，乃是為那些工作的人，與工作所供給的人。財產受保護，因為財產不安全，財富就不能產生，社會的事業就不能進行。

\*

\*

\*

\*

\*

\*

無論將來所含的是甚麼，但過去的歷史已指出一個優美不過的社會的秩序，在這個社會裏，大多數的人民是自耕其田與自用其器具的主人，可以同英國的農夫一樣的自豪，說『自食

其力，知道後代的衣食有着，於心很安。」那些主張社會的組織當以職務為基礎的人，對於這種的財產觀念及其在社會制度上的實際表現，是無異議的。這是與他們自己的學說相合的，因為財產的理由，是根據於業主藉著他所能盡的職務。他們所要求的，不過是這樣的學說應當擴充到他的論理的結論。

因為這個論證明明的不止有一個鋒口。假若他以幾種財產為正當，就以別種的為不正當；在近世工業文化情形之下，這個論證所認為正當的是比認為不正當的為少。實在的情形是，這種財產學說與其所託體的制度的壽命，已延長到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裏社會組織的全體，根本的與這學說成形的時代不同，而這個時代即未以這個學說為所有財產的正當理由，至少是最普通，最特著的種類的財產的正當理由。這不僅是由於國家財富之大部份的所有權，今日是集中於幾千百家的手中，也不僅由於一個時代起頭是承認財產權利，末了產業權實不是普及於多數人手裏。也不僅是因為財產今日之不穩固，不是由於非法的帝王的武斷徵取，或懶惰的貴族的特殊權利，乃是由於財產自身無止境的擴張與集中，這種情形，使財產除最大的以外，如

小工主，小店家，鄉間的銀行，都有被吸收的危險，使人類的大多數成爲無產的階級，在那些有錢人的代理人下工作，並爲他們的利益工作。

有個特別的事實，可以將多半的近代財產從工業時代以前的財產區別出來，可以將從前贊助他的理由移來攻擊他，就是在近代的經濟情形之下，財產的享有不是積極的而是消極的，照今日多半的業主看起來，財產不是工作的器具，而是發財與行使權力的器具，所發的財對於職務有何關係，所行使的權力對於責任有何關係，是沒有把握的。照價值講起來，現有存在的財產權利中，只有一小部份，可以認爲是實行職務所不可少的，如農夫的地，工人的器具，與爲康健的有效的生活所必需的屬於個人的東西。從每年在喪事的時候遺傳下來的財產看起來，近世的工業社會財產的大部份，不是屬於個人的東西，如家具，經商一切的必需品，而是各種的權利，如礦稅，地租，自然最重要的是工業的股份，這些股份所產生的進款，是與股東個人所進的職務，完全沒有關係的。通常是將享有權與使用分開的。近世財產之大部份，都化成一種對於工業出產物的優先權或擔保物，這個優先權或擔保物附帶有酬報的權利，他的價值尋常是恰恰因爲他

可以免除主人進積極的或建設的職務的義務。

這種財產可以名爲消極的財產，是爲獲得，爲利用，爲權力的財產，是與主人積極的用以進行事業或贍養家室的財產有區別的。照律師看起來，前者之完全爲財產，自然是完全與後者一樣的。然而經濟學家是應當名之爲『財產』或應當像何伯生 (Hobson) 所提議的名之爲『非財產』 (Impropery) 還是個問題，因爲他是與那些使主人獲得自己勞力的報酬的權利不符，并且是相反的。用這個區別做根據，將財產分類起來，是頗有教訓的。假若依他們對於這兩極的距離的遠近排列起來，我們可以看出來他們散處於一條線上，從明屬於個人服務的報酬與條件的財產起，到純粹屬於別人的服務而實際上是一種私稅的報酬的財產止。若將細節與限制除開，大概的秩序是如下：——

- (1) 財產之屬於個人服務的報酬的。
- (2) 財產之屬於爲健康舒服所不可少的個人的東西的。
- (3) 財產之屬於主人所用的田地與器具的。

- (4) 財產之屬於著作家與發明家的版權與專利權的。
- (5) 財產之屬於純利的，含有許多的農業租金。
- (6) 財產之屬於機會與好運氣的：即『準租金』。
- (7) 財產之屬於專營事業的利潤的。
- (8) 財產之屬於城市地租的。
- (9) 財產之屬於礦稅的。

前四項財產明明的是與做工作相伴的，並含有一點條件的意思。後四項明明的不是如此。純利與兩方面都有點關係。因為純利代表一種必需的經濟代價，不論享有財產的法律上的辦法是怎樣，與這代價相同的東西必須要產生出來，所以就與代表利潤（但除去與薪俸及必需冒險的報酬相等的東西）城市的地租，與礦稅的財產不同。但他能使享受的人不必做事，所以又像他們。

無論甚麼社會的決斷問題，在某一時代所維持的財產權（以價值論）是多半的屬於兩

大類的那一類。假若是屬於第一類，就可以鼓勵創造事業，抑制懶惰的事情；假若是屬於第二類，結果便相反。這些事實是時代與時代，國家與國家，大不相同的。這些事實也從未完全曝露於外；因為林中的獸王不在白晝獵食。恐怕至少一五五〇年至一七五〇年的英國，財產之屬於主人自用的田地與器械的，比同時的法國或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五〇年的英國為多，因為在法國封建的賦稅，吸收農人進款的大部份，而在英國新起的資本製造家獲幾百倍的利息，同時勞力的工人被饑饉所刺激起了無力的反抗。恐怕在十九世紀時，因為法國革命的關係，法國與英國變易了地位，在這一方面不但愛耳蘭即英國屬地也像法國不像英國。這樣的變化在美國研究最好，在美國有許多地方，十九世紀初年的小農主與小工主，於三代人的時候，就被一個無產階級與資本的財閥來代替了。以平等之名，廢止農業封建制的經濟特殊利益，是法國革命的大動力，也是受法國革命影響的一切國家都會實行的，但這種情形，自一八〇〇年以後又多半被工業主義所產生的不平等所抵消。

在英國近來經濟發展的大概結果，是增加不勞而獲的財產權，減少可以正當稱為屬於職



務的財產權。前者的擴張，與形式較簡單的財產被吸收於前者的程序，這兩種運動的意義，是難於估計太過的。自然，財產中有許多的部份，仍然是屬於舊式的。自己作工的地主，與自營其業的資本家，總數雖仍不少，但他們所代表的組織，不是最足以代表近世經濟世界的。享有與管理分離的趨勢，財產普遍的化爲對於不相識的工人所出產的貨物的享有權，這兩件事是與資本工業的發展與城市文化的自身，一樣的不能誤解的。鄉村變成城市，地產以前是農人工作的田地，或地主經營的產業，現在變成『地租』與別的投資一樣的登起廣告來買賣。礦開了，地主的權利變成一種賦稅，每噸煤帶上地面，抽收若干。個人生意是工場制度初年的代表，自從合資公司代替他們以後，組織就從自己享有并管理其事的僱主手中，移到受薪水的職員手裏，而有產的人數又以享租金的人數之加增而增多，這些人投資於工業之中，卻與他不生別的關係。這種變遷在今日看得最明白，由於複式店代替零貿與小商，由於在製造工業中聯合與混合的組織，代替互相競爭的僱主所經營的單獨事業。自然，這種權利，不完全是由經濟發展來的。『肉是由吃肉的出來，甜蜜是由強者出來。』在野蠻的時代，人斥戰爭爲毀壞財產，但戰爭近來所產生的財

產權，恐怕比一切別的原因相加起來的還要多些。

這些財產權利的區別是無限的，但他們的共同特點是與應用所在的實際目的物完全隔開，化爲稀薄與化爲普遍，幾乎等於一種的錢幣，而不是與主人關係密切有如主人的一部份的財產。他們所代表的物質東西，是在經濟生活粗野的環境中製造與處置，但他們的魔力是在與這環境隔開。他們的危險也是在此。一個階級對於將來的把握，是在他所盡的職務上。天然所要求的是工作：工作的貴族，無論如何暴虐，少有失敗的；不作工的貴族少有存留的。假若失去功能，就離死只有一步，這是在社會與在生物界一樣的地主成了純粹享租金的人，工業不是由像在工業初期佔優勢的互相競爭的僱主的粗猛的精力經營，乃是由股東用薪金僱的僕人經營，這種情形日進步就使私產以不能尋覓一他代替的機關爲根據的理由失其應用，因爲他已經受代替了。

這些種類財產的理由無論是甚麼，但不能用農夫或工人的財產所用的理由。這些財產的必需不能說是爲使每人各食其勞力的結果。假如一個法律的權利，使英國北部的礦主或倫敦

的地主每年得著二十萬美金是『使人食其勞力的結果』這種結果是屬於業主的，勞力是屬於別人的。財產潛伏的仇敵，莫過於那些好意的無政府主義的人，因為他們以一切的財產同屬正當，就使這個制度，因為濫用而失信用。老實說，從事實上無論得甚麼結論，近世財產的大部份的重要特色，是使主人有不附帶個人服務的進款，無論他僅是一種的私稅，為法律容許對於別人的勞力所徵取的，如礦權與城市地租，或如一種資產，是對於一種器具的報酬權，這個器具資本家自己不能用而託之於能用的人。在這一方面地產的享有與財產的享有普通是相同的，雖說從別的方面觀察，還有重要不同之點。依經濟學家看來，租金與利息不同之點，是因為利息雖常有與他同歸於紅利的剩餘的東西相連，但他是一個生產器具的代價，代價不付，工業便沒有這器具，而租金是差別的剩餘，是不能影響供給的。從商界與律師界看起來，土地與資本，同為投資，因為他們有能不勞而獲進款的共同特性，區別他們是不道德的，雖說依經濟分類看來他們的意義也許不同，但依社會的制度看，他們的影響是一樣的。這是將財產與創造能力分開，將社會分為兩個階級，其中一個的主要的，利益是消極的享有，其他的一階級大半是倚賴積極的工

作。

所以近世與許多財產可以確切比擬的東西，不是小地主與工人的簡單財產，更不是家具與家庭可寶貴的安樂品，這種比擬是老實的書記與店家心裏財產二字所暗示的東西，假若有人說『財產』受危險，足以使他們發怒如受驚的羊一般。這就是劫去法國農夫產物一部份直到革命纔將他們取消的封建賦稅。礦稅與封建時代的五一之稅與遺產售賣稅有甚麼分別呢？他們有相似的起源，同為一種對於勞力所生產的財富之增加的一種私稅。城市地租與一八三二年改革法案以前領乾薪者所得的錢有何分別呢？他們同為作工的人對於不作工的人的一種供獻。假若用物稅的主人的專利的壓迫為不可忍，因為佃戶必用他的磨去磨穀，用他的榨去壓酒，資本家專制的神聖在甚麼地方呢？照政府的專利事業的報告看起來，資本家在『肥皂，煙草，牆紙，鹽，水泥與紡織品上，已有控制出產與價格的地位。』換句話說，就是能勉強買主依照他們所定的價錢，從他們手中購買，不然便完全的買不著。

一切這些的權利——礦稅，地租，獨佔事業的利潤——都是『財產。』對於他們致命的攻

擊不是從社會主義黨來的。乃是由通常擁護財產的理由來的。假若這個制度的意思是在鼓勵工業，使工人得享其勞力之結果，那末，由別人勞力的結果所構成的財產之宜取消，其重要正等於應當維持由自己勞力得來的財產。財產以職務受認為正當的擁護的理由，正是他以徵稅應當受排斥的理由。財產不是盜竊，但有許多的盜竊成爲財產。礦稅的主人，對於礦物既未發現，發展，或工作，不過享有；假若有人問他爲甚麼每年應得五萬美金的礦稅，就回答說『這是財產，』儘可以盡量的覺得這句話的威嚴。但實在他的行爲是如蛇一樣，退到後方去，佯裝爲一個死的樹枝，或如一個瘋子，躲在籬後面捉兔子，作聲如蘿蔔一樣。他的假裝的作弄，是自衛的，有時是挑戰的。他對於財產的觀念，好像一個簡單的工人，恐怕他所種的被人收穫。他的要求是繼續去收穫別人所種的東西。

有人說我們工業文化不雅觀的特點，如奢侈與窮乏之相連，階級之分與階級之爭，是偶然的，不調和，這不是植根於本身的中心的東西，不過是一種贅疣可以由經濟進步的自身將來補救。假若一察看土地與資本私產制度在工業社會的活動，這種適意的樂觀是不能存在的。有些

國家土地是分散很廣的，如法國與愛爾蘭，他的效力或者使財富普及於同時享有與作工的中等階級的農人。但有些國家裏面，工業組織的發展，已經將財產的享有與工作分開了，私產普通的結果，是將由較肥的田地，較良的機器，與較精密的組織所生的剩餘，移歸於不作工的主人。這一個『租金公律』有個明瞭不過的引證，見於的更生 (Sir A. L. Dickenson) 供給煤業委員會的統計，他證明有一季一噸煤的出產費由三元一二至十二元，而利息由零至四元一二。因為所開的礦的成分比較的大，比較的容易達到，因為特別機會與易達的市場，因為較良的機器，管理，與組織，所分給股東的紅利，使特殊權利成為全國的制度，正如封建地主最武斷的徵求一樣。他是不平等的基礎，這種不平等不是偶然的，暫時的，而是必然的與永久的。階級制度的全套器具，是建築於這個不平等之上，不但使各階級的英國人的進款，也使他們的居室，教育，康健，與風尚，甚至於身體的形狀，彼此不同，好像這些少數人是外國人，住在一個窮乏的土著人種的粗野文化中間。

所以英國歷來相傳的私產理由，是使個人得享有他自己工作的結果，這個學說在成功的時代，雖大半可以適用，但現在已經受多半的政治學說的命運了。並不是爲反對的哲學所攻破，乃是爲經濟發展的平凡的進程所推翻。在人類大多數的關係之內，屬於個人的東西以外的私產通常還能夠滿足的需要，就是安全的需要，雖說這樣的滿足，是不完全的，是不穩固的。有產的大多數，是有小投資者，所有的不過現存財產之小部份，照他們看，財產的意思是簡單的。財產不是富有或權勢，甚至於不是免除工作的空閒。財產就是安全。他們做工是勤勞的。他們爲老年或爲疾病，或爲兒孫，積蓄點錢財。他們將錢財投入生意之中，利息就是他們對於所最怕的東西的一種保障。他們的積蓄是於工業方便的，他們從積蓄得來的進款是於他們自己方便的。他們問『爲甚麼我們不能在老年的時候，收穫精力的利益與少年時的儉省？』這個安全的欲望，是如此之急迫，所以受過財產誤用的害的人，與那些有藉這些誤用獲利的機會而不願意的人，都要容忍甚至於衛護這些誤用，恐怕去死肉的刀，割了活肉。他們看見許多人因爲得了乾地不滿意，反遭沉沒，即使乾地是一塊荒涼的石頭。他們看將來好像惡夢一般，能破這惡夢的，雖竊賊也受

歡迎。

安全的需要是根本的，我們的文化最嚴重的控案，幾乎就是人類大多數沒有這個東西。財產是組成安全的一個方法。所以將器具與目的淆混，與改革他的計畫之引起悲觀，是很容易懂的。在以往的時候，人類，道路，橋梁與渡船，民政，司法，與書記的官職，軍隊中的官職，都是私產。要取消對於他們所行使的權利就有人抗議，以為這個制度使儉省的人，將積蓄存放生利，並且是生活變動中所倚賴的保護，是老年所倚賴的安樂，要取消這些權利就要廢除這個制度。但財產實在不是保障將來的獨一的方法，即使擇定這個方法以後，安全也不是倚賴維持現在享有權普通所含的一切權利。假若他的心理的基礎是必需獲得一種穩固的確定的進款，以備不能工作時候的應用，并供給不能自立的人；在這種範圍之內，實際的要求不是能得某種事業變動不定的進款，這是附屬於資本享有的，乃是求得年金所有的安全。財產是器具，安全是目的；假若有個別的方法可以謀得這個目的，即使這個器具不存在，實際上不見得就失去自信，自由，與獨立。

所以今日不僅是勞工，即中等與專門職業的階級之求安全的，也日漸增多，工人階級在英



國自資本制度興起以後，少有積蓄很多，足以爲他們積極收入時代過去以後進款的保障中等階級與專門階級之求安全，不是在投資，而是在對於疾病死亡的保險，在購買年金，或積其薪俸之一部份爲養老金，俾薪俸停止時可以支用，事實上這是與買年金相等的。專門職業的人可以買股票，希望可以獲利。假若他所希望買的是安全，他的投資形式，通常總是一種的保險。教員，看護，或政府的僱員，可以希望養老金，五十年以前的女子，被看爲安全不能自立，好像女性是生來的不可救治的疾病，他們的父親，除非是有錢，恐怕不能積蓄安置他們，就很發愁，今日他們受教育，以專門職業自立，同是一樣的積蓄起來。但這樣的安置，仍僅屬於比較少數的人；幾乎凡在政府僱用外的勞工，許多在政府僱用內的，與多數的專門職業的人，在疾病與老年時代，是無依靠的。但有了這種預備，就足以應付這種安全的需要，照人民大多數看起來，安全的需要，除去屬於個人的東西與家具外，是財產的主要意思，而這種預備的辦法，爲安全起見，是比財產更爲安全與準確，這些事實不能因以上的情形而受改變。

即使用財產作保障將來的器具，但這種將來的安置，並不依賴維持今日與享有權相伴的

財產權利的全體。財產不是簡單的，乃是複雜的。一個人以積蓄投資成爲尋常股東，至少有三種權利，就是利息的權利，利潤的權利，與管理的權利。假若所希望的是維持穩固進款的保障，不是求不勞而另獲財富——只要他的動機是安全不是獲利——這樣的需要，可由資本上的利息來應付。與剩下的利潤權利，及利潤所從出的事業經營的管理，不必有關係，這兩種現在都在股東手裏。假若人只希望用財產做器具，購買安全，明瞭的辦法——從投資人的眼光看，希望爲將來妥籌一極安全的辦法——就是將自己的地位盡量的變成一種公債，享有人或受抵押品的人；他得著投資目的的穩固進款，但不冒危險，也不得投機者的利潤。這套煩密的財產權利，使做衣服生意的股東，得百分之三十的紅利，或每年以幾千磅的礦稅或地租與地主，後來又容許他們以不義之財的大部份，傳之後代，使他們也無謀生之必要，假若說爲寡婦孤兒的緣故，必須維持這些權利，這至少是極不對題的話，因爲寡婦孤兒之最大部份，是兩樣都沒有的，卽有，也願意盡換作一個安全的年金。這好像因爲人要洗澡，就將他丟在水裏，或者因爲人家受鼠害，就送他一個虎子，因爲老虎與貓兒，同屬於貓類。老虎獵食是爲自己，不是爲主人；食物稀少的時候，就要

吃主人。那些少有或沒有財產的人尊重財產，因為財產是安全。那些錢多的人，寶貴財產，別有原因。老實人若以為如小資本家這樣鄙俗的積蓄，除了在選舉的時候，於他們有甚麼興趣，他們卻在背後竊笑。他們寶貴財產，因為財產使他們寄生於社會之上，以公家的用費維持一個懶惰的階級。

自私的人說『享有，而不對於所享有東西，發生義務，是近於福利的。』有些人相信社會是應當為獲得私人財富而組織，以攻擊私人財富為背理為惡事，因為他們對於任何制度的問題是『他能產生甚麼東西？』照這些人看，無職務的財產是自然的。這樣財產對於享有他的人所產生的東西很多。還有些人以為社會的統一與事業的有效，必須社會的組織與財富的分配，都以職務為根本，纔有可能。這些人對於一個制度的問題，不是『他能付若干紅利？』乃是『他能盡甚麼職務？』有許多財產所生的進款，是與所做的事或主人所承認的義務不相關的，照他們看起來，這個事實不是一個好處，乃是一個壞處。他所生的社會紊亂，是這裏一些與服務不相稱的報酬，那裏一些完全無服務的報酬，並且到處是不滿意。照他們看起來，這個社會紊亂，是他們

理由的一個有力的證據，就是說將社會建在權利上面，將他純粹建在權利上面，是等於建在流沙上面。

從前原來是，現在仍可爲一種健全的與社會的制度，經可怕的擴充成爲絕對的東西，就生出多半的別種社會罪惡，因爲不做工的人制服做工的人，做工的人對於不做工的人，時而恭順，時而背叛，科學思想，與創造事業營養不足，因爲恐怕在這些事上面的費用，妨害了懶惰與無業人的安樂，社會許多附帶事業的安排，不是爲做有用的工夫的人的便利，乃是爲用錢最揮霍的人的便利，所以一國最可怕，最荒涼，最吝嗇的地方，是財富出產最多的地方，就是克來（Clyde）流域，南開夏（Lancashire）的棉業區域與蘇格蘭，韋爾斯的礦村，最快樂，最奢侈的地方，是財富消費的區域。從社會的健全與經濟的實效看起來，社會當以極廉的價錢，謀物質的設備，除去毀損與擴張的預備外，當以產物的全體分配於作工的人民與他們的家人。但現在的事實，勞工是以市場所許的極廉的價僱來（經過工人組織的限制），剩餘的東西，減去一點賦稅，分配於財產的主人。一年之內利息變化之範圍由虧折至百分之百。但工資之決定，是以獲利最少的公

司能每年繼續營業爲標準，這種剩餘，即使一部份由於經營有力，既不屬於管事的人，亦不屬於工人，而屬於股東。這種程序的意思，由今日在南開夏（Lancashire）的股票成堆的大資本，在非常活動的時候，易其主人看起來，十分的明瞭。現存股東所得的，等於估計出來的資本將來所生的利潤。工人以工人的資格，不能分沾這個價格的極大增加；假若他們將來要求增加工資，就有人回答說，在交易以前利潤計算是很大的，但交易以後，照股東所投的資本看，僅生出低率的利息。

老實說，在從前的時候，保護財產普通就是保護工作，但在最近兩百年經濟發展進行之中，這兩件東西的關係，幾乎顛倒過來。組成文化的兩種元素，是積極的努力與消極的財產，一個是人類的勞力，一個是人類所用的器具。這兩種元素之中，供給第一種的人，維持文化，改良文化，而享有第二種的人，通常指令文化的性質，發展，與管理。所以人類的大多數，雖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但實在是生活於他們中間少數人爲自己的利益而加於他們的規則之下，這些少數人的主要利益就是享有權。因爲創造的活動是附屬於消極的財產的，那些靠腦的工人，組織者，發明者，教

員或醫生所受的困難，幾乎與工人一樣。真正的經濟分歧，不是如平常所說的僱主與工人之區別。乃一方面是一切做建設工夫的人，從科學家到勞工，另一方面是一切以維持現存的財產權為主要利益的人，不問他們對於建設工夫，有無供獻。

所以在近代情形之下，財產的大部份集於少數人民之手，假若依着有財產的人的利益治理世界，要使結果對於做事的人滿意，不過是偶然的與僥倖的事。兩方面實在有不停的衝突。假若將財富換個方向，分給於不做事的股東的紅利的一半，可以使每個孩子受好教育到十八歲，可以為英國大學重新設立基金，可以使英國的工業添設備謀較有效力的生產（因為增進生產既然是重要的事情。）現在用以保護財產的心計的一半，可以使大半的工業的疾病如天花一樣的稀少，可以使英國城市的大半，變為衛生的，甚至於美麗的地方。阻礙的東西，就是一種學說，以財產權利為絕對的，不問主人做了甚麼社會的職務。所以執行最嚴的法律，仍是保護財產的法律，雖說保護財產，已不等於保護工作，而宰制工業，與在國事上佔勢力的利益，是產業的利益。一個廠主可以毒害或摧殘一個時代的工人，但他的同類官吏，可加以警告或罰金，就將他

放了使他可以毒害或摧殘第二代的人。貧民窟的兒童死亡率，每千人中二百，地主可以收地租；但在體面的社會裏面，他卻一樣的受歡迎。因為財產無義務，所以不能犯罪。在城市的外廓的地方，居民三個人一房，但地是不賣的。鄉間地方可以用作打獵，但鄉裏人離開之後還要受更大的擁擠。沒有公家的權柄來干涉，因為兩種都是財產。有些人相信，否認一切道德意思的社會，終歸傾覆；凡賽爾 (Versailles) 花園中有一個社會的無意識的輕浮與更無意識的炫耀的遺迹；照他們看起來，一個社會將保護財產與維持財產的誤用相淆混；是與上述的社會一樣的危險。

人愛和平麼？他們可以看出來，社會統一的最大仇敵就是不為社會服務合作的無義務的權利。他們以平等為可貴麼？使主人免於尋常人類工作的必要的財產權利，使不平等充滿社會的四角，從物質財富之分配起，至思想之練習止。他們希望增加工業的效率麼？但效率的致命阻礙，莫過於顯示懶惰是與勤勞有同等的利益，並且鏟子與錘子多打一下，就增加一分利益，分配於不拿鏟子與錘子的股東。

無職務的財產，實在是正當財產本身最大的仇敵。他是一種寄生生物，殺害產生他的機關。

錢逐走好錢，近兩百年來的歷史證明，爲獲得或權力的財產，與爲職務或使用的財產，彼此自由在市場衝撞，沒有限制如一種法律制度所加於放棄財產或遺產的，後者通常趨於吸收前者，因爲他的抵抗力較小。所以無職務的財產增加，但增加的時候，就毀壞了生產財產的精力。這種精力在以前的時候，正是財產所保護的。他不能使人趨於一致，因爲使人一致的東西，是對於共同目的服務的聯絡，這種聯絡是他所否認的，因爲他的精神，是維持權利，不問服務。他不能創造；他只能消費，所以近百年來世產之家所出的科學家，發明家，美術家或文人的數目，可以一手數盡。他既不重思想又不重美術，他所重的但是屬於財富的權勢與爲他標記的炫耀。

所以那些人畏懼這些好處精力，思想，與創造精神——這些人很多——不像我們所要做的一樣，去區別財產的形式與種類，使他們可以保存那些正當的，取消那些不正當的。他們要保存一切的私產，甚至於最腐敗的種類。寶貴那些好處的人，必求除去財產的錯用，以增進那些好處，使財產回復自己的真性情。他們不希望設立一個幻想的共產世界，因爲他們覺得，自由使用足夠的個人財富，是健康的與自重的生活所不可少的條件，他們必謀財產權利較廣的普及，這



些財產權利今日卻是少數人的特殊利益。他們必不承認一種率直的哲學，以一切財產權利有同等的神聖，只因為他們在名義上相同。他們必嚴行分辨甚麼財產是主人用以經營事業與贍養家室的，甚麼財產是僅為對於他人勞力所出產的財富的要求。他們必堅持，只有用作活動而不用作懶惰的條件時，與用以盡確定的個人義務時，財產纔是道德的與康健的。總而言之，他們必求以職務原理為財產的基礎。

## 第六章 職務的社會

在財產與工業上適用職業務的原理，是與幾種形式的社會組織相容的，好像比較重要的發明一樣，不會是那些呼叫『看這裏』、『看那裏』的人的祕密。重要的事，是人要將心思堅立在目的思想之上，使那個思想在附屬問題之上，佔優越的地位。工業的目的，是為供給良好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這既然是明顯的，所以凡可以增進這供給的效力的方法，只要不與更重要的

目的衝突，都是好的，凡阻撓，妨礙他的，都是愚拙的，譬如損傷教育，像英國爲工業損傷教育，是愚拙的事；因爲工業的一個用處，是爲供給財富，使教育有改良之可能。維持不盡職務的財產權利，是愚拙的事，因爲無服務的報酬是浪費；假若統計家所說的是真的，就是，即使平分進款，每人所得的必少，那留水手在船上而不留地方與頭等客人的辦法，更是愚拙，而小進款之不當誤用，尤屬重要了。將工業的管理，放在業主的僕人手裏是愚拙的，這些主人除了盈虧的賬單以外，不知道別的，因爲這是使工業由盡職務移到獲利，並且使做創造工夫的人，附屬於不做的人。

最後講起來，在工業的事務中，最好的路徑，正如在有組織的生活的任何部份一樣。就是要考慮經營經濟生活的目的，再使經濟的組織與他相適。報酬是爲服務，是限於服務，僱用資本的時，必確定是以最便宜的價值僱用的。就是要將組織實業的責任，放在做事的與使用的人的肩上，而不放在享有的人的肩上，因爲生產是生產者的事情，督責他盡職務的人是消費者，工業之經營，應當是爲消費者，而不是爲財產的主人。最重要的一切工業的經營，應當將成本與利潤完全公開，因爲公開是對於經濟弊病與政治弊病兩者的防腐藥，除非兩個人都公開，沒有人對

於鄰居肯相信的。

單講到財產，這樣的政策有兩個鋒口。在一方面，他的目的在取消享有與義務分開的財產。在另一方面，要鼓勵幾種形式的經濟組織，在這種組織之下，無論工人有享有權與否，可以自由進行事業，不必以管理與利潤，分於純粹享租金的人。所以雖在幾方面，是要擴充公有事業，然在別的方面，卻培養私產的擴充。工業原理中腐敗的東西，不是私人享有權，乃是私人享有權與工作分開；有些社會主義的人，以為土地與資本的私產權，必然是壞的，是腐學先生的賣弄，是與一些保守黨的賣弄，一樣的荒謬，這些保守黨人，以為一切的財產，都有一種奧妙的神聖。這完全依靠財產是屬於那一種，與他的用處是甚麼。只要國家保持他的優越地位，嚴行管轄財產的讓與，如英國屬地的家地法律一樣，以防止無職務的階級的產生，一方面鼓勵享有自己的田地的小農夫或享有自己工場的小工主的增加，同時取消幾種工業的私產權，是不相衝突的，這幾種工業不幸是今日之最顯著的，他們的主人是不在場的股東。

第二種改良實在可以幫助第一種。農業或工業的小主人，在大地產與資本制的財政世界，

不容易保守自己的地位，只要社會優容無職業的財產，要恢復這些小主人的地位，即非不可能。也是困難的。有許多工業，是宜於小主人的，只要社會將僅屬寄生種類的財產廢除，就使這些小業主容易恢復。對於前者的社會主義政策，不但是與一個『分配的國家』相反對，並且在近世經濟情形之下，是個必需的初步，假如『財產』的意思，是人民十之九心中所想的屬於個人的東西，社會主義黨人的目的，不在推翻財產，乃在保護財產，增加財產。大規模與小規模的出產的界限總是不定的與變動的，因為這是依賴不能預料的技術情形：例如電力廉價可以使製造分散，正如汽力使他集中一樣。但基本的問題不是在乎享有的程度，乃是在享有的種類，不是在大農夫大工主與小農夫與小工主之分，乃是在區別用以工作的財產與不勞而生進款的財產。愛爾蘭的地主被取消，不是因為他所有的多，乃是因為他僅是一個業主而不是別的；假若英國的田地享有亦受同樣的削減，如現在城市的地土一樣，他應享同樣的命運。享有性質的問題一經決定，經濟單位大小的問題，可由他自己決定。

為盡職務組織經濟生活，第一步是取消幾種不盡職務的私產。以享有而不以工作生活的

人，定然仰賴別人的勤勞，所以他是太費的奢侈品，不宜鼓勵。雖說他應當受寬待，如生來就從事於不名譽的事業的人，所應當受而往往不能得著的寬待一樣，但對於個人的優容不宜及於制度，他們自己與他們的鄰居，都是這制度的犧牲品。照這個標準來批評，有幾種財產是明明與社會反對的。地面的主人，憑藉一種權利，可以在礦工所取出於地面上的每噸煤，徵取一種的稅，名曰礦稅。假若須經過他的地底下，每噸煤又取一種稅，名曰通過費。雖說地的美麗與價值完全不受影響，若是他願意，他可以使人不能達到礦物，因以使全區域的發展不正，除非依照他的條件，他能使三五〇〇百萬噸至四〇〇〇百萬噸廢棄於各地產界限之間，同時隨著大家痛工人之無良，不為公家多出些煤，而附帶的為自己多出些私稅——這一切的事使我們工業文化無生氣，的性質上，生一點適意的談諧，為這種工業文化礦主應當有些功勞，但不值得四大人物每人每年所得的四十多萬元，與一羣人每年所分得的二千四百萬元。

一個人從來沒有看見一個煤礦，但將黑地方的東西，變成倫敦的燦爛雅室與鄉間的別墅，這種點金術不是礦稅主人之所獨有。城市地租的主人，有同樣的變幻方術。在鄉間一些地主，或

者許多地主合營冒險的困難的農業，他們所行使的權勢，雖在社會上有時太過，但他們所佔的地位，與所受的進款，最後說起來，有一部份是他們所盡的職務的報酬。城市土地之享有權，已經煉精了，直到粗礦沙所剩下來的，全屬純金。這是一個完全的乾薪，因為他所有的職務，僅是在收利潤。有一個時期，離自由主義攻擊乾薪很近，還可以激起一點記憶，自由主義最後的與最大的思想家，立了一個明白的推論。一八四八年穆勒（Mill）說『除非地主改良田地，地產的理由纔能算正當……從來沒有一個正當的私產學說，設想地主僅是一個佔著地方的領乾薪的人。』首相在他未曾悔悟的時候曾表示過，城市地租與礦稅，實在是一種的稅，是一種人依法律的允許，對於別人的勞力所徵收的。與國家徵稅不同的地方，僅在於他們數目不是隨著國家進款的需要而增加，乃是隨著國家所需的為徵稅目的的空地與煤而增加，在於他們的增加，不屬於公益，乃屬於私利，在於假若這些稅款，是濫用於無益的事情上面，無人有權過問，因為這個辦法，使一個貴族可以將一個平民所產生的財富，用之於兩無益的東西上面，這乃是一個制度的一部份，這個制度，以私產的名義，是貴族與平民所同認為人類較高幸福所必需的重要東西。

假若我們承認職務的原理，我們就要問這個辦法的目的何在，爲甚麼緣故，例如倫敦的居民，每年納六千四百萬元於地主。假若我們尋不出緣因與目的來，而覺得這些東西等於倫敦城，因爲聖克雷門但因（St. Clement Dares）教堂區的地產，獻與英皇的馬脚鐵與釘子，我們必不蹂躪一個奇怪的歷史遺蹟，但我必不許他擾亂我們現在的事情，將已經沒有歷史的，當作有歷史的。我們將收回礦產與城市的地產，塞住走漏財富的道路，如英國的幾個屬地與歐洲已經做了的一樣。我們要加增遺產的稅使現有的大財富至少每一代變一個主人，使承繼人所得的，不過是隨身的錢財，而不是從工業所得的貢稅，這樣的貢稅，雖受死稅的限制，正是今日富人子孫所承襲的東西。礦主與地主頗像伯拉圖的詩人，能從無中生有，能以好像他們本人的言語迷惑人類，總之我們待他們，要如伯拉圖待詩人一樣，爲他們帶上用花做的冠冕，恭敬的將他們引出國外。

## 第七章 以工業爲專門職業

無職務的權利，好像荷馬（Homer）書中飲血的影子，一聽著人聲就驚散了。消滅礦稅與城市地租不過是打破一個迷信。這是如同打破任何別的迷信一樣，不需甚麼決心，但亦同是要決心的。資本家自己經營的工業，日漸減少，除了這些工業以外，資產是幾乎同屬消極的。幾乎，但不是十分。因為大半的主人雖不躬親行使積極的職務，他們卻揀選行使的人。自然，我們承認資本應如何享有的問題，與他應如何管理的問題，是截然不同，前者的決定，不必危害後者。但因為股東享有工業不可少的資本，就推論工業是依賴維持資本於股東的手裏，或同一些經濟學家一樣的寫法，好像假如對於私人的資產再加以削減或完全廢除，管理者的建設精力，必致於受損，這是犯了一個粗魯的不顧前提的錯誤，並是不顧現時工業最明顯的事實，這些管理者，在比較重要的工業中，也許享有資本，也許不享有，但很少享有過於一小部份的資本。為消費者增進工業組織的效率，這句話純粹的資本家說得越少越好；因為不論工業的將來是怎樣，一個有效率的組織，恐怕為消費者沒有空地。但股東雖不管理，卻有統治權，至少到一年一次可以說「皇帝願意如此」的程度。即使把他們的權利削減或消滅了，仍然需要一個機關來行使這些權利。



資本享有的問題，至少有一點與工業組織的問題相同，就是經營工業應有的大法是兩下相同的。

要尋求那個大法，須想工業如何組織，纔可以將目的的原理表示得最完全。在工業上應用這個目的的原理是容易的，無論要實行這原理是如何的困難。就是要將工業變成一種專門職業。一個專門職業最簡單的界說，是爲行使職務而組織的一種生意，雖組織不完全是無疑的，但是誠意的爲著職務。這不僅是一許多人集合的團體用同一的事業來謀他們的生活。也不僅是爲在經濟上保護會員而組織的團體，雖說這通常是他的目的之一。專門職業是一些人依照規則經營他們的事務，這些規則的計畫，是爲執行一些標準，與會員以較良的保護，同時也與公眾以較良的服務。所持的標準也許是高，也許是低；但一切的專門職業，都有一些保護社會利益的規則，亦有些欺騙社會的規則。他的精神，是爲會員的本領，或貨物的成色，負幾種的責任，並且有意的禁止幾種行爲，因爲這些行爲，雖對於個人也許有利，但必致使他所屬的團體，失去信用。他的規則有些是工會的規則，主要的意思在免這個專門職業的經濟程度，被無良心的競爭所降

低，還有別的規則，主要目的，在除去投機利益的引誘，使這個專門職業的會員，除對於自己事業的純粹職業的利益外，不能有別的。

一個學理與習慣，認定公衆服務的獲得，最好由相敵的商人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無限制的尋求他們金錢的私益，但『不合職業的行爲』這幾個字的含義，恰與這個學理與習慣相反。在這個時候，專門職業階級，已經崇奉自由競爭爲商業與工業的公正標準，但未會夢想將自由競爭應用在他們主要利益所在的事業內，但維持並且細密的計畫一個機關，俾職業的良心藉此表現，這是一件重要的事。規則的自身照外行看起來，有時也許是武斷的與思慮不週的。但規則的目的是明顯的。就是以一種維持服務的成色的責任，加在這專門職業身上，並且免得他們的公共目的，由於金錢利益在個人必需上或貪心上的過分勢力，受了阻礙。

所以今日的工業與一個專門職業的分別，是簡單而不致錯誤的。前者的精神，在於他對於股東所付的金錢結果爲獨一的標準。後者的精神，是在個人進去雖是爲謀生活，但成功的標準，是他們所做的服務，而不是他們所聚的錢財。他們可以發財，如成功的醫生一樣；但他們的專

門職業的意思，照他們自己看與照公眾看，不是在於他們能賺錢，乃是由於他們能供給康健，平安，學問，好政府，或好法律。他們依賴他得進款，但他們不以爲凡增加他們進款的行爲，就因那個原因認爲好的。一個靴鞋的製造家，退休的時候有五十萬，不管他所做的靴子是皮的或是紙的，就算有了成功，但一個照樣做的官吏，就要受彈劾。

所以，假若他們是醫生，他們就承認有幾種行爲，無論能得的醫費是如何的多，是不能做的。因爲他們是違反專門職業精神的；假若他們是學者與教員，他們就覺得以故意的欺騙公眾來賺錢，如專賣藥品的製造人的行爲，是不對的，無論公眾如何喧叫願意受欺；假若他們是法官與官吏，他們就覺得不當枉法賺錢，以增加他們的進款；假若他們是兵丁，他們就覺得職務在先，他們自己的意向，卽是很公允的避死求生之心是在第二。各國都有賣國賊，各軍隊都有私逃的，各專門職業都有不忠的人。要以專門職業的精神爲理想的標準，是荒謬的事；他也有污濁的方面，假若要在工業中培養這種精神，必須設法防止他的過度。但保持一個偶然放棄的標準，與承認無標準爲存在的中心真理，這兩件事中間，是有天淵之別的。專門職業的意思，在乎使奸賊爲例

外，不是定例如在工業內一樣。他使他們成爲例外，因爲是以經營專門事業的目的爲成功的標準，不論這職業是甚麼，並且是因爲能使個人的意向嗜好與野心附屬於一個以增進職務之行使爲目的的團體的規則下面。

\* \* \* \* \*

專門職業與工業是沒有嚴格區別的。教書的事業在今日總算是個名譽的公共事業，但在一百年以前，卻是個欺騙公衆的鄙俗投機的事；假若斯桂爾先生 (Mr. Squeets) 是個滑稽寓意畫，牛津大學在吉朋 (Gibbon) 與斯密亞當 (Adam Smith) 的時代，是個十足的酗酒的事實；當日沒有一個地方官能做今日市政府十分之一的事，因爲沒有許多官吏去做他們，而所有的官吏都受賄賂。至少，我們可以設想醫藥業有幾部份，可以依著工業的資本制度發展，以醫院爲工場，用競爭的價錢僱醫生如僱「工人」一樣，招攬富人的生意，以大紅利付與股東，而比較劣的服務供給窮人，或竟不與以服務，因爲他們不是一個賺錢的買賣。

有人以爲製造軍火與放射軍火，建築學校與建成後在裏面教書，供給食物與供給康健，有

甚麼奧祕的分別，依照這個分別，經營前一類的事業，是可以單獨看著金錢的利益，而人以為是不能免的與可取的事，同時後一類的事業是由專門職業家經營，他們只能希望為服務得報酬，但他們既不能希望意外之財，也不能僅因為來治病的人增多，來受教育的人增多，或要抵抗的仇敵增多，就增加他們的價錢，這種區別的意思，假若以為工業界的領袖，應當歡迎羞恥作為榮耀，以屈辱為頭上的金光，纔不見得奇怪。做靴子與做房子事業的本身，不是比醫治病人或教訓愚蒙輕賤。他們同屬必需的，所以同屬尊貴的。他們至少應當同受以維持職業服務的標準為目的的規則的拘束。他們同屬一樣的不當鄙俗的將道德標準附屬於金錢利益之下。

假若要將工業組織為專門職業，有兩種改革是必需的，一個是反面的，一個是正面的。第一，由產主僱用的人為產主的利益經營工業的事，應當停止，反之，工業應當為公眾的服務經營。第二，在嚴厲的公眾監督之下，維持服務的責任，應當放在實際上經營工業的人的身上，從組織人與科學家到工人。

第一個改革是必要的，因為只要管理工業最後的權柄繼續放在那些除了尋求利益與他

無關亦無興趣的人的手中，爲公衆利益來經營工業，是不可能的事。依現在的組織，工業的利益與管理，依照法律，是在與他的成功最無關係的人的手裏。合資的組織除農業外在比較重要的工業內是通行的，在這種組織之下，工業是由享有財產的代理人所管理。假若能替股東賺大錢，就算成功，不然，就不算成功。假若有個機會，可以用劣貨或薄待工人的方法，增加紅利，假若經營工業的職員，利用這個機會，他們的行爲是嚴格的在本分之中，因爲他們是僱主的僕人，他們對於僱主的義務是供給紅利，不是供給服務。但財產的主人，以財產主人的資格，是不盡職務的，這個意思不是說他們所享有的器具是無用的，而是說，因爲工作與享有既然分離漸遠，器具有效率的使用，不依賴維持在器具上面行使的享有權。自然有許多管理的董事，同時享有資本與管理事業。但多半的大工業中多半的股東，通常僅是股東，不是別的，這件事實依然存在。

他們的經濟利益，不是如有時常說的，與公衆的利益趨於一致。假若物質的東西，包含資本在內，是便宜的，而人類是貴重的，社會纔算富有；實則『財富』這個字沒有別的意思。享有用於工業中財產的人的利益，是要使資本貴而人賤，他們的利益，自然不是管理工業的管理人的利

益。管理人是僕人，並且報酬時常很少。所以假如工業能賺大錢，假如工業中一個單位，因為幾種特別便利的緣故，出產比鄰人為廉而賣價又是一樣，假如商業復興使價值增高，假如來源如現在比較重要工業通行的一樣，是由一種聯合團體所控制，結果的剩餘，普通不屬於管理人，也不屬於別的被僱的人，也不屬於公衆，乃是屬於股東。這種辦法的荒謬，實在是與應當以公道與常識設立的辦法相反，就生出（在許多別的事情中）所謂『勞工與資本的競爭』。這句話是恰當的，因為他是與所要描寫的關係，一樣的矛盾。悲憫『勞工與資本』間的『惡感』，或主張他們中間的『和睦』，是與悲憫木匠與錘子間的惡感，或發起一個使命去恢復人類與靴子中間的好意，一樣的有意思。這些話獨一的重要，就是屢次說出來足以掩飾他們的無意思，甚至於使明白人相信資本『僱用』勞工，正如我們不信教的祖宗，因為當日供奉了別の木與鐵，就想到是這個木與鐵使他們豐收與打勝戰。到了人傳說他們偶像活了的時分，應當有人把他們打破。勞工是人組成的，資本是東西組成的。東西獨一的用處，是應用於人的服務上。人的職務是要看有東西可用，並且要看用他們的報酬，不要超過必需以外。

所以將職務原理應用在工業上，含有享有權的改變，因為照現在看，他們為工業所存在的目的，沒有供獻。使一切活動能一致的東西，與調和從事這種活動的各團體的衝突的惟一的東西，是經營他的目的。假若人沒有公共的目標，他們半途失和，是不足為奇的，他們也不能因重新分配東西而受調和。假若兩個人都不願意做僕人，其中的一個，一定要做主人，要想在他們中間將主人的事，懸而不決，這是無益的事。在各種工人之中，在工人與消費者之中，可以分配職務，每人在他自己的範圍內，可以有使他盡職所必需的權限。但在工人與純粹的業主中間是不能分職的，因為這種業主，做了甚麼職務呢？是供給資本麼？可以付給他為用他的資本所必需的報酬，但既不多給報酬，也不使他佔據出產上有權的地位，因為僅以業主的資格，他是不配管的，為這個原因，工人與管理人中間的平衡是可能的，因為他們兩個人都是工人。但求在工人與業主中間立一平衡是不可能的事。正如德國人從比國京城向比國提出交涉的條件。他們的提議也許很好；但他們為甚麼佔有他們現在的地方，他們既然不供給生產，為甚麼能提出條件，這是不明瞭的事。只要他們繼續在不當在的地方，他們個人的好處，就因使他們進入現在地位的制度的



煩擾，被人忽視。

假若不發現比這更壞的事，就算僥倖了。因為解決工業中權利衝突的一個方法，不必如我們所提議的以職務來作權利的根據，乃是以武力作根據。就是以勞工為強迫的事，用一種掩飾的與體面的方式，重新設立一種的奴隸制度。幾乎在一切的國家，都有一個時期以協約的拒絕工作，為一種刑事犯法。今日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歐洲的資本家，不受任何輿論或權限的限制，自己獨立，可以自由的對於愚昧無依的民族，加以他們所喜的任何條件。在美國有些地方，資本仍保留著野蠻無法律的情形，暴力的恐嚇，似乎在新進美國來的工人，發生同樣的效果。

在這種情形之中，表現於工業戰爭的權利衝突，不致於發生，因為一方面的權利，已經消滅了。這個補救的方法的簡單，是這樣的動人，難怪政府有時玩弄強迫公斷的政策。最後，他們申辯說，這不過是像一個超國家的權力的行為，用公共的力量來防止戰事之發生。實在說起來，強迫公斷，與這樣的權力在公允上與成功的希望上所當行的政策，正是相反。因為他以現在的關係為自然的，他來干涉，是為調和偶然的爭論，以為這關係的公平，是已被承認的，這關係的永久，是

所希望的。但在工業中爭執的問題，正是現存關係的公允問題。假若一個國際聯盟調和被壓迫的民族與壓迫者中間的事，調和斯拉夫與馬甲族（Magyars）中間的事，或從前屬普魯士的波蘭地方的人民與普魯士政府中間的事，卻以為斯拉夫人之當附屬於馬甲人，或波蘭人之當附屬於普魯士人，是個不變的秩序之一部份，照一切寶貴自由甚於和平的人看起來，這個國際聯盟是應當反對的。假若一個國家用和平的名義，以協約的停止工作，為一個法律的罪，也犯了同樣的賣自由的罪。這就是藉取消做工的人的權利，來解決享有者與工作者中間的權利衝突。

\*

\*

\*

\*

\*

\*

所以在此處，除非願意重新設立一種強迫勞力，我們又到了一個行不通的地方。但這個行不通的情形的存在，僅由於我們繼續認定享有工業所用的資本主人的權利是絕對的，自身為一種的目的。假若我們不以一切的財產，因為是財產，所以就是同屬神聖的。而問用資本的目的，是甚麼，他的職務是甚麼，我們就覺得他不是個目的，而是為達目的的方法，並且他的職務（如經濟學家告訴我們的一樣）是替人類的勞力做事與幫忙的，人類的職務，不是服事那些僥倖

享有資本的人。有兩個結果從這條真理出來。第一，資本既然是一個東西，應當用來幫忙工業的，如人用腳踏車使他可以較快的到做工的地方一樣，用資本的時候，就應當以最廉價的條件來使用。第二，享有他的人不應當管轄生產，正如出賃房屋的人，不應當管轄廚房內所煮的飯食一樣，或是一個出租船舶的人，不應當管轄行船的快慢一樣。換句話說，資本當用原價得來，這個意思便是說，除非國家覺得自己應當享有某種工業所用的資本，這是國家很可以做的，資本的報酬，應當為可以獲得資本的最低利息，不應當有權得剩餘的紅利，或工業的管理。

照學理上說來，私產主人的僱人對於工業之管理，可以用五種方法終止。他們的財產可以無報酬的被收沒。他們可以自由的讓出。他們可以由工作人員的行為排斥出去，所有的事由人員自己做，如以前一樣。在經營生產不需他們的幫助，使他們成為無用。他們的享有權利可以受限制或削減至一種程度，使他們成為純粹享租金的人，保障他們一個確定的進款，如有公債票的人一樣，但不受利潤，亦不對於工業的組織負責任。他們的權利可以收買。第一種方法，見於歷史上充公的事件，如英格蘭、蘇格蘭，與別的新教國家的管理階級，收沒教會的財產一樣。第二種

方法，試行很少——與他最相近的事，恐怕是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著名的讓棄事件。第三種方法，明明是建築工會所思想的，這些建築工會在英國現在正在成立的程序中。第四種對待資本家的方法，是合作運動所遵行的。也是僱主與建築工人所合組，由福斯特（Mr. Forster）所主席的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依這個建議，僱主受一確定的薪水，與資本上的確定的利息，一切剩餘的利潤，放在一起由代表僱主與工人兩方面的中央機關經營。第五種方法，市政府屢次行之，但中央政府行之較少。

這幾種使工業管理脫離產主的手的方法，應當用那一種，是依每個特別情形的便利而定。所以『國有』不過是一大種類的一類，但有時人以他為消滅享有權的獨一方法。自然，可以用他達到所想的目的。但無論如何在幾種工業中，要求達到這個目的，是不必用這個方法的，因為他最好不過是個笨的方法，所以有別的法子可用的時候，就當用別的法子。國有是達到目的的方法，不是目的的本身。他的目的，正當看起來，不是設立工業的國家管理，乃是當私產主人不做任何積極職務的時候，除去私人享有權的死手，取消阻礙的財產權，是不可少的，而一種可以用

於某種工業的特別情況而有利的方式，不必用之於一切的工業，將這兩件事當作一件是不幸的事。享有不是一種權利，乃包含許多權利，可以零碎的將他們取消，也可以同時整個的將他們取消。我們已經說過，資本享有權，至少包括三個大權利；就是對於為資本代價的利息的權利，對於利潤的權利，與對於管理的權利，因這幾種的權利，管理人與工人都成為股東的僕人。這幾種權利，在最大限度之內，不是享有權的不變的隨屬品，他們也不必同時存在。許久以前，理財家的妙想，已想出分別股本的方法，使幾種人的享有權，有完全的管理權，別人就沒有，使幾種人負一切的危險，受一切的利潤，別的人在這兩件事上卻受限制。一切同是財產，但不必都有同等的享有權利。

只要私人享有工業資本的權利，繼續存在，改革家的目的，應當堅持他的報酬，不得超過預先決定的利率，並且不當附帶管理的權柄，使資本的勢力得以減輕。在這種情形之下，平常股東的地位，近於持有債票的人的地位；工業的資產，變成對於利潤的一種抵押品，經營的管理權，與超過最低限度的利潤，都放在別處。自然，危險也是一樣。危險有兩種，一種屬於一個生意的危險，

與一種屬於工業全體的危險。前者的危險是比後者重得多，因為某個煤礦，是含有投機性的投資，而開煤礦的工業全體卻不是的，假若每個生意是當作不相聯屬的單位管理的，股東的報酬必須顧到這兩種危險。假若每種工業資本的享有是統一的，但不必是集中的，附屬於個人競爭的危險，就可以免除，而每個單位的信用，就是全體的信用。

這樣變更享有權的性質，可以有三種利益：可以取消資本對於工業的管轄。可以將股東變成債主，受一定的利息，因此對於無職務的股東，停止付給利潤。可以將工業變成一種專門職業，由各級工人為公益進行，不為資本家的利益進行，就可以為工業的和平建立獨一可能的基礎。照這樣產出來的組織，人自然以為是不能實行的。假若我們知道這正是實行家本著經驗所提出對於國家最重要工業之一，就是建築工業之紊亂的補救方法，這是一件有趣的事。僱主與工人合組的委員會，去年八月發出一個關於建築工業的報告（註一）這委員會的問題，是「科學的管理與原價的減輕。」這句話並不暗示一種經濟的革命；但這個報告簽字人所提議的事，

（註一） 這個報告，重印於建築工業的工業議會。

實不減於一個革命。因為他們到了問題困難之點，就覺得非將為這工業的背景的工業關係的組織大綱重行改造，不能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工業所供給的服務，為甚麼成效不足？一部份由於工人不用完全精力，做生產中他們的部份。為甚麼他們不盡全力呢？因為『恐怕失業，工人不願意替僱主個人謀無限的利潤，工人因為在管理上無分，顯出缺乏興趣，管理上與工作上的效率不足。』對於實效的心理的阻礙，應當如何超過呢？是否用增加監督與增加速率，或用紅利制度的引誘，或用那些太聰明而無想像力與道德觀念的人所想的別的法子，對於人性威迫利誘，使他做本來願意做的事，就是簡單的本分與誠實的工作——只要他們所發明的制度容許他做？決對不是能用這些法子。就是要將建築房屋，變得與教書一樣，成一個名譽的專門職業，而斯桂爾先生（Mr. Squeers）以為教書不能成爲一個名譽的專門職業。

他們寫著，『我們相信我們工業議會的大事，是要發展一個由這個工業人員負責的完全新的工業管理制度——就是那些實行生產的人，無論是勞力的或勞心的，使他們與國家合作，國家就是他們組織起來所服務的社會的中央代表。』僱主不得『為實效所不可缺少的引誘

物』的無限利潤，但在他管理員的資格上，爲服務得著報酬，爲他的資本得著一個預先確定的與保證的利息（除非是他自己不盡力不能獲得；）在這以外的一切剩餘，實則一切的『利潤』在別的工業中是由股東分配的，都由他交出來，放在一個中央基金裏面，由僱主與工人爲這個工業全體的利益保管起來。以前每個公司的財政地位，對於公衆認爲不可推測的奧秘，結果本公司自己也有時莫名其妙，現在要設一個公開的原價估計與會計的制度，依照這個根據，這個工業，對於管理得法的公司，負共同的責任。以前在間省的時候，工人被開除，自己盡力掙持，現在可以由一種在僱主身上徵收而由工會經營的基金養活。原價與利潤都可以公開，可以有坦白的交易，誠實的工作，與互相的幫助，而沒有十九世紀所認爲可以實行代替他們的競爭。『資本』不准『僱用勞工』。勞工管理上的勞工一併在內，可以僱用資本；是照生意狀況之下所能得的最低利率僱用資本。假若用得成功，自身的服務得了公平報酬以後，還有盈餘，那種盈餘不分配於股東，因爲股東的資本得了利息，已得了當得的東西；那種盈餘當用以爲工業添設備增進將來服務之效力。



所以在這裏有一羣實行家的大多數，不管社會主義的理論，建議設立『有組織的公共服務於建築工業之中』，簡單說起來，提議將他們的工業，變成一種專門職業。我們要注意的，就是他們的辦法，恰恰是用那種職務的組織，恰恰是將完全的享有權，變成一種以工業全體為擔保的抵押品。（這只限於辦理有效的公司），恰恰是將生產的管理，由資本的主人手裏，移交到從事生產的人的手裏，假若工業是為盡職務不是為享有產業權的人的金錢利益而組織，我們看這個移交是必需的。他們的報告是有第一等重要意思，因為提出一個政策在一羣重要工業中，削減資本的私產權，在這些工業之中，私人享有權，雖形式有變，恐怕要繼續許久，假若一個人能將應用這原理於別的工業的細節計畫出來，就算盡了個有價值的職務。

自然，這不是達到這個改革獨一的方法，在資本很大的工業裏面，也不是最好的辦法。假若反對財產管理生產的運動，發生於享有與管理分開的有限公司興起以前，達到以專門職業來組織工業的過渡，也可以用限制而不取消私人享有權的方法辦理，如建築工業中僱主與工人所建議認為應當的一樣。但是事實上不是如此，所以建築工業的提議，不能有一般的適用。在建

建築工業與類似他的工業中，可以繼續私人享有權而同時變更他的性質，恰恰是因為在建築工業中，僱主通常不僅是享有資本者，而兼做別的。他是個經理；那就是說，他是個工人。因為他是個工人，他的利益，而更重要的，是他的工人資格的職業精神，常勝過他的利益與他的業主資格的純粹金錢精神，所以在他業主資格的權利被裁減與限制後，他仍然是這個工業生產機關的一部份。

這個兩重的地位，是異常的，在組織很密的工業中這種地位日趨於非常。在煤業，棉業，造船業，與機器業的許多支派裏面，資本的主人，不像在建築業中一樣兼是一個組織人或經理人。他對於工業的關係與在其中的興趣，完全是屬於財政的。他是個享有者，不是別的。因為他的興趣是純粹的財政的，以致他關心的是紅利，而關心生產僅僅是得紅利的方法。所以在一個以管理權交給代表各級生產的人或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機關的工業組織裏面，不能將他放進去，因為他與這兩種人都沒有共同的目的，所以工人與管理人的聯合會議可以成功，工人與資本家或資本家的代表的聯合會議，如大半的灰特利會議（Whitley Councils）是不能成功的，因為

純粹享有者存在的必需，就是爭論中的一點。享有所用的資本建築工主照建築的工人的資格，而不照資本家的資格，可以包括在內，假若他依照建築工業委員會的建議，放棄他的享有權的一部份。假若一個礦產或船廠的股東，放棄他現在以資本家的資格所當得的管理與無限制的利潤，他就放棄一切使他達到現在地位的東西，在他的工業裏面就失去地位。他不能如建築工主分任工業的管理，因為他沒有能做這事的資格。他的目的是利潤；假若工業是如建築工業中僱主與工人所提議的，成爲一種『有組織的公共事業』，他們看明白了，將工業附屬於以利潤爲目的的股東的事，正是應當取消的。建築工主建議放棄利潤。他們能這樣做，因爲以工人職務的資格，他們在工業中有他們的地位。假若股東放棄利潤，就完全沒有地位了。

所以在享有與管理嚴行分開的煤業中，業主必不承認任何使礦業的管理權由管理人與礦工分享的制度，有微微的可能。格因夫子爵（Lord Gainford）充代表礦主的主要見證人，告訴煤礦委員會說『礦業公會委託我宣言，假如完全的行政管理權不放在業主手裏，他們就不負進行這工業的責任。』（註一）所以礦業的主人一句話就將全個可觀的圈套吹散了，這個

圈套根據一個意思，就是想不改變私人享有權，而可以用聯合管理的幻術方式，求工業的和諧。他們是對的。礦業與別的工業的工人與股東的代表，可以會面，交涉，與討論。但一個代表股東與工人的機關，聯合起來管理股東的財產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中間，沒有共同的目的。因為聯合從事於一個工業的一切的人，而超過他們特別的與分歧的利益的獨一目的，是供給服務。但股東的目的，與股東眼光中工業意思與事業的全體，不是供給服務，乃是供給紅利。

所以在管理與享有分開的工業裏面，如今日大半組織很精的工業中，在保留現在的制度與從生產管理上完全逐出資本家兩件事中間，沒有半路立腳的地方。享有性質的變更，不能容易從裏面發生，這樣的變更是使煤或紡織物與造船業可以組織成爲爲公益的專門職業所必需的。從業主管理之下將他們解放所需的打擊，一定是從外面來。照理論講起來，可以由組織的工人方面的行動施行打擊，他們只要在剩餘的利潤與管理權存在的時候，拒絕做工，就可

(註一)

煤業委員會，證據記載第一卷第二五〇六頁。

以取消這些東西，可以引用歷史上農人以不納租稅不承認政府的方法來消滅盜劫的財產的成例。在這種情形之下，國會干涉不過是登記社會對於已成事實的同意。照事實上講，近來工業的情形既然如此，這個辦法，除了別的短處以外，恐怕不能試行，即試行亦不見得可以成功。所以可以置之不論。代替的方法，就是用法律來改變財產的性質，可以依法同時收買一個工業的各種享有權。

無論用兩種方法的那一種，其辦法不同，但一經成立，其結果卻是一樣的。資本中包含利潤與管理權的私產權是取消了。所剩下來的東西，最多是屬於以前業主的一種抵押，是一個被保留的死葉子，雖說已經沒有工業的漿液來滋養他，而人以爲用不著摘他下來。維持與設備一個近世工業所必需的資本，即使在別的理由上以爲應當由一個團體的工人完全佔據現在業主的地位，也不是他門所能供給的，所以構成享有權的複雜權利，仍然要由工人與任何可以代表社會全體的機關分享。例如前者可以爲現在享有者的承繼人，單管工業中例行與管理的事，後者可以承繼分配剩餘利潤的權利。組成財產的元素事實上必須分析出來：今日在享有權名義

之下，幾種不同的權柄，被放在同一的手中，這是一個事實，而私產的資本一經取消，將這些權柄從新詳細分配，也許是與將他們整個的讓渡一樣的便利，這是一個可能；不可使這個事實遮掩這個可能。

我們已經提過，專門職業的精神，在他的份子組織起來為行使職務。所以，假若將工業化作一種專門職業，不能認廢止無職務的財產，為使工業的人員在公眾享有之下，可以繼續不負責任，這是重要的事；這個不負責任，是隨著憑藉工資制度而工作的私產權的東西。因為以往會有人提出理由，要改革享有權的性質如以上所說的一樣，有時會含著這種意思，所以這一點更為重要。習慣上對於由公家與外面的行為改變財產所慣用的名詞，就是國有。但國有這個名詞，既不合宜，也欠明瞭。正當用起來，他的意思，不過是代表國家的團體的享有權。但實際上的用法，等於一種特別的管理方法，由國家僱用的官吏代替現在工業的董事，而執行他們的一切權限。所以，那些願意維持一個不為公益而為股東的利益的工業制度的人，攻擊國有的理由，是說國有是一定的無實效，每當投一封於信箱的時候，就有些恐慌；而希望改變的人回答說國家事業一

定是辦得好的，他們每當用電話的時候，就頌揚上帝；好像私人管理與國家管理各有特具的不可改變的性質，不知道一個事業的好歹，如軍隊，或鐵路公司，或學校，與一切公私事業，不是依賴經營他的人是私人職員或國家官吏，而是依賴他們是否在事務上受了適當的訓練，與能否享有附屬人員的好意與信任。

兩方面的理由都很精妙，但實際上幾於都是不對題的。國有的長處的站得住與否，不是依靠現在國立各部與工業管理人的辦理切實與不切實。國有的意思就是公有，可以容納幾種形式不同的管理方法。工業的組織法可以是『單一的』，例如郵政。或者是『聯合的』，如桑克法官 (Justice Sankey) 爲煤業所計畫的一樣。管理權可以集中亦可以分散，受委託的官吏，可以由消費者的代表組成，或由專門職業社會的代表組成，或由國家的官吏組成，或由三者以各種不同的比例組成。行政的事務可以放在如現在各部所訓練、募集、與陞遷的官吏手中，或另設一個自具辦法與標準的新機關，財政上或受財政部的管轄，或者獨立。這個問題雖困難，實屬於常有的事。這是個屬於製定組織法的問題。

爭論的人通常以爲國有工業的組織與管理，因一種不確切的原因，必定與郵政相似。這是與說私有工業的模型，一定要像鋼鐵公司或帝國烟草公司一樣有差不多的理由。將基本工業收歸國有的社會中所行的管理制度，實在可以有各種的不同，如將他們放在私人享有的社會一樣；討論他們比較的好處，而不明定所指的某種特別形式，在今日是如用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的憲法分類來討論一個近世政治問題一樣的無益。有工業問題的國家的報紙上滿載的關於『企業』、『自動』、『官僚政治』、『繁儀』、『民主的管轄』、『國家管理』的很抽象的討論，實在屬於經濟思想中的黑暗時代。我們提議，學者的第一個事務，是要盡力幫助討論回復清晰的狀態，不管他自己的意見是甚麼，所要堅持的，是在可能的限度之內，真實的說明現在的確切情形，而不用過於擴大而價值速趨於低減的名詞來作辨論；不確定的東西（很多）都當作不確定的東西，各種代替方法的確定意思，必嚴爲界說。桑克法官 (Justice Sankey) 的報告，極詳細的說明他爲煤業所提議的組織方式，使全體的討論有新的確定與真實，這不是他最小的功勞。無論承受他的結論與否，這些問題將來的討論，一定要依著如他的明確界說的建



議進行，也許尋不著一個解決。但至少可以對於創造一個公正的解決所必需的惟一心境，有點功勞。

所以國有不是一個目的，而是達到目的的一個方法，享有問題解決以後，還要解決管理的问题。在那些不經國家行動私人享有權不容易改變的工業裏面，國有的方法恐怕是不可少的，正如當地主不願意放棄產業，造成小田產的時候，縣議會之收買土地，是個必需的步驟。但買土地的目的，是在設立小田產，而不在設立官吏經營的田地；礦業，或鐵路，或製鋼事業之收歸國有的目的，不在設立任何一種形式的國家管理，而在使那些做建設工夫的人，從那些以金錢利益為獨一興趣的人的管轄得著解放，使他們可以自由用精力於工業的真正目的之上，就是供給服務，而不是供給紅利。產業移交既已成功以後，我們恐怕要察覺工業管理之設備，不但含有生產者生產的自由，還要設一個機關，使生產所為的消費者得以表示他們的希望并批評這希望的待遇，現在的消費者通常不能做這件事。但這是為行使職務來重新組織工業的程序中的第二步，不是第一步。第一步就是要使他脫離業主的金錢利益的管轄，因為這些金錢利益好比一

個吸鐵石，使一切的指南針失其正當的方向，使工業向錯的方向進行，無論進步是如何的快。

享有性質這樣的改變，也不含有與現在的社會秩序發生這樣決絕的破裂，以致不能實行。政治辨論的言語仍然摹仿十九世紀初年慣用的反對論：『私人事業』與『公有』仍然對照如光明與黑暗或黑暗與光明一樣。但實在說起來，在相傳的法律制度的形式的殼子後面，已經預備了一些新關係的元素，零碎的由政策實行了，這些政策不是由抱社會主義的人所計畫，乃是由再三提倡個人主義的公式的人，當他們正在毀壞這個主義的時候所計畫。美國的愛西—古民法律，(The Esch Cummins Act) 英國設立交通部的法律，都克漢(Sir Arthur Duckham) 組織煤礦的計畫，英國政府自己對於煤業的建議，似乎有個共同性質，於名義上保存私人享有權，但事實上削減他，將礦主置於一種國家機關的監督之下，有時附以金錢上的保障。具有這種普通性質的計畫，實在似乎是對於一種察覺的第一次的自然的反動，這種察覺就是說私人事業已經運行失其實效；這些計畫恐怕具有技術上的長處，與聯合競爭的公司使成一個公司所有的長處相似。但這些計畫所代表的調和辦法能否永久存在，是一個問題。最後，我們可

以問，私人享有權，被削減到這種政策所主張的程度以後，還有甚麼長處呢？這些政策所想保護的權利的『主人』對於他們的建議人，能不同答說『謝謝你們，但沒有甚麼可謝的地方』？個人事業有他的長處；所以公有恐怕亦有他的長處。但這些計劃將私人事業取消以後，『簡單的與明白的天然自由制度』存留無幾。而發明他們的人，又不能援引主張國有的人所注重的動機。做一個企業家，前面有個冒險的世界與無限的利潤——假若能夠成功——這是一件事。做一個鐵路公司，或煤公司的董事，有國家保障的最低利潤率，與不能超過的最高利潤率，這完全是另一件事。雜種很容易不生產。這種調和的辦法，能否因為除去私人資本制度的惡毒，連多半的好處也除去了，還是一個問題。

所以當經濟的發展達到一種程度之後，擁護私人財產的人也承認不能容忍私產以顯出他的特有的而十分真實的而為從前擁護他的理由的長處的獨一形式存在。為保護消費者實際上的必需，為除去浪費，或為應付工人的要求起見，私人財產既以無聲的讓步而逐漸被削減，公共享有，不但因為社會的理由，也是因為經濟實效的原因，就成爲一種似乎既無享有權利又

極無祕密的私人享有權的代替品。這種改變一定是逐漸的，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幸的事。但應當繼續。當國家獲得許多工業資本的享有權，如前數年的時候，應當保留，不應當交與私人資本家，他們同時抗議國家管理必不得法以致不能賺錢，與國家管理必甚得法以致奪了他們的生意。當分賣大田產的時候，如現在一樣，公共的機關應當進入市場收買他們。最重要的事，就是從市政府還屬腐敗的少數政治的時代遺傳下來的一個可笑的阻礙，使現在英國的地方政府除經國會法律所指定的目的以外，不能獲得地產與工業的資本，這個阻礙應當廢止；地方政府當自由的辦理公民所希望的事。對於公有的反對，能令人明瞭的部份，實在多半是對於集權過度的反對。但集權過度的補救不是將無職務的財產繼續存在私人手中，而是在分散公產的享有權。假若白名漢（Birmingham）孟且斯特（Manchester）與黑次（Leeds）都成爲小共和國，如他們應當成的一樣，他們決不致一覺到中央行政部的氣息就懼怕起來。

這些事情應當穩穩的繼續進行，除去特別的場合如礦業與鐵路及製造裝飾品及酒類以外，依專門家說，礦業與鐵路的難堪的浪費是由於私人的享有，而製造裝飾品與酒類在政治上

與社會上太危險，不能放在私人手中。他們的目的不在設立一個形式的官僚管理，而在使工業從私產利益的權柄之下，得著解放，私產的利益不但在細節上麻煩，並且在原理上是壞的。因為使財產從行使職務移到發財。若同時私人的享有權由特別工人團體的行動被動搖：如近來一樣，那就更好了。要殺死一個貓兒除了用牛奶潑斃他以外，還有許多別的方法，假若將這些法子解釋給貓兒聽，恐怕要用牛奶了。這兩個方法是互相幫助的，不是不兩立的，假若設想他們不能兩立，而造成相反對的派別，這便是改革家所患的很壞的社會病。

## 第八章 萬惡的循環

甚麼形式的工業管理應當代替由股東僱員的管理呢？甚麼東西最能使工業保持他的主要目的，使他對於盜劫的利益階級與無職務的冗員，受最小的害處呢？現在擾亂工業的是憤怒的不滿意與起伏不時的叛亂相循環，甚麼東西能使他受這的影響最少呢？無論管理工業的制

度是甚麼，但有一件事是一定的。他的經濟的程序與結果必須公開，因為只有公開，纔能使大家知道工業的事務是否警醒，有效，與顧全名譽，工業的目的是否達到，工業的職務是否實行。生意上守秘密的理由，是與貨物攪假的理由一樣，以為是競爭的正當武器；但實在是比那個著名的學說的理由，尤為不充分，因為有效的競爭的條件就是公開，而秘密的一個理由，就是防止競爭。現在經營工業的人，如威靈吞公爵（Duke of Wellington），論及未改良的下議院一樣，

深深的覺得他們『直到如今未曾讀過或聽過任何令人心滿意的計畫，』並且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改良工業的管理方法，這些人似乎也就是極不願意全體事實公開的人；但也有些人是例外。事實公開是個基本問題。是基本的，不但是因為在現在不明實在的經濟情形之下，一切的工業爭論，免不了成爲黑暗中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茫昧的軍隊於黑夜中交鋒』也是因為除了對於利潤與原價完全公開以外，不能斷定所取的價錢是否公道，與對於從事工業的各級工人的報酬，是否合宜。因為盈虧的賬單有隱藏利潤的機會，對於前者不甚明瞭，對於後者完全不明瞭。所以事實出來的時候，發現工業的管理有不可名狀的財政的濫費，社會都震動了。假若完全

的事實每一季都公佈出來，如理所應當的，恐怕決不致於有這種發現，因為公開的本身有如防腐劑，就不致於有驚人的事發現。

過去幾年的事情的教訓，不必重提。有一個時期，因為缺乏子彈，司令部命令軍士無論報復的必需是怎樣，每日不得放射幾發以上，在這個時候，政府對於製造子彈的價錢頗為驚異，設立了一個原價估計處，分析製造軍火的商人所提出的價錢估計將他們與自己工場的價錢逐條比較。比較的結果是：只要將各種的知識總合起來，『子彈與同類的軍火價值，有些可以減輕至一半之多。』如估計處所用的會計師所告訴我們的。居家的人對於煤價嘖有煩言。有一次宣佈了一些關於煤業的事實，而煤業中有勢力的人，已經是怒不可遏了。這些事實所證明的是甚麼呢？因為他們說較壞的礦，不能夠維持生意，所以於原來已高的煤價外，又加上二先令半，煤業委員會所調查的煤礦出產，有百分之二一獲利每噸自一先令至三先令，百分之三一獲利三至五先令，百分之二三獲利五至七先令，百分之三四獲利每噸由七先令至以上，而在倫敦一處的煤商利益總計在三百二十萬美元以上，而不以利潤而以服務為目的的合作運動所分售的家

用煤，所取的價錢每噸比煤商的價值低減二先令至四先令（註一）。

『但這些事是例外。』也許是的。但在幾種工業之中，『有力的聯合或結合，已佔據實行控制出產與價值的地位。』如近來獨佔事業委員會所告訴我們的，不但原價削減到最低限度，即利潤也是很大的，這是可能的事。但公開既是於一切用他們出品的人與一切對於生產盡有名譽的職務的人有利，為甚麼堅持這個可恥的祕密習慣呢？假若工業要變成專門職業，無論他的管理是怎樣，第一件屬於專門職業的規則，就是『一切的事都要公開。』如曼約翰（Sir John Mann）所告訴煤業委員會的。假若有一個國家機關每季切實公佈一種工業的所有的公司對於生產的原價與利潤，只在出產實效的方面的利益，已經不少，這是熱心出產的人所心喜的；因為原價最小的組織成爲一個標準，可以拿來與一切別種的組織相比較。精神上的利益，也必不可計算。因為精神的情形，也是實效的一個條件，這雖似一個不近情理的事。因為工業可以在白日裏進行。無論原價是必需或非必需，利潤分配是公道或非公道，都是大家所知道的事。今日生

（註一）

煤業委員會，證據記載，九二六一至九頁



產的人與消費的人對於無益於工業應盡的職務，所以是無意思的費用，隱忍不言，現在這些人既不願隱忍，只此一事，就可以使工業不失其目的。

將工業組織成爲專門職業，不但包含著無職務的財產的廢止，與保持公開爲專門職業的榮譽的標準所不可少的條件。並且包含著那些做事的人要承認將事情做得有實效。這個意思是說，他們不是被個人的不便利或懲罰的恐懼勉強做這事業，而應當將盡這專門職業的責任當著一種義務，不是僅屬於少數知識階級的人，與執行『生意管理』技術上的事務的管理員或『首領』的，而是一經加入工業就含有的，基於工人羣衆的全體同意與自動。現存的工業秩序，集產主義，與以工業爲專門職業的組織三種的分別，恰恰在那個義務不僅是屬於一個選擇的階級，而是屬於工人全體的解釋的程度。第一種是利用人類爲私人的利益；第二種是利用人類爲公益；第三種是將專門職業的榮譽心，一致心，與組織在公共事業之內連合起來。

第二種與第三種的管理機關的分別也許不甚大。兩種都含有必須嚴行限制工業資本現在主人的享有權或將他移交與社會。在兩種上面，都必需有一個機關使消費者對於工業所供

給的服務得有發言權。兩種的分別是在如何觀察生產者對於社會的義務。生產者也許從社會的代理人手中受命令去執行；也許憑藉他的組織，自身積極的參加決定這種命令。在前一種狀況之下，他的責任限於自己的工作，不及其他。假若他挖他限量的煤，就不必管這個礦是否失敗；假若他釘上了普通數目的釘子，就不必管船的價錢或是否適於航海，在後一種情形之下，他的職務所包含的，比他交與他的特別事務爲寬。也要包括對於這件事業全體成功的責任。無權柄的責任既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的地位至少一定要有相當的權限，使他能於這工業的進行在事實上有所影響。一個專門職業特有的標記就是這個對於保持服務上的某種特質大家所負的責任。這是與幾種的管理法不相衝突的，假若生產的單位不是團體而是個人，就不與任何管理法相衝突。這個意思就是說，個人一經進入這個專門職業之內，就對於工業的進行有一些的義務，無論這專門職業的組織是甚麼，當有相當的權柄，使工業維持這些義務。

工人參加工業管理的要求，多半用生產者的名義，作爲一種經濟自由或工業民主的要求。一九一六年美國工業關係委員會所提出的最後報告說『政治的自由只能在有工業自由的

地方存在。……在我們的共和國內有許多工業區域幾等於王國，對於依靠他們爲生的人加以壓迫，是和平與國家福利的可怕的危險。『英國人的虛榮心也許減輕黑暗增加光明。但權力的集中在資本制度的精神上根太深了，使用權力的武斷的程度不同僅屬於細節。大工場的管轄，對於工人生命與生活的事件上，實在是好像一種私人的主權，美國委員會稱之爲『工業的封建制度』，實屬正當。一個工業的組織除了受法律與工會的限制外，可以容許與歷史上名城一樣多的人口，在作息上，在事務上，經濟機會上，與社會生活上受五六個董事委員會的決定，英國人相傳的自由如何與這樣組織相容納，這是一件不容易懂的事。

最保守的思想家都承認，現在的工業組織在使生產者犧牲自由上，是不能忍的。每次用力解放自己的時候，就有人抗議說，現存的制度雖與自由不容，但至少能得實效的服務，這些求擴張工人的工業管理權的運動，都危害這個實效的服務。要離開生產者與消費者，明明是一切自己不能單獨阻止潮流的許多利益階級的會意。所以在過去幾月之中，他們集其全力，聲稱無論那一種團體工人的要求或權柄的進步，都是對於社會全體的新添強劫行爲，這是自然的事。佔

高地位的人，明明所生產的不及所消費的，詳告工人階級說，除非他們增加生產，就必須減少消費。組織很強的聯合工業，警告公眾以盜劫的直接行動的社會主義的危險。礦產與礦物的主人，新佔了保護窮人的地位，痛斥礦工的『自私心』，好像從前只有純粹的慈善心纔能使他們遲遲的收受利潤與礦稅。

這些論證所取的假定是簡單的。就是說現存的工業組織是生產實效的保障，每次要求改革，工人自身以消費者的資格所失去的必超過以生產者的資格所獲得的。世界已用盡了財產，要求多量的貨物。工人要求增加進款，增加閒暇，與較穩固較尊榮的地位。他們說這兩種要求是相對的。因為，假若以工人的資格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時間，消費者如何能有便宜的貨物呢？假若以消費者的資格他要求便宜貨物，工人如何能得這些條件呢？所以他們想到，工業在萬惡的循環道中行動，減少時間，增加工資，減少出產，有一天必變成延長時間，減少工資；每人所得的減少，因為每人要求增加。

這種描寫似乎是對的，但實在是錯的。他的錯誤不僅在粗淺的假定以為工資增加必須增

加成本，而在於一個別的較爲基本的理由。實在說起來，經濟紊亂的理由不在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要求，處於極端反對的地位；因爲，假如他們是不相容的，這種不相容的情形，在實在不相容的時候，一定是明瞭的，無論兩方面如何希望迴避，對於對方的責任，總不能否認。這個理由是他們並不衝突，而是由於在今日工業組織之下，工人所犧牲的東西，消費者的全體不必能得著，而消費者所付的代價，工人不必能獲得。假若這個循環是惡的，他的惡處不是在於這個圈子是整的，乃是由於總是開著一半，使產物的一部份，走漏到不加增生產精力的消費上去，而生產者因爲知道這個事實，不肯完全用他所有的生產精力。

使大家意見衝突的就是對於這個走漏的覺悟。假若『和平』的意思是完全沒有爭執，就沒有一個想得到的方法可以獲得工業的和平，所能得到的是使這些爭執不致燎然成爲階級戰爭的大火炬。假若一個團體的每個份子都捐助一點東西歸公，以便取些東西出來，他們仍然可以爲分配的多寡吵鬧，如小孩子爲餅子吵鬧一樣，假若東西的全體是大家知道的，而各人的要求又受了承認，所能吵鬧的理由盡在於此，各人既然都是平等的，凡要求比旁人多得的人必

須對於他爲甚麼要多得說出美滿的理由來。但在工業裏各方面的要求是未經承認的，因爲未放東西進去的人要求取出東西來，所分配的東西，與分配所遵循的比例，都嚴守祕密；那些照料分配公物，與管理分配出去的東西的人，對於以最大的部份劃歸自己，以最小的部份劃歸別人，都有直接的利益，假若一個捐助的人所受的較少，並不見得這個利益可以歸到曾經捐助東西而權利與他相等的人，恐怕要歸到完全未捐助而毫無權利的人。假若一個別人要求較多，他不必剝奪他的同類工人，而可以藉剝奪一個不做事的股東得著，這個股東人家相信是剝奪兩前類的人。就事實講起來，既然沒有決定他們應當得的原理，他們兩下奪取力所能得的東西。

在這些情況之下，罵生產者利用消費者是不對題的。這種的攻擊是在經濟上引用軍事上的一個方法，用婦孺掩護前進，然後抗議仇敵射擊非戰鬥人民的殘忍。將這種攻擊當作證據解釋，不能證明一部份的生產者利用其餘的人，而證明與這兩種人反對的少數財產的主人，能用他們的經濟權力，使用以攻擊生產少而消費多的人的用力，移來攻擊消費少而生產多的人。一部份的工人所獲得的比別的工人爲多，這個不平，是報紙上所常說的，卻被另一個較大的不平

所掩蓋，就是有些不做事的人也在分享，這是報紙所不提的。所以取消沒有相當的經濟服務的報酬是對於經濟實效與工業和平所不可少的條件，因為這些報酬的成存，使各級工人聯合起來，攻擊公敵，以致不能互相遏制。工業的原理或是職務，或是搶奪；若是職務，做得慢是比完全不，不道德的情形比較要減輕些。若是搶奪，就沒有道德了。但工業不能兩樣都是。假若產主或政府堅持保存無職務的財產，不肯除去自己眼中的木梁，就用不著指摘工會眼中的灰塵了。

老實說起來，只有工人能阻止工人濫用權柄，因為只有工人的要求是被承認應當受考慮的。阻止生產者利用消費的第一步是簡單的。就是將一切的人變成生產者。就可以除去一種引誘，使工人的團體不致強行他們的要求以剝奪公眾的利益，因為免除了一種有力的藉口，說他們所得的利益，是從那些現在不當得的人手中得來，因為是與服務不稱或完全不由服務得來的。實在說，假若工作是報酬的惟一理由，組織很強的生產團體利用社會的危險，就多半消滅了。因為不生產的人得不著報酬，就沒有疑惑的地點可以競爭，假若一個生產團體取得較多，別的團體必安於較少，這是明顯的事。

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部份的工人利用戰術上的優勝地位，爲他們自己強取不近情理的條件，以不利於同類的工人，可以正當名爲利用社會。但這句話在現在是無意識的。無意識的地方，是因爲要利用社會必須先有社會存在，而社會的存在，在今日的經濟範圍中，不是一個事實，而是一個期望。每當一部份工人提出於場主不方便的要求的時候，他們就被痛斥爲一羣盜劫社會的無政府黨人，這樣辦法在危險的時候，也許是個方便的武器，但一經分析，在論理上就自行消滅。這種方法在近年來曾施之於郵差、機器匠、警察、礦工、與鐵路工人，這些人連家室是八百萬的人口；在最後這兩種工人的事情上，有組織的工人的全體都表同情，人都以爲工人全體也受這些人無理要求的害處。假若將這些工人與表同情的人都減去了，所剩下的『社會』是甚麼呢？假若一種算學，將組成全體的部分，一一減去之後，得著全體的合數，是未免滑稽了；假若將社會各部份的利益，逐一減去，所以尋出社會的利益來，這個藝術是屬於學究的，不是屬於政治家的。

老實說起來，今日要拒絕任何部份工人的要求，用『社會利益』的名義是無益的，因爲單



就經濟平面講，今日的社會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不安穩的堆壓著，如辛巴（Sinhbad）與海上老人一樣，但這兩個社會在精神上，思想上，與經濟利益上，相隔天淵。有一個社會是靠工作為生活的，不管工作或專門職業是甚麼，又有一個社會是依賴前一個社會而生活的。凡屬後一個社會的人，都不能有前一個社會應享的犧牲與忠誠，因為他們沒有經得起審查的權利。將這個悲慘的畛域置之不理，不求將他消滅，這種性情是和順的。有時是大量的。這種情感好像害癆病的病態的樂觀，不敢自己承認疾病的利益。只要這種畛域繼續存在，工人的全體，雖可以受內部任何團體競爭之害，依然要用同情幫忙他們，因為大家對於每一團體的競爭都有利害的關係。要各部份的工人互相忍耐，除非是在競爭停止的時候，使他們面對著面，而不是現在有公敵的時候。一個理想的社會，其中沒有一個團體侵犯另一團體的生活標準，這是辦不到的，除非預先將無職務的財產廢除。

有些人以為閒暇階級，是一個不能改變的世界的一部份，不能設想一個沒有這個階級的文化，但世界因這個階級的存在而益窮，不是益富，這些人自己也不敢承認。所以應當完全利用

生產精力的時候，比如現在，他們就頓足呼叫，寫信與時報論到增加生產的必需，但他們自己，他們生活的方法與用費，他們閒暇階級生活的本身，從來就是生產不能增加的原因的一種。在他們的一切經濟計畫中，他們有一條保留，就是無論世界是如何的窮，世界總要供養他們。但做工的人就不必要這一條保留，也沒有需要的理由，因為社會的需要請求他們增加生產，是不能入耳的，即使這些請求不受他們常具的愚昧與誤會的牽連。

但現在的工人不是消費者的僕人，而是股東的僕人，為消費者的要求可以增加生產，而股東獨一的目的卻是紅利，照股東看起來，一切的生產，無論如何無用或兒戲，只要繼續生出紅利，都是一樣的。除非工人同時得著擔保，使財產增加之後，社會亦得同等的利益，就用不著激勵工人為社會增加生產。假若開煤礦的一切不需的費用都廢除了，要工人立一個很需要的榜樣，不為自己強奪較好的條件以剝削社會，這是近乎情理的事。假若負經營工業責任的人，在經營上『揮霍與浪費』如出席煤業委員會的最著名的正式見證人所說的，工人就沒有減少工資與延長時間的理由，假若消費者對於浮大的利潤，不切實的組織的費用，與對於不需的中人的報

酬，自甘受罰，就不應當怨礦工有貪心。

假若今日礦工或任何別的工人增加生產，他對於結果是使減輕物價而不是增加紅利與礦稅，是沒有保證的，正如以工人的資格，他不能決定僱主所供給買主的貨物的好歹，或所賣的價錢。只要他繼續直接是謀利的公司的僕人，而僅間接是社會的僕人，他是不能有這種保證的。要有這種保證，除非使工人對於經營工業所爲的社會立於直接的地位，使除去一切用費之後的一切剩餘，都落到社會而不落到私人手中。要承受這種保證，除非每種工業的工人，不僅充當執行命令的僕人，而是自己對於這個事業的性質，負有團體的責任，並且能用他們的組織，不僅爲保護自己不受利用，而是對於工業的管理與發展有積極的供獻。

## 第九章 實效的條件

所以一個新工業秩序的必需，不僅是爲受舊工業制度的害最烈的生產者，是爲消費者，因

爲舊工業秩序所藉以自誇而常用作反對改變的根據的能力，就是服務有實效的能力，現在是明明的破壞了。破壞的地點，總是在最易受傷的地點，就是人類的管轄，他們以獨具的除了自己經濟意思以外對於一切概行漠視之心，將人類爲自己的目的變成一個抽象名詞，叫著『勞工』。他的傾覆的第一個徵象，是與以往經濟傾覆第一次的徵象常具的情形一樣——就是習慣的激刺不能在人類的努力上得著習慣的反應。

除非承認這個失敗，將工業重新改組，使新的激刺得以自由活動，這個傾覆不能自己改善，反要繼續，並且增加傾覆的速率，其間不時雜以復興與精力的閃爍是無疑的。這個原因是簡單的。就是從事指導經濟活動的人，日益失去指導經濟活動所依靠的人的能力。錯處不在個人，而在制度，就是工業制度的本身。十九世紀大半的時期中，工業受兩種勢力的驅使，饑餓與恐懼，這兩件東西都在僱主掌握之中。他可以任意使人得僱用或失業。假若工人背叛他的條件，他可以開除他們；開除之後，他們所遇見的，不是餓死就是監牢。權限是集中的；他的器械是消極的；他們所怕的惟一事件就是失業。他們既不能阻止失業的實現，實現以後又不能對於他的惡餓多所

減輕，他們就對於一種督責俯首聽命，工業就藉他們對於一個權力的消極的緘默而進行，假若他們要反對，這個權力可以將他們個人毀滅。

人可以稱讚這個制度說有實效，也可以攻擊他說不人道。但至少他實行得動，這是稱讚他的。人所頌揚不倦的。這個制度的長處與短處，很像普魯士國家，只要他能繼續行動，就不受對於他的方法的攻擊的危害，如強壯的人驅除身上的疾病一樣。但在今日連他短處的性質也沒有了。這個制度逐漸失去實效。在他的黃金時代加增不息的富的出產，使他們藉著物質成功的偉大現象來封鎖批評者的口，現在已經沒有了。他雖繼續活動，但他的活動是不平均的，常在齟齬，顛簸，停頓之中，沒有社會的信任，對於自己也沒有完全的信任，好像一個暴君，從前用命令，現在卻要欺騙與諂媚了，好像一個獄吏，雖還沒有失去鞭子，卻只敢輕輕的責打，他雖仍然抗議，只有他能使磨子繼續轉動，使穀得以磨成，但不得不交出許多的權柄，使人懷疑是否有僱用他的價值。因為資本制度藉以行使督責的器具已一一被奪去。這個制度已經不能任意定工資的多寡與工作時間的長短。在組織很強的工業裏面，為權柄中心的任意開除工人的權，已經動搖，因

爲人不能再容忍使他們的生活依賴個人喜怒的制度。在一切的工業裏面，不能再用饑餓的恐嚇來制服不滿意的工人的時候快到了，因爲社會不再許餓死從不自由的失業產生。

資本制度既失去對於人的身體的管轄，而失去人心的管轄爲尤甚。一個文化的結果，將「窮人」最壞看作富人奢侈的器具，最好看作富人德行的器具，這個文化五十年前的心理基礎，是大多數人民的愚昧使他們崇拜主人的惡事爲智慧，與責任能力的缺乏，幾蠢如禽獸一般。教育與經驗，已毀壞了他們的無抵抗，這個無抵抗，便是永遠維持工業管理於資本家的貴族政治手中的條件。今日的工人不相信許多指導工業者知識上的優勝，正如他們不相信這個制度之合乎道德一樣。照他們看起來，這個制度不但是壓迫的，並且是浪費的，不合理性的與無實效的。依他在工場與礦裏的經驗看起來，資本家之自稱爲公衆利益的保護者，不過是假裝聖潔的事。因爲他每天看見工業的實效受短識的金錢利益的犧牲；照個人講起來，工人受了工業制度不人道的羞辱，但照知道工事好歹的專門職業的人講起來，工人日益輕視錯用的浪費與錯用的慳吝，與攙假，報告，欺騙的一全套，這些事是與以謀利爲工業成功最大的標準分解不開的。

所以，資本制度不能藉恐懼得著努力的工作，因為已不可怕了。不能以恭敬得著努力的工作，因為已經不受人尊敬。他們想憑藉勝利重振日就凌夷的聲望，但這種勝利的自身比失敗還要不幸。僱主也許自己慶幸他們仍然維持管理的自由權於不墜，或抵抗了公有的要求得著勝利，或破壞了增加工資縮短時間的運動。但在工業爭論或政治競爭上的得勝，常為工場中的失敗；工人也許失敗，但不見得他們的僱主，更不見得大部份由工人組成的社會因此得著勝利。因為工業的目的是生產貨物，用最低的人力成本來生產。但工人對於工作的制度起了藐視的心，從他們的忿怒與不信任心中，沒有一個點金術能得著有實效的生產。信用是工業的基礎，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但信用是心理的東西，資本家有心理，工人也有心理。假若信任心是投資所必需的東西，要純粹以工作為生的人，作有實效的工夫，信用的需要也不亞於在投資上面。假若工人尚未強到可以強行自己意思的程度，但他們的主人若強行意思，他們卻有力抵抗。他們也許寧願作工不願罷工。他們作工是為逃脫開除，不是為增加他們所不信任的制度的榮譽；假若他們被開除了，代替他們的人也是一樣的做法。

這是生產低落的一個原因，是經建築工業中僱主與工人都聲明過的，也是出席於煤業委員會面前的礦工代表所說過的。桑克法官（Justice Sankey）關於此點，慎重的重復聲明。僱主自己也未有力的辨駁。他們屢次所攻擊的『限制生產』除了指他們自身不能組織工業使獲得爲他們特別職務應當供給的實效的服務以外，還有甚麼別的意思呢？恣意完全攻擊工人階級的『私心』也是於情形不合的。『對於國家全體下攻擊』在工業中與在政治中是一樣的不能行。可以用制度來適應人性，不能用人性來適應制度。假若一個工業制度的效力，是使多數與日益增加的普通男女，不能尋得經濟努力的相當的動機，攻擊男女而不補救制度，這純是腐孺的意見。

所以，時候已經到了，工業專制也許仍然打幾個勝戰，但不能得全體的勝利，他失敗的原因，就是自己所擇的地勢，就是經濟的實效。在過渡的時代，一方面的人有權柄的名與習慣，而實際上無完全的權柄，另一方面，所獲的實權日益加多，但尙未經承認爲權柄存寄之所，這兩種人的爭鬪，擾亂了經濟活動，受害的卻是消費者。消費者既得不著柔順聽命的服務，也得有著有知識



的合作的服務。因爲奴隸制度可以行得通——只要奴隸願意；自由也行得通，只要人學習成爲自由；行不通的東西，就是這兩件東西的聯合。所以社會缺煤，並不僅是因爲出煤分煤的制度的技術的缺點，而是因爲這個制度已失去他的動力——因爲煤礦的主人不能說服工人，替他們增加紅利，替地主增加礦稅，而社會也不能請求他們用全力替社會服務，因爲社會決定了他們不做社會的而做股東的僕人。

這種兩難的情形，不是如一些人所想的暫時的，大戰後的產物，或爲煤業所特有的，好像礦工獨爲罪惡的子孫，如近數月來他們所描寫的一樣。這種情形是永久的；並且範圍擴張很大；睡著的精神既被教育所喚醒，而工業逐一的發展一個強烈的團體自覺心，就要更加擴張了。領袖的責備，恐嚇，或攻擊，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不過平常人心中私下覺著的，他們獨明白的說出來，意思就是在此。因爲這個問題，實在是屬於心理的。今日的情形，就是幾代以來工業制度爲謀實效所倚賴的動機，現在已謀不著實效了。五十年以前，希望，恐懼，愚昧，忍耐的易欺，與消極的隱忍的複雜體，連合起來，使工人在工業主義手中，成爲柔順的器具；今日要恢復以前的動機，要僅僅

的憑藉勸勉，來恢復那個複雜體，是辦不到的，正如想對於開了知識的人，回復天真一樣。

一八六〇——七〇年之間，是工業的黃金時代，工人聽命而推誠，工會一半仍然是違法的東西，國際競爭等於英國人在外國競爭，物價稍漲而不大漲，有些有知識有體面的商人，想恢復這個黃金時代，但這個理想卻是不能達到的理想國家。只要倖臣說皇帝穿了衣服，雖赤身也可以，假如一個兒童或愚人打破這個啞謎，裁縫是比倖臣的一切諂媚重要。假若社會因受了經濟活動遲頓之害，想救治這個疾病，就不應當頌讚明明停止進行的原動機的活動為可取與完全滿足，當求解放新的動機，求新動機的幫助。對於那些侮辱用的人與被用的人的激刺，當求代替的東西，因為已經成為不適當的激刺了。對於資本主義藉著失業與餓死而行的督責，應當用藉著責任心與專門職業的榮譽心而行的自己督責來代替。

所以為生產者鞏固組織，擴張責任，為生產者經濟自由的條件增加權柄，要求自由，不是與為消費者的利益要求增加工作的實效與增加生產相違背的。兩者是相成的，正如一個專門職業的團體，或是醫生或是大學教授，堅持他們專門職業的獨立與高尚的地位，反對人輕蔑他們

的事業的行爲，這不但不是與一個有實效的事業相反，並且終久是他不可少的條件。消費者最好的辦法，是在他的力量所能之內，促成這個過渡。因爲照現在的經營，工業是與他的天性相反。今日的工業用精巧的財政與技術方法，求超過不應當存在的困難，連海洋大陸都包括在內。不是以利用乃是以勝過專門職業的精神來求得結果。所承擔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經濟負擔，乃是逐漸增加的惡意與懷疑。好比『已經將使風流動的雀子打死了，』將他的屍身負在頸上行動。技術上的實效缺乏，自身雖很嚴重，但比起心理上的困難，卻是細事，商人宣傳增加出產的福音，而不處治今日經濟情形中之中心問題，正如傳基督教的人，爲避免擾亂聽衆的寧靜心，故意的不講到人類墜落與得救的方法。假若要增加生產，工人全體的積極的與建設的合作，是比發現新煤礦或一世紀的科學發明的結果，還要貢獻得多，這不是似是而非的話，乃是一個初步經濟自明的真理。

專門職業的精神，現在對於建設的工夫是冷淡的，甚至於是反對的，要得他的幫助，第一個條件就是在得著幫助以後的結果，要屬於社會，不屬於資本，土地，或別的富源的東家。因爲這個

原因，削減或完全廢除今日工業資本所含的私有權，不是理想家的要求，而是一種經濟實效政策所不可少的元素，因為這是使人類活動最有實效的條件，經濟實效最後是依賴人類，這一件自明的真理，如別的真理一樣，時常被忘記。但這不過是元素的一種。合作的範圍，可以從純粹的容忍到警醒的與熱心的自動。一個有效的管理制度的標準，在能引用專門職業榮譽心的潛勢力於工業經營上面，這種潛勢力正是現在工業制度所不想引用的，也是資本制度許多年來想藉著蹂躪工會的組織來完全撲滅的東西。

要使向專門職業的榮譽心的求援發生效力，不需根據於人性改變的假定，這個假定是那些最不满意於人性活動的現狀的人得意的矛盾論證。所必不可少的事，就是要計算幾種基本的事實而不像現在忽略他們。一切的工作都不是人所願意的，『人人都想以極少的用力求得最大的進款，』這兩件事也許如人所假定的一樣屬於自然明瞭。但事實上對於個人的態度極有影響的，是他所屬的團體的精神是與用力相成的或是相反的，與所設立的標準是甚麼。僱主常抱怨，有許多工人團體的公論反對加增工作的能率，假若工作效果的一部份變成股東的紅

利，這種情形，單就實效而論，實在是現在工業制度最嚴重的弊病。但即使公有代替了私人的資本制度，能否實行有實效的服務，最後還是在能使專門職業的榮譽心不但不爲反對的勢力，並且積極的幫助維持在情理之內所能要求的最高的實效標準。

具體的講起來，礦業現存的享有固然是對於工作無實效的積極的引誘，然而由官吏管理的公有，即使可以免除以一千五百公司分別經營三千煤礦所不能免的技術上的缺點，如雷美因（Sir R. Redmayne）所特別指出的，恐怕要失去另一種管理制度的大長處。要失去由實行家的技術知識所得來的幫助，這些人從日常經驗上知道管理細節可以改良的地方在何處，也要失去從專門職業的團體榮譽心所發出來的對於實效的激勵，這個榮譽心是維持與增進服務的性質所不可少的東西。專門職業的精神如吸力一樣，自身不善也不惡，但工程師在能用的時候，用來替他工作。將這個精神看作理想的標準是愚笨的事，但將他抹殺也是短見的事。在特別可以稱爲『公共事業』的裏面，久已承認團體的精神是實效的基礎，用各種的方法，有些好的，有些壞的，來鼓勵他：照事實上說在危險的時候英國所倚賴爲主要保障的權力就是海軍

的專門職業的熱誠，此外沒有旁的東西。這種精神也不是特別屬於與戰爭相聯屬的專門職業的。這是屬於共同訓練，共同責任，共同危險的東西。在一切需做困難與不樂意的工作的場合之內，引起這種精神的，通常不僅是金錢，而是個人所屬的小社會的輿論與習慣，在這個社會的尊敬之中，他覺著成功中所寶貴的東西。

一方面不顧最有力的刺激，如今日一樣，一方面又痛恨他所產生的勞力不能出現，這是思想顛倒的極點。要從工業中除去團體感覺的生長與行爲，恐怕生產者有組織的團體利用社會，這是一個可以動聽的政策。但這個政策的眼光，是短淺的。這是一種因小失大的辦法，是使服務的性質因保障反而下落。一個好的管理制度，要承認專門職業的團結心，可以替他做許多的工夫，比他自己做得有實效，因為專門職業的精神是個人的一部份；而不是在他之外的力量，這種管理制度要以援引這種態度來幫助公共事業爲目的。笨重的規則可以免人做不當做的事，結果有時也附帶的阻止人做當做的事，實在只有這個政策纔避免這種笨重規則的設立，只有這個政策纔能免官僚政治上機械的與有阻礙的事情。因爲工業進行不能無法律。假若不受專門

職業標準的管轄，必受不屬於這事業的官吏的管轄，官吏無論如何熱心與有善意，總不能對於這事業有密切的感覺。公共的管轄與批評是不可少的。但不當趨重細節，不然便不能達到目的。公平的標準一經設立之後，對於物價與貨色的弊病，最好由專門職業的機關來防制，使國家無做這事的必要。代替由外面來的詳細監督的方法，就是由裏面來的監督方法，由那些從學習這事業的程序本身中熟習了公共責任的人行之。總之，就是將工業變成專門的職業。

所以集產主義單獨講起來，是太簡單的解決辦法。他的失敗恐怕與別的注重理論的計畫一樣。

『他手中掌握著各部份，

可惜只缺少精神的聯絡。』

假若要使工業的改組，成爲活的事實，而不僅是紙上的計畫，他的目的不但要使工業爲公共的服務而進行，並且在進行中當有生產者的機關的積極合作。但合作含有責任，責任含有權限。希望人對於所不信任的制度盡全力，或對於管理上自己無分的制度有信任，是無用的事。

負擔專門職業責任的能力，在於有權除去妨害盡責的障礙，在於有權的時候，願意用他。

在歐戰期間爲增加煤產所設的關於煤礦的委員會，似乎受了兩種原因的妨礙。第一就是有一些委員會不願意招怨，對於同輩工人的曠工加以懲罰。第二就是從許多的委員會的管理之下除去管理上的錯誤。在幾種場合內，諸事進行順利，直到他們要求，假若曠工爲應得的曠職而受處罰，管理的人當工人願意工作，但因組織的缺點以致無工可做，將工人送回家去的時候，也當受同樣的懲罰。他們的要求被認爲『干涉管理』而招拒絕，強制執行按時到工的計畫，歸於失敗。再用同一的工業來作比譬，煤礦內車，軌，桶，木料之缺乏，在容易取煤的礦內，『取其精華』以不利於將來，因爲享有權不同的幻想致開採的計畫浪費，而現在的出產受減少，對於這種設備上與組織上的缺點，假若曠工的組織無權要求廢除，就不必希望他們能用其組織的力量於增加出產方面。

社會不能兩方面都得到。假若社會容許工人被待遇爲『苦力』就不能要求他們意志與思想的服務。假若社會希望工人顯出有技術的專門職業者的熱心，就當使他們有盡專門職業



的責任所必需的相當的權柄。要工人除去他們對於生產上所加的限制，必使他們有權要求廢除近來獨佔事業委員會所告訴我們的僱主機關所設立的限制，這些限制，因為力量較大，所以更壞。要使礦工的領袖，不僅僅為工資，時間，工作的情形交涉，而能請求他們的同人增加煤的供給，他們必需有一個地位，廢除由於管理缺點的生產低減的原因，這種原因在今日比起工人方面的不願意來，是個更嚴重的阻礙。假若要建築工業的工人，合起來增加出產的速率，對於他們精力所用的目的，必須與他們全體商量，當現在有些家庭三人同居一室的時候，所需要的是六個房的小屋，就不能希望他們建築繁華的房子。

人類居然願意自賤造出今日許多工人所產出的東西，如一部份是黃紙的靴子，與不適於用的家具，這實在是一件可悲的事。受過侮辱的人類的報復，雖不常是明顯的，卻是一定的；一個工業的組織，以實效的名義，毀滅了工人的責任心，消費者因為容忍這種工業組織而得的懲罰，就是連他所得的服務也不能有實效。貨色上的代價他總是付了，但在貨色上看不到所付的代價。今日他漸漸覺悟在貨量上也要受損失。假若社會要得著有實效的服務，只能從人類，從具有

自動心與好惡心的人類得著。總而言之，只能在以工業爲有責任的專門職業之範圍內得著。

所以，工人對於維持他們的專門職業的標準的團體責任心，是代替資本制度在以往所行使而現在日就破壞的督責的方法。對於僱主與工會的地位，都含有基本的改變。只要工業的指揮繼續在以爲自己從工業吸收最大利益爲目的的產主或其代理人手中，一個工會必需是取守勢的機關。工會一方面要聚會精力抵抗資本制度低減工人生活程度的攻擊，一方面即使工業管理無實效當最明顯的時候，假若工會有意干涉，還要被攻擊爲『干涉管理』。所以工會就成了永不能執政的反對黨，對於付與消費者的服務的性質，既無意志也無能力去負責任。假若無職務的產業的廢除，使生產的管理移於代表做建設事務與消費所生產的東西的人的機關，工人與社會的關係就不是間接的而是直接的，而現在純粹取守勢的結社，必能佔一個地位不但批評與反對，並且勸告，對於自己的社員勸議與執行屬於這事業的義務。

在這種情況之下，消費者所得的服務，不管他藉著在管理每種工業的行政部上的代表權如何得週密的保障，主要的是依賴專門職業的機關，能否對於今日產主代理人所執行的督責，

尋出一個代替的東西。這是明顯的事。他們必須自動的保持熱心，實效，與專門職業的榮譽心，在丟棄十九世紀的野蠻器具以後，這就是出產高的標準的獨一保障。這個新職務在專門職業的組織裏面一有可能，希望他們有相當的能力來執行，並不是一個奢望。經濟的動機今日受妨礙達到甚麼程度，用另一種的工業組織可以鞏固若干，在甚麼範圍之內與甚麼情況之下可以引不用不純屬於經濟的動機於工業服務裏面，這些事只能在研究這個事務的心理以後纔能決定，但現在尙未從事這個研究。要使這樣的研究有價值，起首就要拋棄經濟學課本上所使大家習見而爲實行家認爲自明的習慣的假定，就是說勞力的動機在性質上是簡單與不變的如汽鍋的汽壓一樣，並且在一切的經濟活動上，從股票交易到移車與砌牆，是相同的，而只能用直接的經濟引誘引出與鞏固他們。單講現在已經討論過的工業上的動機，這種研究通常是這些作家做的，他們如大半的發揮科學管理法的人一樣，起首就假定商業心理的分類，可以用於工人中的一切階級與生產事業的一切形式都一樣的有效。這樣的分類似乎是從刪繁就簡的分析公司發起人，理財家或投資者的心理程序得來，用來解釋決定瓦匠，礦工，船場工人，或機器師對於

他們的工作的動機與習慣，是否確當，正是懷疑的一點。

在幾種的工業上這種的心理分類只是一部份的有關係，這是明白的事。例如，我們不能假定一個外科醫生，一個科學研究者，一個教員，一個衛生官吏，一個印度的文官，一個田主，對於工作所用的技巧與精力的程度，可以用這些事業的經濟利益恰合的表現出來，並且表現的程度相等。那些從事的人受經濟引誘的影響的程度雖不一定，卻是不小，這是明白的事。但行使各種職業內的每一程序或步驟的確切性質，如施行一個外科手續，進行一種研究，選擇一個特別的教授法，預備一個報告，判斷一個案件，或照料牲畜，並不是直接依靠對於金錢的盈餘或損失的確切計算，這又是顯見的事。事實似乎在幾種生活裏面，一個職業雖經考慮了經濟利益然後選定，而勉強人出為避免開除與『失敗』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用力，雖為經濟的原因，但所表現的精力與嫻熟的實際程度，是多半依賴屬於另一種的性質的條件。這些條件之中，有進職業以前與以後所受的訓練，同人的公論所要求的勞力的習慣標準，對於個人往來的小社會的尊敬和希望，與被人認為『成功』而非『失敗』的希望，對於事業的興趣，從終身專心研究到決心

『對得起』事務，工人的榮譽心，與『事業的習慣。』

假若說許多人不受經濟原因的影響，這是愚昧的事。但要說他們純粹的受這種引誘的支配，也是對於工夫進行的實際情形的一個極不真實而屬於書本的描寫。這種原因的勢力的範圍因職業而不同，要看這職業所做的工夫的性質與其組織的狀態。在特別可以稱爲工業的裏面，金錢盈虧的計算，是比在多半的所謂專門職業之內，更爲有力，即在工業之中，他們出現於『指揮』工業的商人心，是比在多半受定薪的經理人與技術家，或下級工人的心中，尤爲恆久。在教書與醫藥的專門職業之內，在國家服務的許多部份之內，所需要的性質的獲得，不經過資本的僱主的媒介，而一部份是由於金錢的引誘，一部份是由於訓練與教育，一部份是由於做這些事務的人的方面，承認他們專門職業的習慣的義務爲他們工作生活的組織的一部份。但這種區別不是恆久與不變的。他的發生是由於各種職業的組織狀態，由於他們所供給的訓練，與他們在同輩中所培養的精神。一個職業的心理，事實上是可以改變的；新的動機，只要有方法使他們得自由的表現，是可以抽引出來的。要將建築工業變成有組織的專門職業，有比較高的

道德與公共榮譽心，如醫藥與教書一樣，是辦得到的事。

老實說起來，我們對於通行的描寫經濟原理所根據的與通常用以討論經濟問題的人類動機的假定，應當根本的加以修改。假定個人急需的激勵，是對於生產勞力的獨一而足夠的激勵，是粗淺心理的遺物，在以往的歷史上與現在的經驗上，都沒有根據。這個假定動聽之處，是由於淆混了兩種工作的意思，工作有兩種，一種是為實際上避免餓死所必需的一個最低限量的活動，一種工作之行使，不顧初步的需要是否已經滿足，乃是由於平常的人，自然的要維持他們所屬的團體的輿論所認為勞力的正當標準，而非常人還要改良這個標準。這個區別是舊的，是屬於自由人與奴隸的工作的區別，但這個區別社會纔學到手，便忘記了。經濟的恐怕可以得著為避免經濟懲罰所必需的最低勞力。但在以往使進步可能的東西，我們可以提議說，今日世界的所需的東西，不是為避免實際需要所需的純粹最低的工作，乃是要人有能力以一種限度的精力加之於工作之上，這種限度的精力，雖可以用經濟的引誘激勵起來，而所得的結果，卻遠超過為僅僅避免饑餓與貧乏的極端所必需的結果之上。

這種能力是由於訓練，習慣與素性的，至少是與金錢的激刺一樣，所以一個代表工人團體的輿論的專門職業組織提高這種能力的能力是很大的。工業一經從順從無職務的業主的利益得著解放，工會就可以在這個範圍之內逐漸增加職務的活動。他的動要，對於社會的公共利益與對於特別工人團體的特別利益，都不容易說得太過。技術的知識與管理的能力，不管委員會是由一個工業的工人選派，或是如今日由股東選派，都一樣的可以得著。但今日日漸明瞭的事實，就是經濟情形的難題，不是工業組織的技術上的缺點，乃是那些指導工業的人，日漸失去獲得人員積極的好意的能力。將工業變成爲公益的專門職業，可以希望他們的合作，照現在看起來，只有這樣纔能得著這種希望。

這種變遷一經成立，工會不能不負內部秩序與公共責任的新的而常屬痛苦的義務，不管這種義務是如何的與現在的習慣不合。因爲到最後的時間，權限是與用他的能力相隨的，權力是與職務相伴的，這也許是要慢慢的進行。工人不能同時擇兩件不容的地位。或者擔負工業秩序的責任而得自由，或者放棄這種責任，而繼續爲奴隸，這是他們必須選擇的事。假若組織成爲

專門職業團體之後，他們所供給的服務是比今日被資本家僱用所強奪出來而日益困難的服務，較有實效，他們將來的地位就鞏固了。假若他們不能，他們就繼續居於不可靠的生產器具的地位，如今日許多的工人一樣。人類的天性，對於不能以實際成功為存在的理由的精神要求，不願照外面的價值承受。有組織的工人如任何別的階級一樣，達到權柄所經的道路的起點，是在使所供給的經濟服務，比起他們的主人藉著對於工業日就動搖而不定的把握所能供給的，較有實效。

## 第十章 勞心者的地位

將工業變成專門職業所包含的改變，在管理的人的地位上，至少是與勞力者的地位一般的重大。每種工業既為行使職務而受組織，僱主就失其獲利者的資格，成為工人中的一份子，如在以應得的權利獲得現在的地位範圍以內，他已經是一個工人一樣。在幾種工業裏面，經理人



也是一個資本家，這種變遷，可以從限制他的資本家的利益著手，如僱主與工人提議引用於建築工業中的一樣。在別的工業中，管理的事務全體是在僱用的經理人手中，這樣的變遷，已經實行了一部份。這種變遷的經濟的條件，實在已經由將享有與管理分開實現了，已經由日益增多的受委託管理工業中科學上與管理上的事情的無產的智識階級的發生預備好了。商業的集中，組織的進步，與應用科學於工業的發展，已經使工業的勞心者數目加增，這種人已經使舊日的，而現在普通言語中仍然流行的『僱主與工人』的區別，對於今日存在的工業制度，成爲極不忠實的描寫。

要完成這個變遷，只要這五十年以前尙無所聞的新職員階級承認他們也是財產當權的犧牲品如工人一樣，並且他們專門職業的榮譽心與經濟利要，都要他們與其餘的從事建設工夫的人，取一致的行動。他們今日的地位通常實在不是一個快樂的。他們中有許多人如礦上的經理人，薪俸甚薄。他們的位置，有時極不穩固。陞遷的機會也許很少，而分配又極無標準。他們看見工業的獎品送給私人或親族；親族制度的結果使一個商業的首領安插全家子弟於其中，用

金錢將這些子弟們安放在生意之外，卻是個經濟的辦法，在政府事業上偶爾有引用親族的事，就要受大攻擊，而在私人工業上，習爲故常，無人懷疑其正當。大戰時他們發覺有組織的工人的工資已經提高，而他們自己的薪水，幾乎沒有更動，因爲他們太文雅，不願加入工會運動，而今日他們的薪水有時竟比他們所負責的工人的薪水爲少。照工人看他們是寄生於主人的人，而照僱主看他們不過是其餘的『工人』中的一部份，所以他們有資本制度的惡名而無資本制度的權力或利益。

將工業變成專門的職業，現在在工業上做智識工作的人所獲的利益，是如作手工的一樣的多。因爲我們所申辯的爲工業組織基礎的職務原理，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理性的標準，可以決定從事工業的各團體的權限與義務。這樣的標準現在沒有。工業時代以前的社會制度，現在還藉着古典組織的形式留下模糊的踪迹，是將從學徒到東家的途徑中遞進的階級慎重劃分出來，每人有他的明白界說的權利與義務，因各級而不同，合攏起來成一個職務的階級制度。十九世紀所發展的工業制度，除了個人方便之外不承認有別的組織原理，個人憑藉冒險，才能好運

氣，不問是非的精力，或純粹的親族援引，碰著機會就掌握經濟的權柄。他的權力只以所能行使的爲界限；他的權利是任何時所能攫得到手的。一八五〇年至六〇年間南開夏（Lancashire）的廠主如古代神話的巨人一樣，自己就是法律。所以，服從與秩序既爲任何複雜事業不可少的東西，工業中出來的服從，是僕人對於主人的服從，工業中的秩序，是經濟上的強者加於經濟上的弱者的秩序。

藉著個人爲自大競爭來分配權力的代替方法，就是依據職務來分配他，使生產的複雜程序中的各團體所行使的權柄，以使他能行使所負責任的特別義務所必需的爲限，而不超過這個範圍。根據這種原理組織的工業，並不含有將具有特性的經濟職務混合在一個無區別的工業民政之中，也不將勞心者消滅於技工與工人的羣衆裏面。但這種的組織卻與由任何階級或個人行使無限的經濟權柄不相容納。他的基本規則，就是一個人所行使的權柄，只限於因職務的理由而交付於他的。服從是有的，但與現在的服從大有區別。因爲不是一個人對於別人的服從，而是一切的人對於經營工業的目的的服從。權柄是有的，但不是個人藉著經濟的權力謀自

己的經濟利益而加規則於別人的權柄。這種權柄必是由連合各種義務謀達公共的目的的必需而來。秩序是有的。但這必是謀達那個目的所含的秩序，而不是爲別人的便利或利益加於一個人的秩序。在這一種工業組織之下，勞心者可以希望得著自己的地位，這是從來未有的事。他的價值與陞遷，可以依照他的能力而不依照他的財富。他恐怕不致於如今日一樣因貧窮的原因得不著機會。判斷他的人就是他的同人，而不是以紅利爲目的的財東。他不致受價值顛倒之害。這種的顛倒情形，將創造財富的才能與精力看得比財富的享有爲低，富人最高是受賜於才能與精力的人，最壞是浪費知識所生產的東西的人。在一個爲鼓勵創造能力而組織的社會裏面，最受尊貴的就是做創造工夫的人，正如爲享福而組織的社會裏面，最受尊貴的人，就是那些享有財富的人。

這樣理由是太泛而太抽象，不能使人相信。將現在礦的經理人的地位與實行桑克法官 (Justice Sankey) 所提議的煤礦國有計畫以後他們所居的地位相比，可以得較有具體的情形。假若有一羣專家估計這樣改組的可能的結果，自然要研究他們對於他們專門職業的將來

的關係，與對於他們所領袖的服務實效的關係。他們恐怕也要計算到薪俸，養老金，地位的穩固，與陞遷的事。同時對於那些不容易界說而重要相等的各點，他們也要有滿意的研究。私有或公有，在那一種制度之下，他們可以有最大的個人自由權或權柄，以管理在他們的專門職業範圍之下的事務？在那一種制度之下，他們有最好的保障，使他們的特別知識受相當的尊敬，使處理美術事務的時候，不受非專家的壓制與妨礙？

單就煤業的範圍而言，穩固與薪俸的問題，不用討論。最崇拜現在制度的人，也不能說地位的穩固是他對於被僱者的一種長處。至少在幾個礦區之內，經理人就專門職業上講無論如何有稱職，假若當衆宣言爲公司董事所不悅的意見，就有被開除的危險。通常對於政府事業的批評，實在是說他們的地位太穩固，這種批評不是完全無道理的。關於薪俸問題，英國礦業公司已曾經供給煤業委員會以統計的，在半數以上。（註一）假若他們的數目是可靠的，可以看出

（註一）煤礦部以下列的統計供給煤業委員會（第三卷附銀六六）這是關於英國煤礦的百分之五十七的統計。

經理人數目

薪俸(紅利 房二百磅 煤在內) 及以下		二〇〇磅至二〇一磅		二〇一磅至二〇二磅		二〇二磅至二〇三磅		二〇三磅至二〇四磅		二〇四磅至二〇五磅		二〇五磅至二〇六磅		二〇六磅及以上	
一九一三年	四	一三四	二八〇	一六一	三二一	五七	五〇	一九一九年	二	三	二九	二五一	二一三	一四六	一五二

來有九個經理人，算作一類，所得的薪俸與礦東所注重而應當注重的經理人的責任相比，其數目之小，更見得可異。國家的事業通常是沒有而也不應當有可以與私人工業相比的金錢獎品。假若煤礦在過去十年之內收歸國有，過半數的經理，或不致受每年三百〇一磅以下的薪俸，而在一九一九年物價已經加了一倍，五年之間礦東的利益總數為一萬六千萬磅（但其中的大部份為屬於國家徵取之稅），他們的薪俸恐怕不致在五〇〇磅以下。要說礦經理所得的薪俸可以代表私人工業的薪俸，是不確切的，而工業變為公有之後，現在所出的最大的獎品的數目，或者要縮小些，這也是不用否認的事。但可以盼望將小的與中等的薪俸加增起來，而將最大的削減一些。無論如何，工業中多半的勞心者，不必在金錢的原因上，對於如桑克法官 (Justice

(Sankey) 所提出的這樣的改變有所懼怕，這是不必否認的事。在工業尋常組織的狀況之下，利潤不是屬於經理人，而是屬於股東，這是不用多說的。我們沒有原因可以相信每噸獲利五先令的礦經理所得的薪俸，比每噸獲利三先令的礦大一些。

這個改變的金錢方面，不是一羣經理人或技術家所當考慮的獨一之點。他們應當考慮這個改變對於他們專門職業的地位有甚麼影響。在社會的服務之下，他們所有的自由、自動、與權柄，是否如在私人享有之下一樣呢？這個問題的答案，要看行使公共服務的管理制度的形式而定。在一種辦法之下，一個礦經理的生活，也許因他負責任的礦內工人不斷的反抗，成爲一種重擔，這是意想得到的事。也許在一種辦法之下，他受總部人員討厭的干涉，至於行動不得，這也是意想得到的事。在以往的時候，有些『合作工場』的經理似乎受了前一樣的危害，勞工交換所的職員，似乎受了後一樣的危害，除非普通傳說的話不可靠。我們應當注重這些危險，這是正當的，而實在是不可少的事。我們已經說過，改組工業的問題，是製定組織法的事。除非我們預先指明幾種不同的組織機關容易犯的缺點，就不能將這問題處治成功。

但這些危險一經承認以後，想出防備他們的方法，似乎是比較的簡單的事。假如我們將桑克法官（Justice Sankey）的提議當作國有工業中經理人所居地位的實例，可以看出來這些提議並不含有上述的兩種危險。我們承認經理人要與地方礦務會或礦穴委員會一同工作，這種礦務會或委員會『每兩星期集會一次，於必要時可以增加集會之次數，在關於礦務進行與安全的一切問題上，與經理人以意見』。『假若在任何關於礦的衛生與安全的問題上經理人不受地方礦務會的意見，這種問題應當交與礦區礦務會。』我們也要承認這種地方礦務會一經正式成立之後，經理人必覺得有獲得他的信任的必要，他藉著善言而不藉著驅策獲得領袖者的地位。總而言之，要造成一種友愛與善意的關係，如應當存在於任何公共事業的同事中間的一樣。在一切這些事情裏面沒有甚麼東西足以損害他的權柄，除非『權柄』的意思是指著無人宜於行使與在清醒的時間少有人願意要求的武斷權柄。經理人不是由工人選派或對於他們負責，乃是由礦區礦務會選派，並對於礦區礦務會負責，這個會掌管一區的礦穴，經理人在這個會內有代表權。經理人也不致受遠處『書記政治』的害處，用許多的通告書壓迫他，或



由在倫敦想出的不能實行的命令超越他的專家知識。桑克法官 (Justice Sankey) 與礦工聯合會所提出的計畫的精神就是在一國的組織範圍之內的分權管理法。並不發生『由中央政府管理工業的問題。』各礦區的特性分別甚大，依靠地方的知識與經驗是重要的，所提議的就是要將工業的管理負託在有地方知識與經驗的人的手裏。總之，所主張的組織法，乃是『聯合』的而非『單一』的。在中央與地方的管理人中間，有職務與權限的分配。關於必須由一國處理的事項，由前者定立一般適用的規則。後者在一區的範圍之內管理工業，只要繼續遵守那些規則，并供給定額的煤，就可以有地方自治權，依照他們認為最適於地方情形的採礦方法。

照這樣解釋起來，公有不見得對勞心者的特別技術發生無意識的干涉，這是他所怕的，亦是很自然的事。他的專門職業的發展的機會，比起今日只屬於少數有特別利益的人來，實在大得多，勞心者的專職在增進生產效率，而今日生產效率的理由往往因董事部之壓迫，被眼光短淺的金錢利益所勝過，這些董事希望對於股東表示即刻的紅利，為這個原因，只取礦穴的精華，或者所用的方法與技術實效所必需的相反。將經理人的專門職業的能力解放出來，使他盡力

於公共的事業，這件事對於社會的利益，是與對於他自己一般的大。因為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使工業的經理與技術人員，成爲公共責任的很重要的寄存之所，而在今日他們即懷最好的心思，亦不能盡這些責任。近世工業組織最著的特性，是生產的經營，在生意人的普通指揮之下，而他們不一定知道關於生產的事。『商業』與『工業』漸漸分離成爲兩個部份，雖同在一個經濟制度之中，而僱用人員的種類不同，所喚起的性質不同，所承認的效率與技巧的標準也不同。工業的技術與管理人員自然是與別人一樣能受經濟引誘的影響。但他們的專業是生產不是理財；他們若不是覺得受經濟不平的痛苦，也如多數的工人一樣，願『注意於工作做得合宜。』最後管理工業的商人，關心的事，是公司的發起與投資，競買與廣告，市場的把持，特利的獲得，合夥，聯合，與獨佔事業的計畫。事實上他們所關心的事就是金錢的結果，對於實際上貨物的製造，其興趣僅及於由此而生的金錢結果。

\* \* \* \* \*

使商業與管理的範圍彼此分離很大的組織變遷，其重要很像一百五十年以前使商業與

工業分離的組織變遷。對於消費者尤關重要。當經理人、技師、與資本家的職務聯合於「僱主」一人身上的時候，如工業制度初起的時代一樣，我們假定利潤與生產的效率趨於一致，這並不是不近情理的事。經濟學家證明經理人遵照「代替律」使用最經濟的程序、機器、與組織的方式，這種證明所用的奇巧思想在這種情況之下，有些動聽之處。我們承認即使在這種情形之下，僱主也許將貨物攙假，或利用無依靠的工人階級的勞力。但指導工業的人只要自己主要的職務是屬於經理人的，即使有這個意向，也沒有訓練、能力、或時間聚會他的特別注意於與生產藝術的進步無關係或相反對的金錢利益上，而普通以「製造家」為保護消費者利益的人的描寫，也有些理由。自工業的財政與技術部份分離以後——自「生意」與「生產」分開以後——利潤與生產效率的連絡就因之而漸漸斷絕。獲得前者而不成就後者之方法，在今日是比较前加多；若有人申辯工業領袖的利益，促人應用最「經濟的」方法，因此獲得工業的進步，必需問「為誰經濟？」雖說照以最低的原價供給最好的服務於消費者看起來，最有效率的工業組織，也許是對於公司有最大的利益，但我們也要承認利潤獲得的方法，常與有實效的生產無

關，並且有時是於他有妨礙的。

照『生意人』看起來，最獲利的方法也許是真正合於科學的『管理』所排斥的，這種情形可由三種實例看出來。第一，因新生意的奇巧的改變資本方法或舊生意的改組而獲的利潤全體，幾完全與生產無關。例如，一個十萬磅資本的南開夏（Lancashire）紡織公司被一個在倫敦的聯合公司所收買，重新以五十萬磅的資本的名義開辦——這不是一個過分的例——事實上是怎樣呢？在許多場合之中，改組以後的工場生產的設備，是與未改組以前一樣。但價值卻變了，因為預料工場的貨物的售價不但可以對於較低的資本估計，並且對於較高的資本估計，付相當的利潤。假若市場的情形與工業的將來，可以使大眾相信這件事，發起改組的人，就覺得有重新更改資本的價值。他們以銀行家的資格而不以製造家的資格獲利。他們并不以任何方法加增公司生產的實效，但他們獲得股票使他們可以享受增加的利益。假如市場的情形好，普通他們一得了股票，就賣去大半。但無論他們賣與不賣，所發現的事實就是工業中的商業元素，藉著一種程序，得著享受產物大部份的權利，而不以任何方法加增對於消費者所供給的服

務的實效。

還有別的實例證明『商業』對於生產的掌管轄，橫截經濟進展的路線，就是競爭工業與獨佔事業的浪費。大家很明白消費者所付的價錢包含販賣的用途，這個販賣的用途有不定的情形，然而卻是很大的成分，是不屬於供給貨物的，而屬於在含有廣告費用與競爭分配的費用的情形之下供給貨物的。照各公司看起來，這樣的費用，使他們能吸收對抗的商家的一部份生意，也許是合乎經濟的；但照消費牛奶與煤的人看起來——只言其最著的兩例——這些費用是純粹的損失。這種浪費也不是限於分配的方面，如有時說的一樣。鐵路的經理人與專門的礦師都說，照技術上的原因講起來，鐵路與礦都當有一個統一的管理。然而直到大戰時期，商業上的關係繼續維持一個浪費的制度，使每個鐵路公司各自為政，阻止各礦穴，甚至於同在一區的礦穴，使他們不能當著屬於一個組織的份子去管理。有些礦穴被水淹沒，因為礦公司對於共同抽水價值的分配不能同意；材料之買進與貨物之售出都是分開的，因為各礦公司不能聯合；遺棄的小煤總額有幾百萬噸，因為礦道最經濟而又技術上實效最大的開採方法，不定是對於掌管生

產的生意人獲利最厚的方法。在這一件事上，各礦間經濟勢力之大不同，足以阻礙在經濟上認為可取的統一；假若一個公司有『好東西』，他的董事自然不願意將利益與有壞礦或開採費大的公司混合。假若競爭的浪費或其中的一部可以由聯合免除，這是技術實效上一個進步，也是商業動機上榮譽的事，這種情形在別的工業上日益加多。但在那種情形之下生意人的利益與消費者的利益的區別，不過更進一步；這自然是起於物價的問題。假若有人以為對於隨著生產受商業管轄而生的經濟浪費的描寫是太過，就請他看一看『實效工程師』對於這個制度的批評，這些實效工程師受聘請對於工業的組織與設備供獻其意見，日見其多。大戰中在美國成立的公共事業公司的甘特（Mr. H. L. Gantt）說『公司中的高等職員，都是屬於「商業」心理的人，無有例外，他們的成功是藉著理財，買賣等……照事實上說我們的工業制度，沒有達到我們的希望，這是大家知道的……這個缺欠的原因，無疑的是因為指揮工業的人，受了為利益的商業制度的訓練，不懂得一個完全為生產的制度。這並不是批評他們個人；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的事務，更壞的是他們并不知道他們的不知道。』

所以只要『生意』與『管理』分開，而後在受前者的指揮，在這種範圍之內，不能假定工業的指揮是在以生產效率為主要事業的人的手中。自然有很大的實效，是附帶的由謀獲生意的利潤而來，這是無庸諱言的。但我們必須承認，工業的發展到了這個程度，那些指揮工業的人的主要興趣，都用在財政的戰術與市場的控制上面，因為從這些活動得來的利益，普通比較從純粹改良生產程序得來的，是大得多。但消費者的主要利益恰恰正在那個改良，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假若他想到大利潤是有實效的生產的記號，他可以容忍他所關心的是貨物的供給，而不是股票的價值，假若他看見利潤不是由有實效的生產而來，乃是由善於理財，或敏銳的商業戰術，這些利潤，就不見得是正當的。假若消費者因憎惡所謂『浮利』而求一個方法，代替以『商業』管轄生意的制度，除了與工業中的經理與技術人員聯絡外，沒有別的方法。他們組織消費者所需要的服務，對於消費者所不相信的理財方法，在物質利益或心理偏向上，他們比較的不受牽連，並且覺著以理財為主要事務的商人對於他們專門職業的管轄，因為阻礙技術上的實效，並且在薪俸的待遇上殘酷慳吝，甚是討厭。在公益與專門職業的理由上面，他們屬於一個應

當自動的謀生產者與社會聯合的團體。他們能供給社會以科學的知識與爲生產藝術進步最重要條件的特別才能。社會能與他們以比較穩固比較尊貴的地位，能與他們以較大的機會以行使他們的特別才能，並且社會能使他們覺得他們盡力工作犧牲生命不是爲少數無害處卻無生氣的股東的利益，乃是爲他們同人全體的服務。假若後一種的長處是句空話不能成立——假若衛生官吏，教育指導員，合作整賢的指導員都假定爲不受感覺社會服務的影響——至少前兩種的長處是存在的。這兩種的長處很大。

管理的技術逐漸與金錢利益分離，將來的『僱主』的發展，恐怕是循著這樣的路線。在全體的工業界內，用一定的薪俸代替不定的利潤，這件事自身，足以從僱主地位上除去盜劫事業的可恥空氣的一半，這種空氣今日使一個愛名譽的人感受困難，因爲他受了服務的報酬以後，還有沒有任何理由可說的剩餘。從利潤得來的大進款消滅以後，他的薪俸也不必要大，如今日進款的計算一樣。有人說在仍用牲畜計算財富的野蠻人中，大會長稱爲百牛的人，一個年受四十萬元的大事業的經理人，可以同樣的稱爲百家的人，因爲他受了百家的進款。我們承認特別



才能是無價的，一個幾百萬流水的生意的首領，年俸四十萬元從經濟上看是很小的事。但經濟的理由不是獨一無二的理由。還有『榮譽心的問題。』實在講起來，這種百家之俸不是屬於君子的。

當重要問題發生的時候，沒有一個自愛的人能出而索價，這是各人都覺得的。一個將軍不與他的政府計較他爲勝利盡力的確切的金錢代價。一個衛士報警救了睡眠的全軍的性命，第二天并不去向所救的人每人索取代價；他每日受一先令的報酬，若得著了還算幸事。一個船主不能將自己與他的東西移入小船，讓水手隨各人的力量從破船中爬出來；照這一行事業的習慣，船主是最後離船的人。社會沒有甚麼原因侮辱製造家與商人，以爲他們比武官還要厚臉，比兵士還要不知足。我們若說他們的價值比他們中幾個人所得的大薪俸還要大，這常是對的。但這是不對題目的。沒有一個人能希望依『他的價值』受報酬，因爲他的價值是他的靈魂與上帝間的事。他所能要求，與他的同人應當照料他得著的，就是所得的足夠使他作工。工業既經根據服務組織以後，他所得的就是那些，也只限於那些。我們替工業的經理人說句公道話，貪財的

弊病不是他們特別易犯的，（他們是與股東不同。）他們也沒有貪財的理由。假若一個人有重要的工作，有足夠的閒工夫與進款使他做得好，他所有的快樂，是與人類任何人的快樂一樣的滿足。

## 第十一章 結論

所以根據職務而不根據權利的社會組織，含著三件事。第一個意思是說，帶有行使服務的財產權應當維持，不帶的應當取消。第二個意思是說，生產者應與生產所為的社會立於直接的地位，使他們的責任明瞭而無疑問，不像現在因為他們直接附屬於以獲利而不以服務為利益的股東，就失去了責任。第三個意思是說，維持服務的責任應當放在行使服務的專門職業的機關的肩上，並且在消費者的監督與批評之下，這些機關在工業的管理上，行使盡責任所必需的權限。沒有制度或機關的改變能避免因人性中的自私，貪心，或好爭所造成的社會病。這是明顯

的事。但所能做的，是造成一個環境，使這些特性不受鼓勵。他不能使人依照原理生活，但所能做的，是使社會秩序建於原理之上，使他們願意的時候能依著這些原理生活，而不違反他們。他不能管轄人的行爲。但可以使他們有一個目標，維繫他們的心。他們的心理既然如此，他們實際的活動，除去例外，終久亦必如此。

所以工業的合理的組織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英國人因爲不相信原理易於輕視或完全遺漏的思想改革。應當將側重從工業對於個人所與的機會，移到工業所行使的社會職務；他們應當明白工業的目的，應當用這目的來批評工業，不當用與這目的不相涉的附帶結果來批評，無論這些結果是如何的堂皇可愛。一個不是純粹自動的活動的意思，是在於他的目的。近世社會的經濟生活所以永遠在病態的煩惱之中，就是因爲工業以征服天然服事人類的目的，不會在組織上美滿的表現出來，也不存在經營工業的人的心裏，並且因爲人不將工業當作職務，而當作個人獲利，進步，或炫耀的機會。假若要除去產生這不自然的緊張的條件，除非養成一個心理的習慣，將經濟組織的問題，從他存在所爲的目的觀察，並且對於他引用培根（Bacon）所說的

話的精神。他說，人做工夫，『應當爲榮耀上帝與救濟人的生活。』

從那個眼光看起來，本著權利不能解決的問題，比較的有相當解決的可能。因爲一個目的第一是一個限制的原理。他決定一種活動進行所爲的目的，因此及於他活動的範圍。將有做的價值的事與無價值的分開，并對於有做的價值的事，立一個如何做的標準。第二是統一的原理，因爲他供給一個目的使一切勞力有所趨向，將在他方面可以衝突的利益，附屬於最高的目標的判決之下。第三是攤派或分配的原理。使從事於一個公同事業各團體，各得他們行使職務所當有的地位。所以他設立的秩序不是建立於運氣或權力之上，而是建立於原理之上，使報酬的根據，不是在藉著好運氣自己搶奪而來的東西，亦不是由於運氣不好的時候被勸誘而承受的東西，乃是適合於他們的職務的東西，不多不少，使那些不做事的人得不著報酬，那些對於公共目的有供獻的人以公正的事務得公正的報酬。

吾人有一種極願與美德，

盍不自興以興人？

如勵之使進，

萬法有條而不紊實進行之坦途。

\*

\*

\*

\*

\*

\*

此不過形式的，

而內容吾人必皈依神之意旨，

因吾人之志願實神之志願。

\*

\*

\*

\*

\*

\*

此理不明，

猶在天之有極樂世界，

而不嘉惠吾人以恩澤，未之有也。

皮加達 (Piccarda) 向但提 (Dante) 解釋天國的名句，是描寫一個複雜多形的社會，這個社會是由對於一個共同目的的極端忠誠聯合起來。一切地位的分配，一切活動的價值，都憑著那個目的而定。各部份因他們在那系統中的地位得著性質，充滿了他們所表現的團體精神，願意忘記自己，好像拱橋的拱木，從立脚的平地，引著視線到他們接觸交叉的頂上。

這樣統一與差別的聯合，只能行於一個以活動附屬於目的原理的社會裏面。因為那個原理所供給的東西，不只限於決定各階級與各生產團體的關係的標準，並且是一個道德價值的標準。最重要的，是使經濟活動的自身，居於為社會僕人的相當地位，而不是為主人。我們的文化負擔，不只是如許多人所想的因為工業的產物分配不善，或是他的行為太暴虐，或是他的進行為仇視的紛爭所阻礙。乃是由於工業自身，佔了人類利益中完全優越的地位，這種地位原不是一種單獨利益所宜於佔據的，而供給生存的物质需要，最不宜佔據這個地位。工業的社會如狂的注其意念於獲得財富的方法，而忘卻值得獲得財富的目的的本身，正如害憂鬱病的人，完全注意於自己的消化作用，以致未曾活著先就進了墳墓。

對於這種經濟問題的憂愁，雖令人討厭而不安，但亦是屬於一地的與一時的。這種憂愁照後代看起來是與今日看十七世紀對於宗教爭鬧的憂愁一樣的可憐；老實說，這是比較的不合理，因為關係的目的比較的輕。好像毒一樣，使每個傷口發熱，使每個抓傷變成一個瘡。社會若不將這個毒除去，並且學習用正當的眼光看工業的本身，就不能解決爲害的工業的特殊問題。假若社會要做那件事，就當重新定價值的標準。必須將經濟的利益當作生活的一部份，而不是生活的全體。必須勸社會裏的人，放棄有利益而無相對的服務的機會，因為競爭這些利益使社會全體生存於狂熱之中。社會應當組織工業使經濟活動的器具性質，因將這種活動附屬於進行所爲的目的之下，得以注重。

